Primo Levi



COSÍ FU AUSCHWITZ

TESTIMONIANZE 1945–1986

这就是奥斯维辛

1945—1986年的证据

[意] 普里莫 · 莱维　莱昂纳多 · 德 · 贝内代蒂 著

沈萼梅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

作者:[意]普里莫·莱维,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译者:沈萼梅

ISBN:9787508674513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编者按

莱维的读者都知道，《被淹没与被拯救的》（*I sommersi e i salvati*）一书的第一章是以这句话开始的：“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读者的注意力自然会集中在“靠不住的”这个形容词上面，这句话精辟地勾勒出一位作家敏锐的思维和真诚的品格，他从一开始就揭示任何一个证据都有其局限性，包括他自己的证词在内。我们在把搜集到的文件资料编撰成书时，却想赋予“奇妙的”和“靠不住的”这两个形容词一种非同寻常的分量；那么，就应当说说以何种方式了。

《这就是奥斯维辛[注]》一书，是以《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开始的，它是遵照那个前战俘营的苏联指挥部的请求，由外科医生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博士和化学博士普里莫·莱维，于1945年春天在卡托维兹[注]拟写的；次年，此文本用意大利语以较长的篇幅发表在都灵的《医药智慧女神》医学杂志上。随着这篇早先的证据的发表，我们接着按时间顺序，搜集了从1945年至1986年跨度为41年的一组来源不同的资料：其中有登在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有向公众发表的讲话，有纳粹战犯临时审判时所做的证词（这里，重又听到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博士与其朋友普里莫·莱维同时发声），以及从在集中营幸存者中享有威望的莱维那里获得的一些官方文本。大部分文本都是由普里莫·莱维亲自撰写，他还关注文本的出版发行。然而，关于他给审判纳粹战犯所做的证词，我们掌握的不少抄写本却是由别人誊写的，未经他本人审核。最后，还有些文本（这从书后的《文本的信息》部分可以看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如此参差不齐的情况，产生了两种后果：（1）随着岁月的流逝，莱维的声音总是能被认可，同时，他叙述的故事的时间背景更具体化，

所发生的事件更具一致性、更坚实可靠，而且其所做的叙述总是带有新的视角；（2）一系列极小的差异——可能涉及姓名、数字、日期、地点等的拼写上的误差，以及事实上的出入、记忆的差错——在本书的这些文本中零星地可以找到一些，自然多半是出现在那些经由他人口述，抑或是经中间人之手获得的文本中，尽管中间转手者曾予以悉心处理。在这本集子中，除了校正一般性的显著的“笔误”（lapsus calami），以及明显的排版印刷的错误之外，我们选择了按文本原样付诸铅印，在书后《文本的信息》中注明了可能出现的不符合逻辑之处，重现了每个文本的经历，并且诠释了某些映射和暗示；对于我们认为有必要附加在书中的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文本，自然也进行了这样的处理。我们觉得，这种忠实于文件资料真实性的做法，表明了一种处事的方式，就是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具体难题和时代的印记交给读者来处理，至少是部分地交给读者来处理。

但这种选择，也是受到另一种准则的启示，这与作者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在面对幸存者的证词中出现的极小的障碍或某些空白可能被人利用时所表现出的忧虑是休戚相关的：这个准则，就是对真相的尊重。它迫使我们在出版文本时，最大限度地忠实于文献的真实性，并且在追溯文献产生的渊源时，从历史编纂学角度做到完全透明。另外，同样的准则也提示我们，绝不容轻视莱维在相隔多年之后，为了还原一个极其难以描述的真相所付出的努力。能发现那些差错，本身就是基于他的这种努力——我们得着重强调这一点。最后，这更加凸显出他用四十多年的工作所奉献给我们的历史背景的一贯性和可靠性。

执着地修正自己可能出的差错，常常会赋予搜寻真相的人一种身份，它胜过单纯的证人的身份，正像写于1945年的那份杰出的报告中描述的那样，而该报告是献给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撤走后踏上致命征途的难友们的，这就使得普里莫·莱维获得了越来越清晰的真相。但这还不是一切，由于编撰所采用的特别形式，此书向读者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机遇：本书向读者指明，在谈及回忆时，可以像《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

书所做的那样，赋予其同表面上含义如此相左的“奇妙的”和“靠不住的”那样的形容词，来确定事物相应的分量。

法比奥・莱维
多梅尼科・斯卡尔帕

---

1. 奥斯维辛（Auschwitz），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小镇奥斯维辛附近建立的四十多座集中营的总称，其中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和莫诺维茨是三个中心营区。（如无特别注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 卡托维兹（Katowice），波兰南部城市，位于西里西亚省。

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

（奥斯维辛–斯雷西亚北部）

通过不少集中营前囚犯所提供的逼真的资料和诸多报告，对于德国人为杀绝欧洲犹太人所建立的那些灭绝人性的场所究竟为何物，也许已无人不晓，对于他们在那里所犯下的可耻暴行，也不再有人置若罔闻。在为期一年的囚禁中，我们也曾是那些恐怖行径的见证者，并多次成为其受害者。然而，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那种恐怖，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意大利公布一份报告，这是我们曾经向苏联政府呈交的报告，当时我们是应卡托维兹集中营苏联指挥部的请求而拟写的，那里曾囚禁过前意大利囚犯。临近1945年1月底，我们被苏联红军解放后，也是在这座集中营受到接待。我们在这里全面补充了那份报告，因为当初我们的报告是专门写莫诺维茨集中营里的医疗服务设施和功能的，莫斯科政府要求所有同样从其他集中营被解放出来的各国医生也做出类似的报告。

* * *

1944年2月22日，我们650名犹太人，男女老少乘坐一列火车从卡尔比镇（属摩德纳市）的佛索利[注]集中营出发。我们之中最年长的已超过80岁，最幼小的是一名三个月大的吃奶的婴孩。许多人是病号，而且有些人病情严重：一位70岁的老人，在出发前没几天突发脑溢血，但照样被押送上火车，死在旅途中。

列车全由运载牲口的闷罐车皮组成，从外面关闭车门；每节车皮装载五十多个人，他们之中大部分随身带着尽量多的行李箱，有一位在佛

索利集中营当雇员的德国上士，曾经提示过我们得备够厚衣服——毛衣、被子、皮衣等，因为我们将被带往气候比意大利要冷得多的国度里，那位德国上士说话时的神情亲切又真诚。他脸上挂着一丝仁慈的笑容，还眨巴一下眼睛讥讽地补充说，如果有人身上藏有金钱和首饰，最好也捎上，因为在那里肯定会用得上。大部分启程的人都上了当，听信了那位德国上士一番暗藏玄机的话；有极少数的人，情愿把自己的东西托付给能自由出入集中营的一些平民百姓；最后是一些被捕时都没来得及准备换洗衣服的人，他们只穿着身上仅有的衣服就上了路。

从佛索利集中营到奥斯维辛的旅程持续整整四天。路途十分艰辛，首先是因为天气寒冷，尤其在夜晚的时辰里，寒气逼人，一清早甚至会发现车皮内横穿的金属管道都结了冰，那是车厢里的人呼出的气遇冷凝结而成。另一种煎熬就是口渴，因为囚犯们就靠那每天只停一次车的片刻时间，下车用收集的雪水解渴，当列车停靠在开阔的荒野里时，囚犯被允许在许多端着冲锋枪的士兵极其严密的监视下，从车皮下来，士兵们随时会朝任何远离列车企图逃跑的囚犯扫射。

就在列车短暂的停车时间内，士兵按车厢逐个分发食物——面包、果酱和奶酪，但从来不发水，也没有其他饮料。睡眠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因为大量的行李箱和包裹堆满车厢的地面，无法让人在舒适的位置躺下休息；所以，每个囚犯只能满足于蜷缩在一个极小的空间内勉强凑合。车皮的地面总是潮湿的，都没人设法弄些稻草铺上。

列车刚抵达奥斯维辛时（那大约是1944年2月26日晚9点），车厢很快就被许多手持警棍、荷枪实弹的党卫军清空，难友们被迫把手提箱、包裹、被子等物件沿着车皮放下。人群当即被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外表看上去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有95人被编入这一组；第二组是女子，也都是年轻的——人数不多，只由29人组成；还有第三组，这一组是人数最多的，有孩子、体弱多病者和老人。当前面两组人分别被带往不同的集中营去时，人们有理由相信，第三组应该就是被直接押送去比尔克瑙

注的毒气室了，他们当天夜里就被屠杀了。

第一组被带往莫诺维茨，那里设有一个集中营，行政上属于距离约八公里外的奥斯维辛管辖，它约于1942年年中建立，目的是为建造隶属于法本化工集团注的“布纳工厂”提供劳动力。化工集团接纳10000至12000名囚犯，尽管通常它只能容纳7000至8000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只有相当少量的囚犯是一些德国和波兰的罪犯，还有波兰的“政治犯”和“破坏分子”。

“布纳工厂”被指定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合成汽油、染色剂以及其他的煤炭副产品，其厂房占有一片约35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地盘。这个工业园区有一个入口处，就在离犹太人的集中营仅几百米的地方，那里全被高大的通电铁丝网围着，关押英国战俘的一个集中营则靠近工业园区，与它相距不远，而不同国家的平民劳工则在其他较远的营地里。附带说一下，“布纳工厂”的生产线从未启动运营过：开工的日期最早定在1944年8月，后因飞机轰炸，以及波兰民工的破坏而一再延迟，直到德国军队撤出波兰领土。

因此，莫诺维茨是个典型的劳动营（Arbeits-lager）：每天早晨，营地的全体劳工——除了病人和少数内部的工作人员之外——都排成齐整的正方形队列，随着一支乐队演奏的军队进行曲或欢快的小曲，前往劳动的地点。有些劳工队的干活地点距离营地有六七公里远，他们往往得加快行进的步伐赶路，几乎是跑步前往。出发去干活之前或放工回来之后，每天都得在劳动集中营的一个特定的操场上举行点名仪式，无论天气如何，所有的囚犯都得在那里排成整齐的正方形队列站立着，时间从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不等。

由95名男子组成的第一组人员刚一抵达营地，就立马被带到消毒室，所有的成员都得马上脱光衣服，身上的毛发被一次性地统统剃光：头发、胡须、身上的茸毛等在剪子、剃须刀以及其他刀具下迅速落下。

随后，他们都被带至淋浴室，在那里得一直被关到次日清晨。他们又累又困，饥肠辘辘，口干舌燥，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惊诧不已，为自己即将面临的未来忐忑不安，然而，更加令他们焦虑不安的是亲人们的命运，仅仅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就骤然被野蛮地强行分开了。从淋浴室管道滴落下来的水在地面流淌，他们内心隐含着悲怆，他们怀着不祥的预感，不得不在满地的积水中站立一整晚。直到第二天早晨，将近6点钟时，他们被迫用一种“来苏儿”消毒液在身上喷洒一阵，然后再用热水冲洗，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就被分发了营地的囚服。为了换上衣服，他们得从消毒室出来，往另一间大屋子走去，可他们因刚冲过澡，身上还湿淋淋的，出来时都得光着身子在雪地上行走。

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囚犯在冬天的全部行装，包括一件上衣、一双拖鞋、一顶便帽和一件条纹厚大衣、一件衬衣、两条厚布内裤、两块裹脚布、一件毛衣和一双大木屐。许多裹脚布块和内裤，显然是用褡裢（thaled）——犹太人祈祷时通常用来搭在身上的圣洁的大斗篷——裁剪而成的，那是从某些犹太放逐犯的行李箱里发现后，经过裁剪而用来当裹脚布和内裤的，以示对其信仰之蔑视。

到4月了，虽然寒冷有所缓解，但尚未消冻，厚衣服和毛衣却都被收了回去，裤子和上衣全换成单薄的，也都是条纹的，只是在将近10月底时，才再次分发冬天的衣服。不过，1944年秋天就不再是这样了，因为原先穿过的厚衣服和外衣已经破旧不堪，根本没法再穿了，于是，囚犯们就不得不像夏天的月份里那样穿着单衣，应对1944年至1945年的寒冬，唯有少得可怜的几个人才能得到一件呢子风衣和一件套头毛衣。

营地严禁拥有换洗的衣服和内衣，所以，囚犯实际上是不可能洗衬衣或内裤的。根据营地的安排，每隔三四十天，甚至五十天才准许更换衣服，没的选择，而且新换的内衣并没有洗干净，只是经过蒸汽消毒，因为营地里不存在洗衣房。这里说的更多的是粗布短内裤，而棉质或粗布的衬衣经常没有袖子，上面有无数的斑点，各种污渍都有，看上去令

人作呕，还常常破成烂布条似的，有时没有换洗的衬衣，居然会领到一件上衣或一条睡裤，或者几件女人的换洗衣服。一再重复的消毒损耗布料，使得衣服没有任何耐损力。众所周知，当时奥斯维辛大本营有从欧洲各国不断运来的各种物品，而这些衣物则是运送来的换洗衣服中质量最低劣的。分发给囚犯的大衣、上衣、裤子等，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用的，保存得都极其差，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上面打满补丁，布满污渍（淤泥、机油污渍、油漆）。囚友们不得不在根本没分发针线的条件下，自己予以修补和处理。想更换衣服极其困难，唯有当衣服明显怎么也无法修补时，才能获准更换。裹脚的布片是根本不能换的，而更新裹脚布片就要看每个人的主观努力了。营地里禁止持有任何手绢或破布块。

木屐是设立在营地的一家专门作坊制作的。用钉子在木头鞋底上绱鞋面，鞋面用皮革、仿皮、帆布或橡胶制作，这些都是从运送物品的列车上搞来的残次的鞋上取得的材料。那种木屐在通常完好的情况下，勉强能御寒防潮，但绝对不适合长途行走，即使只是短途行军，也常常会磨破脚上的皮肤，造成严重创伤。谁拥有一双尺寸大小合脚的成对的木屐，就被视作幸运的人，鞋子一旦破损后，就得进行无数次的修复，都超越了一定合理的范围，所以极少能看到有人穿新鞋子，那些发下来的鞋子一般穿不到一周就又坏了，而且从来不分发鞋带，系鞋的鞋带全都是个人卷起来的纸绳子，或是用能找到的电线来代替。

营地的医疗卫生状况乍看起来还真是不错：用来隔离各个“棚屋”（囚室）的小径和甬道维护得不错，看上去挺干净，尽管路面任由其泥泞不堪；“棚屋”（囚室）外壁是木质的，上过油漆，里面的地板每天清早都经过仔细的打扫和冲洗，被称作“楼阁”的三层床铺整整齐齐，铺位上的被褥收拾得很平整。但这一切仅仅是表面现象，实质与表象大相径庭：实际上“大棚屋”里通常应该收容150至170人，却总是挤塞着不少于200人，经常还达到250人，因此，几乎每张床铺上都得睡两个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屋子的大小肯定不能满足人体的呼吸和血液循环所必

需的要求。铺位的床垫多半就是一个里面填塞锯木的大口袋，而锯木经长期使用后几乎已变成木屑。每张床铺配有两条被子，且不说这些被子从来是不换洗的，也从不进行消毒，除了有极少的几次出于特殊的原因之外，被子大部分时间维护得很差，由于使用时间过长而破旧不堪，上面还布满各种污渍。仅仅在那些比较显眼的铺位上放的被褥，才比较像样体面，还挺干净，有时候甚至还挺好看：这是那些下铺床位以及靠近棚屋门口的床位。

这些床位自然是留给营地有小小“特权”的人：劳动队队长及其助手们、棚屋的室长助理，或者是队长和室长的朋友们。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初次进入棚屋内的人用肤浅的目光扫视室内时，会觉得囚室内显得那么干净整齐。可就在三层铺位“楼阁”的脚手架里，在支撑顶棚的房梁上，在铺位的床板缝隙内，却存活着成千上万的臭虫和跳蚤，它们令囚犯们彻夜难眠，即使屋子里每隔三四个月用含叠氮酸的水蒸气进行消毒，也不足以杀灭那些不速之客，它们几乎肆无忌惮地在那里生长和繁殖。

不过，对付虱子，他们倒是进行了一种彻底的斗争，目的是防止斑疹伤寒的蔓延：每天晚上干活回来，以及周六下午，对囚犯身上的虱子实行“特别严格的检查”（另外，周六下午特别规定剃头、刮胡子或剃去毛发）。每个囚犯都得脱光衣服接受专人仔细检查，倘若在某个囚犯的衬衣上发现哪怕一只虱子，就把同屋所有人的衣物立即全部送去消毒，所有的人都得先喷上来苏儿水，再去淋浴。然后，都得光着身子裸睡过夜，直至次日黎明时分，那时他们的衣物也从消毒室给送了回来，衣服还是湿淋淋的。

然而，对传染病的预防没有采取任何别的措施，传染病如伤寒、猩红热、白喉、水痘、麻疹、丹毒等仍时有发生。传染性皮肤感染更是不计其数，如表皮溃烂、脓疮病、疥疮。不过，在如此混杂群居的环境之下，又那么无视卫生条件，居然从未爆发过迅速蔓延的瘟疫，实在令人

惊诧。

囚犯中个人备有饭盒和勺子的比例相当低，通常是三四个人被迫合用餐具或杯具，不能涮洗干净后再分别使用。这就使得传染病有极大可能传播开来。

膳食提供的数量不足，质量低劣。一天供应三餐，早晨起床后，每周四次发350克面包和每周三次发700克面包，故平均每天分发500克面包，要是面包里不掺入大量的残渣和杂物的话，数量上还勉强够吃，可里面明显地掺入了木屑，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另外，早晨还分发25克人造奶油，外加20来克香肠或者一勺果酱或乳酪。人造奶油每周只有六天分发，后来减少至每周三天。中午囚犯可领得一升萝卜汤或白菜汤，因为缺少任何佐料，那种菜汤淡而无味，晚上干完活后，能分得另外一升稍微浓稠的菜汤，里面有几片土豆，有时还可见到几颗豌豆和鹰嘴豆，不过，这类汤是绝对不带油水的。菜汤里极少能发现几根肉丝。早晚都分发半升一包的不加糖的人造咖啡当作饮料，只有周日咖啡里才放糖。莫诺维茨营地里缺乏饮用水，流经洗衣房里的水只能用于洗漱，不能饮用，因为那里的水来自江河，未经过滤和消毒就引入营地，因而安全性无法保证：那种水看上去尚清澈，尽管沉淀后水呈浅黄色，有一股介于金属和硫黄之间的味道。

囚犯们每周淋浴两三次。但如此程度的冲洗不足以保持人体的清洁卫生，因为分发的肥皂数量很有限：一个月就分给一块50克重的小肥皂，而且质量极差。那是一块长方形的东西，质地很硬，没有油脂，却含有很多沙子，使用时不起泡沫，极易碎裂，因此，洗完一两次淋浴后就完全耗尽。洗澡后不可能揉搓身子，也无法擦干，因为大家都没有毛巾；从浴室出来，无论在什么季节，也不管气候和空气条件如何，更不管温度高低，就得光着身子跑，一直跑到存放着自己衣服的“棚屋”。

指派给大部分囚友们干的都是相当累人的力气活儿，他们的体格和能力难以适应，囚友中很少有人能从事跟他们以往当平民百姓时的职业

和手艺相近似的工作。我们两人没谁能够在“布纳工厂”的医院或化学实验室里工作，两人都不得不跟随难友们的命运，忍受着超越他们体能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有时抡铁锹或镐头当挖土工，有时当煤炭和水泥袋的装卸工，或者干其他各种都是在露天作业的十分繁重的劳动，无论寒冬或盛夏，无论太阳高照或雨雪交加，无论晴天或刮风天，身上都没有足够的衣着抵御低温和恶劣的天气。何况干这些活儿的节奏都很快，除了中午有一个小时——从12点到1点——用来吃午餐之外，没有任何间歇：谁要是在干活的时间里被人发现偷懒或怠工，谁就会倒霉。

* * *

根据我们对莫诺维茨集中营生活方式粗略的描述，不难推测出哪些是囚犯们所患的最频繁的疾病及其病因。这些疾病可以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1）营养不良症

（2）肠胃器官的疾病

（3）伤风感冒类疾病

（4）一般的感染和皮肤病

（5）外科疾病

（6）干活导致的疾病

营养不良症——正如我们所见，营地提供的食物从数量上来说，是大大低于人体的正常需要的。从质量上来说，则缺乏两种重要的成分：一是脂肪，尤其是缺乏动物蛋白质，每周就只摄入两三次那可怜的20—25克的香肠；二是维生素，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患那些营养不良的疾病，原因就在这里。差不多所有的囚犯，从他们进入集中营头几周起，就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所有人确实都很快消瘦下来，其中

大部分人身上出现浮肿，尤其是在下肢，不过，也不乏有脸部浮肿的。鉴于有这些营养不良的症状，同样不难推测，各种感染性疾病就应运而生，尤其是皮肤感染，很容易转成慢性的。由于鞋子在样式上和尺寸上都有悖于生理需要，于是木屐的摩擦直接导致脚部的溃烂，脚上相同部位频繁地长出无数疖疮，股部溃疡也很频繁，蜂窝织炎等也不见任何痊愈的势头，反而转成持续性的深度溃烂化脓，有时候长出大量灰黄色的肉芽，涂敷硝酸银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有相当一大部分囚犯患上腹泻，几乎所有在押人员都患过腹泻，这同样也得归因于营养不良。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为何囚犯们都很快感到浑身乏力，因为伴随皮下脂肪溶解的是一种严重的肌肉组织的萎缩症。

说到这里，我们得提到维生素：从我们至今所讲述的情况看，最常见的自然是维生素缺乏综合征——特别是缺乏维生素C和维生素B。倒是没有发生过坏血病和多发性神经炎的病例，至少没有典型的完整病症，我们认为这与大部分囚犯在集中营度过的平均生命周期太短有关，短到生命机体还来不及表现出缺乏那些维生素而引起的明显的临床症状。

肠胃器官的疾病——许多囚犯患上的那些与集中营的生活方式并非有密切关系的疾病，我们在这里权且不提了，比如胃酸过多（过少）症、胃部-十二指肠溃疡、阑尾炎、小肠结肠炎和肝脏疾病。我们就只提许多在押人员在他们抵达莫诺维茨之前早就有的病症，后来症状加重或者治愈后又复发的情况。这里，我们特别要提的是腹泻，我们在前面已谈到过，无论是由于其高传播性，还是由于发病流程的严重性，腹泻往往会导致病人立刻死亡。腹泻多半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原因突然发作的，有时有消化不良的先兆，由偶然的决定性因素引起，比如因为持续的、长时间的挨冻受寒，或者摄入一种变质的食物（有时面包已经发霉），或者是消化不良。就这方面值得提及的是，许多囚犯因为饿得发慌，就吃了从厨房垃圾中捡来的土豆皮、生白菜叶、腐烂的土豆或萝卜。不过，严重的腹泻背后，很可能有着诸多别的因素，尤其是有两种

相互依存的因素：长期的消化不良，以及由此造成的营养不良。腹泻病患者肠道无数次的排泄——少则一天五六次，多则一天二十次或更多——拉稀之前伴有腹部剧痛，排泄物内多黏液，有时便中还带血。胃口虽尚能保持，但多数情况下患者有一种持续的厌食症，因而拒绝进食：这是很快导致致命结果的最严重的病例。患者总是存在一种相当严重的口渴现象。倘若疾病有痊愈的倾向，排便的次数就减少至一日两三次，同时粪便的质量也渐渐变化，会呈糊状。患过腹泻的病人痊愈后，往往显得十分虚弱憔悴，总的体质状况出现明显恶化，看上去特别消瘦，那是肌肉组织大量脱水所致。标准化的治疗是补充食物营养和药物治疗双管齐下。腹泻病人一进医院，就得24小时绝对禁食，然后接受一种特别的膳食，直到他们的症状有肯定的好转，亦即排便的次数有所减少，粪便呈糊状，预后明显见好。饮食节制在于取消摄入香肠和中午的菜汤，用白面包代替黑面包，晚上喝粗面粉做的甜糊糊，面糊应相当的黏稠。另外，医生们建议病人少喝或根本不喝流质食物，虽然早晨和晚上的咖啡数量绝对没有减少。药物治疗就是服用三至四片单宁酸盐，还要每日服用碳酸片；病情严重者也可服用五滴（！）鸦片水和几滴卡地阿唑止疼。

伤风感冒类疾病——囚犯们天天长时间地遭受风吹、日晒、雨淋，天寒地冻时没有御寒防潮的衣服，所以风湿病、呼吸器官疾病、关节炎、神经痛病以及冻伤等疾病频繁发生。

支气管炎、肺炎、支气管肺炎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即便在夏季也是如此，不过在冬季、秋季和春季尤为猖獗。治疗伤风感冒的方法很简单：进行胸腔冷敷，给几片退热药片，病情严重时，囚犯所服用的硫酰胺剂量绝对不足，另外，用一点卡地阿唑。治疗神经痛——尤其是频繁发作的腰痛和坐骨神经痛——以及关节炎患者，则是让其接受电热辐射治疗；对冻伤则不实施任何治疗，除非是发展到某种严重程度时，会将冻伤的部位予以切除。

传染性疾病——最频繁发生的传染病是疹病（esantematiche），特别是猩红热、水痘、丹毒、白喉。斑疹伤寒不定期地发生，患有这类疾病的人就被送入一间隔离室，不过是混合隔离的，就是说，不同病症的患者之间不施行隔离。因此，得了某种疾病的一名患者，隔离后很容易感染上另一种传染病，更何况，床上的被子和用来盛菜汤的碗是从来不消毒的。硫酰胺用来治疗猩红热和丹毒，但用药的剂量总是不足；对待白喉患者往往是放弃治疗，因为根本没有血清，治疗仅限于用一种稀释得很淡的含漱剂（chinosol）漱口，再服用几片解热镇痛药。为何白喉病患者的死亡率是100%，这就很清楚了：因为熬过急性发作期的病人，接着会因为心力衰竭或某些其他并发症，乃至同时感染另一种传染病而死去。

对于梅毒、肺结核和疟疾，我们无法提供有关其发病率的资料，因为梅毒、肺结核和疟疾病患者——即便他们早先已经痊愈，但若偶尔因不慎透露自己的病史而被发现——肯定会被送往比尔克瑙，在那儿的毒气室里被处死。不能否认，这是一种最根本的防治办法哦！

说到皮肤方面的各种感染则相当普遍，然而，正如同我们在前面所述，特别是疖疮和脓肿，同时会在局部的疮面上多次复发，其过程总是相当漫长，还有须疮和癣疥。治疗疖疮和脓肿只是采用外科手术，挖去病灶做引流，没能实施疫苗注射或化疗等刺激性疗法，只有在出现非常顽固的病症时，患者才接受自体血液疗法。对付须疮和羽状纠发病，没有特别的治疗手段，尤其是没有碘酒，只在患者的脸部涂抹一些现成的药膏，其疗效几近于零，面对这些皮肤病的大肆蔓延，结果是一方面采取预防措施，比如禁止患者自己剃胡须，以免通过刮胡刀和小刷子传播炎症，另一方面采取强制性治疗，让病人接受紫外线照射治疗。须疮严重的患者则临时转移到奥斯维辛的医院接受伦琴射线治疗。

关于皮肤病，我们还得提及疥疮的蔓延问题，患者在一间专门的屋子里每天用肤轻松药膏（mitigal）揉搓，患者每天只是晚上住在那里过

夜，白天他们还是得在分属的劳动队里继续正常干活，也就是说，没有为疥疮病患者组建一个专门的“劳动队”，发病期间，他们仍然在尚未感染疥疮的人中间继续干活，由于共同使用劳动工具以及生活中密切接触，疥疮的传染率十分高。

外科疾病——对于那些与营地的生活方式无关，却必须进行外科手术的感染病例，我们也不在这里赘述了。我们只提通常进行的那些手术，也就是复杂的外科手术，以腹部手术占多数，诸如因患十二指肠溃疡或胃溃疡而实施的胃肠吻合术、阑尾切除术、肋膜积脓切除术等，以及因骨折和脱臼而实施的矫形外科手术。倘若患者的身体条件难以承受手术带来的创伤，在手术之前就对其输血，这也同样用在因胃溃疡或偶然的创伤而大出血所引起的贫血症。供应的鲜血往往得自健康状况良好的新来的囚犯，献血是自愿的，作为奖励，供血者可以在医院里休息15天，住院期间能享受一种特别的膳食。故而献血的人总是很多。

在莫诺维茨的医院里，绝对不实施——我们认为甚至可以排除——以科研为目的的外科手术，不像在其他集中营里那样大规模地实施。比如，我们知道，在奥斯维辛的那个医院里，有一个专门用来研究阉割和随之进行异性腺植入效果的科室。

莫诺维茨的医院的手术室配有足够的器械，至少足以满足在那里动手术之需要；手术室的墙壁都贴有便于擦净的白色瓷砖；有一张活动的手术台，式样稍旧，但功能齐全，可以按手术需要的基本体位把病人安置在手术台上；有一个用来对手术器械进行消毒的电炉；有几架照明用的可移动的反射镜，以及固定在手术室中央的一盏大吊灯。在一扇木质的屏风背后的一面墙壁上，还设有装备了冷热水龙头的洗脸池，可供动手术的医生及其助手们洗手。

至于无菌外科手术的问题，我们记得对患疝气病患者，只要病人提出要求，也经常予以动手术的，至少直到1944年春天的中期是这样。自这个时期以后，这样的手术就中断了——除非是极少数严重的绞窄性疝

气患者——即使有人因疝气体积过大明确已妨碍劳动。可以推测，患者之所以下决心愿意接受这种手术，是为了在手术后能在医院获得一个月的休息。

最为频繁的外科手术是针对蜂窝织炎，患者在专门的脓毒性外科病室内接受手术。蜂窝织炎与腹泻并驾齐驱，构成了集中营特别病理学重要的篇章之一。蜂窝织炎多发生在下肢部位，它在人体任何其他部位很少出现。通常可以从患者脚上某些皮肤的病变中辨认其征兆，那是患者所穿的鞋子不合适、脚部久经摩擦受损而造成的，开始是表面的局部范围的病变，之后逐渐向周边浸润和扩展，直到加深、转移和浸润至相当的范围。不过，有时候难以辨认致病细菌的浸入点，在未能发现其附近或远处皮肤病变时，软组织的浸润就形成了：这很可能就探寻到源自“病灶”的细菌，以及随着血液流动运行的病菌。通常患者过早地进行多次大面积的切除，不过，随后病变的演化过程总是漫长的，切除后，即便把脓液挤干净，也往往不见结疤愈合。术后的治疗，就只是对外科手术的伤口进行简单的引流导液，不采用任何可以保护肌肤的疗法，因而很容易复发，所以在同一个患者身上频繁进行“一系列”手术，把以前切开的伤口四周形成的脓包再打开又做引流导液，而当伤口愈合的过程终于快完成时，患者就出院了，即便伤口还没有完全长结实，就得去上工了，进一步的用药则在医务室进行。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出院的大多数囚友，没过几天，又不得不进医院，不是因为又长出新的脓疮，就是因为疮口局部复发，或者因为在别的部位又出现新的病灶。

急性耳炎也相当普遍，发生乳突并发症的比例特别高，急性耳炎通常由耳鼻喉科专家动手术。

随着病变阶段的变化，治疗皮肤感染基本上按照标准规格连续使用四种不同的药膏。开初的浸润阶段，在病变部位的皮肤周围，敷上一种含鱼石硫酸铵的药膏予以消肿；接着，消肿之后打开了病灶，就用胶状银软膏在溃烂底部深度消毒；直到停止化脓或脓液减少时，就使用佩利

多耳药膏促使其结疤；最后再敷上另一种氧化锌药膏使其生长上皮。

干活导致的疾病——由于大批囚犯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不见有什么特别的职业病，除了那些因工伤事故导致的外科疾病以外，也就是一般的挫伤、骨折和脱臼。不过，我们可以反映一桩我们所获悉的案例。

1944年8月，从属于所谓"化工队"的人员，有一段时间被指派去清理一座仓库，里面存放着装有苯酚（石炭酸）的麻袋。第一天干活，这种呈粉尘状的物质就沾在干活者的面部和双手上，汗水把这种粉尘沾在皮肤上；接着，又暴露在阳光底下，所有人体的裸露部分先是皮肤的色素变深，伴随着剧烈的灼痛，接着是大块大块地脱皮。尽管后来长出一层新皮，但因为这样持续不断地与苯酚接触，皮肤对腐蚀物质显得特别敏感，疼痛不已，就这样他们持续干了29天之久，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虽然上述"化工队"的所有囚犯——一共五十来个——都遭受了这痛苦的皮肤病折磨，却没有人能进医院得到治疗。

* * *

回顾莫诺维茨营地里最频发的疾病及其原因之后，我们应该承认，想用绝对或相对的数字，是不可能对发病的频率提供精确资料的，因为我们两个人，除非作为病人，无一人能进入医院里面。我们所写的一切，以及我们以下还将谈到的一切，是我们日常观察的结果，也是我们通过与认识的人，以及与这些人有友好交往的难友、医生或其他医务人员的间接接触中，偶然所获悉的消息而得出的结果。

营地医院就在我们1944年2月底抵达莫诺维茨仅仅几个月之前建立。在那之前，那里不存在任何医疗服务设施，病人没有得到治疗的任何可能，可他们每天照样被迫干活，直到心力交瘁、活活累死在干活场所。自然，这是极其频繁发生的事情。当时验证某个囚犯是否确实死亡，采用的是一种很特别的办法：责成两名非医务人员来验证，他们手持牛筋皮鞭，在该囚犯身上连续抽打几分钟，最后，如果倒地者一动不

动，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就确认其已经死亡，其尸体就立刻被运往火葬场；如若倒地者还在动，就是说还没有死，那么，就逼着他继续把中断的活干下去。

后来，建立了第一个医疗服务中心，它具备一个诊疗所应有的医疗设施，无论是谁，倘若感到自己病了，都可以去那里就诊。不过，倘若某个人不被医生认可有病，那人就立刻受到党卫军严厉的体罚；反之，如若被确诊为病得无法再干活，就会获准休息几天。在往后的那些日子里，有些棚屋被指定作为医务室，并逐步扩大，新的医疗服务设施也建立起来，因而我们在营地逗留期间，当时有下列的诊所正常地行使其职能：

——普通内科诊所

——普通外科诊所

——耳鼻喉科及眼科诊所

——牙科诊所（那里也进行补牙和最基本的修复术）

——无菌消毒外科诊所，附有耳鼻喉科

——脓毒性外科诊所

——附有一个神经系统病和精神病科的普通内科诊所，配有一个小小的电震休克治疗仪

——传染病科和腹泻诊所

——休养所（Schonungs-Block），住院患者中有营养不良者、水肿病患者和一些恢复期的病人

——理疗室，设有做紫外线照射的石英灯、红外线辐射灯

——细菌学和血清学化学研究科室

医院没有伦琴放射设备，在必须要做放射检查时，患者就被送往奥

斯维辛，那里有良好的医疗设施，回营时可以带回放射诊断书。

* * *

如上所述，可以认定这确实是一所医院，规模是小一些，但一切服务设施齐备，运作也正常；但实际上医院有很多缺陷，其中有一些也许是无法克服的，如药品相当匮乏，敷药包扎处置的医药材料不足，这是因为德国从那时开始已处于十分严峻的境地，一方面难以抵挡勇敢挺进的苏联红军，另一方面终日遭到英勇的英美空军的狂轰滥炸。不过，如果能多一点良好的愿望，更好地调整、组织医疗服务，其中有些缺陷本来是可以弥补的。

这些缺陷中最主要的是实施医疗服务的场所数量不够、容量不足。比如，前往就诊的病人没有一个候诊室，以至于到了晚上，经过一天疲惫不堪的劳动，囚犯们回到营地若想看病，就不得不露天待着，等候轮到自己就诊，无论什么季节，无论天气好坏，都得没完没了地露天排“长队”，因为医务所要等到所有干活的人回来，晚点名之后才开始运作。所有人在进入诊所之前都得脱去鞋子，并且被迫光着脚在地板上行走，就拿外科诊所的地板来说，上面尽是那些包扎使用过后扔在地上的药棉和纱布，而且还带着血污和脓液，肮脏不堪。

诊所里的病床数量严重不足，结果就是必须让两个病人合躺在一张病床上，不管他们各自染的什么病，也不管病情有多严重。而且还得考虑到这样的事实，由于缺少衬衣，医院里的病人往往都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所以交叉传染的概率极高。确实如此，在医院的入口处，每个住院病人都得把所有的衣服交往消毒室。病床上的被子和褥垫污秽不堪，上面有尚未洗净的血迹和脓疮污渍，常常还有濒死的患者不经意撒下的粪便污渍。

除了那点用来维系表面清洁的做法之外，卫生守则是完全被忽略的。比如，缺少用餐的饭盒，一日三餐分两三次轮流分发菜汤，轮到第

二次或第三次分发菜汤时，病人不得不使用别人使用过的餐具进食，这些餐具仅拿盛在一个桶里的冷水凑合涮洗过。跟其他诊所一样，在所谓的休养所里，没有自来水设备，不过，其他诊所的住院病人想涮洗时，可去专门的“洗衣房”（Wascheraum），而休养所里的病人却不能上那里去洗涮，除了每天早晨仅仅有一次可以使用盛在六个脸盆里的两百多升的水之外——由医务人员不断往脸盆里倒入一升的水，那水是用专门的大木桶从外面运来的。这个科室的病人食用的面包，是从外科处置室里运来的，面包头天晚上就搁在处置室的一条长板凳上，那是白天患者在敷药时用来搁脚的凳子，上完药之后，长凳上总是沾满血迹和脓液，随后护士只是用一块蘸过凉水的抹布匆匆擦拭一下。

被诊所医生确诊应该住院的患者，要获得医院的接收，还得在次日早晨起床后，立即再次接受医务室主任医师的体检，检查很仓促。如若主任医生确认有必要住院，患者就前往淋浴室，在那里被剃光身上的毛发，然后冲完淋浴，最后入住相关的医疗科室。而要走到住院的科室，得从浴室光着身子出来到户外，不管在什么季节，不管气候条件如何，身上只许披着一件外衣，露天跑上100米至200米的路。

在内科诊所内部，主任医师由一两位护士协助工作，每天早晨巡查病房，医师不是亲自到病床跟前探视病人，而是让病人自己下床去医生那里就诊，那些病情特别严重、绝对无法行动的病人除外。每天晚上进行一次仓促的复诊。

外科诊室里的敷药、换药在每天早晨进行，由于诊室分为三个病室，每个病室轮流给病人上药、换药，因此每个病人每三天才能换一次药。敷药是用纸质的胶条固定，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胶条就会破碎或脱落，因此，无论是无菌的还是有菌的包扎，伤口总是暴露在外。唯有处置极少的病例或特别重要的病例，上药时才采用棉质胶布固定，由于药用胶布匮乏，所以使用时格外节省。

换药处置等外科治疗减少到最低限度，许多药品绝对短缺，即使是

最简单的常用药品，而其他药品的数量也极少：仅仅有一些阿司匹林、氨基比林、偶氮磺胺（唯一的硫黄酰胺药物）、碳酸氢盐，还有几支强心剂和咖啡因。樟脑油和士的宁、鸦片以及一切衍生药物均短缺，除了有少量的染色剂；缺少颠茄、阿托平、胰岛素、祛痰剂，还缺少秘盐、锰盐、胃蛋白酶和盐酸，而泻药和轻度泻药，只有二羟蒽醌。倒是有少量的土霉素、药用碳酸和鞣酸蛋白，而补钙的针剂和任何有补养功能的药剂一概短缺。有一定数量用于静脉注射的依维派苏打、用于麻醉的乙烷基-氯化物（这种麻醉药广泛运用在像切除疖子等微创手术之中）。

随着运送放逐犯、各种数量不等的药物以及不同医药专科的医疗用品的列车之来到，诊疗室里的药柜得以充实，其中有许多无利用价值的药物和医疗用品，是从那些新进来的人的行李箱中没收来的。不过，总的说来，营地对医药用品的需求，总是远远超过医院可支配的医疗资源。

医务人员只从关押的囚犯中间招收。医生是事先通过考试而录用的，从那些在入营时申报自己具医学博士学位的人当中选拔，熟练掌握德语或波兰语的人优先。他们的服务是以能得到更好的食物和更优质的衣服、鞋子为报偿的。但是医疗助理和护士的选拔没有曾获得任何医药职业资质的要求，他们多半只是一些体格健壮的人，仅凭借他们与已在职的医生或营地负责人的交情而得到职位——这些自然是囚犯们十分渴望得到的职位。其结果是，医师们一般都具有相应的医药专业资质和一定的文明素质，而辅助人员对于医疗卫生的规章条例和人道的准则就往往显得相当无知或漠视，他们之中有人甚至到了用分发给患者的菜汤和面包私自去换取香烟和其他衣物的地步。病人还经常因犯了微不足道的过错而挨揍，有的病人因为犯了比较严重的过失，就不予以正常地分发食物——比如，谁要是偷了病友的面包，作为惩罚，就立刻被会当作罪人而赶离医院，立即返回劳动岗位去干活，而且先得在脊梁骨上挨上一顿鞭笞（一般抽打25下），被狠狠地使劲抽打，使用的是牛筋鞭，这是一种由橡胶裹着的帆布管子。另一种惩罚则是强迫囚犯在离地相当高的

一条凳子上蹲一刻钟，十分窄小的凳面上搁着一只脸盆，被罚者得踮着脚尖双腿弯曲蹲立在脸盆上，双臂还得向前平伸至齐肩膀的高度。被罚的病人通常坚持不了几分钟，因肌肉疲劳和身体虚弱而失去平衡，就滚落在地上，引得围在一旁的护士们开怀大笑，他们还用话语讥讽嘲弄他。摔下来的病人还得站起来，再次爬上高凳子，重新按规定的时间恢复原来的姿势蹲着；倘若他接连不断地摔下来，无法再那样蹲立在脸盆上，就得挨相当次数的鞭笞以抵消对他的惩罚。

前来住院的病人越来越多，超过各个科室的接纳能力。因此，为了给新来的病号腾位子，每天都有相当数量的病人尚未痊愈、身体还十分虚弱就得出院；即便如此，他们在出院第二天就得恢复劳动。那些患上慢性病或住院时间超过两个月的患者，以及因其疾病一再复发、回去住院的次数太过频繁的患者——正像我们已提及的那些患有肺结核病、梅毒和疟疾的病人——就得被遣送至比尔克瑙，并在那里的毒气室被处死。那些因身体太过虚弱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医院的各个科室还不时地——大约每个月一次——进行所谓的“筛选穆斯林”（人们就是用这种形象化的措辞来称呼那些极其消瘦的人），筛选的体质最差的人就被送往毒气室。如此的筛选是由医务部门主任医师主持的，筛选的速度很快，所有住院病人都光着身子列队在主任医师的面前走过；仅仅凭其随便扫视一眼，他就判定各个病人的体质状况，并当即决定他们的命运。几天之后，事先被选定者再接受第二次检查，由一位党卫军上尉医生来诊断，他是所有从属于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医务机构的总负责人。实际上，我们应该说，这第二次检查比前面那次检查要仔细些，每个病例都经过反复斟酌和研究：不管怎么样，有幸被淘汰免除去毒气室、重新被允许去医院做进一步治疗的人，或者被派到其他劳动队从事比较轻松的劳动的人，为数甚少，大部分人都被判处死亡。我们之中有一个囚犯足足有四次被列入“穆斯林”的名单，而每次他都逃脱了必死的厄运，仅仅出于他是医生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医生——这是不是一种普遍的规定，抑或是莫诺维茨营地领导层的主意，我们不得而知——可以免除被送往毒气室这样一种结局。

1944年10月，他们对营地所有的“棚屋”都进行了“筛选”，而不仅仅局限于医院的各个科室，不过，那可是最后一次筛选，因为从那个时期之后，类似的“筛选”就中断了，比尔克瑙的毒气室也都被拆除了。然而，就在10月那个悲惨的日子里，850名受害者被筛选出来，其中有八个意大利籍的犹太人。

瓦斯毒气室及其附属的焚尸炉的运转，是由一个特别行动队承担，他们日夜轮流倒班。这个特别行动队的成员单独分开生活，对他们施行严格的隔离，不让他们与其他囚犯和外界有任何接触。他们的衣服上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味；他们身上总是肮脏不堪，一个个脸上都透着一副凶残相，真的跟猛兽似的。他们都是从犯有严重凶杀血案的刑事重犯中挑选出来的。

据我们所知，一个新的焚尸炉和一个毒气室于1943年2月在比尔克瑙投入使用，比在这之前运转的毒气室和焚尸炉设置得更符合要求。焚尸炉分三个部分：等候室、“淋浴室”和高炉。高炉中央竖着一个高高的烟囱，周围是九座高炉，每座高炉有四个出口，从每个出口一次可以同时运出三具尸体。每座高炉每天能焚烧2000具尸体。

被带入等候室的受害者接到全部脱光衣服的命令，因为——人们对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得洗淋浴，为了让他们更相信这卑劣的骗局，还分发给他们每人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然后就让他们进入“淋浴室”。这是一间大屋子，里面安装了一种人工的假淋浴设备，设备壁面上写着如下醒目的告诫：“你们好好地洗澡，因为清洁就意味着健康。”“不用节省肥皂！”“别把你们的浴巾忘在这里！”这样，“淋浴室”就可以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那真是一个大洗澡堂。浴室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大通风口，由三大块金属板密封，得用阀门才能打开。有几条轨道穿过整个浴室地面，通往焚尸的高炉。当所有人进入毒气室后，门就关闭了（门都是密封的），而且通过天花板上的阀门，撒下来一种粉末状的呈蓝灰色的化学药剂，它们被装在几个铁皮盒子里；这些盒子都带有一个标

签，上面写着："齐克隆B（Zyclon　B）用于杀灭一切动物寄生虫"，还有汉堡的一家工厂的商标。这是一种氰化物化学药剂，会在一定的温度下挥发。所有被关闭在毒气室里的人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被毒死，这时，所有的门窗就全部被打开，带着面罩的特别行动队专职人员进入室内操作，把尸体运往焚尸炉。

尸体在被运入焚尸炉之前，有专人负责把有些尸体上尚残留的头发全部剃光，这些就是随运货的闷罐车抵达那里，但没有先进入营地就立刻被带到密室毒死的那些人的尸体——镶有金牙的人则先得被抠去金牙套。骨灰就被当肥料撒在营地上和菜园里，这是众所周知的。

临近1944年年底，在莫诺维茨营地下达一个条例规定，凡是营地囚犯中的医生，都被免除在劳动队干活，并且被分配在医院不同的科室里任职当医生，若缺少合适的岗位，就当护士。他们在就任新的职务之前，得在医院内科或外科的不同诊室里跟着轮流值班，实习一个月，同时还上一种医学药理理论培训班，课程的内容涉及集中营的医疗组织、医务工作的运营、集中营的病理特点，以及须对病人实施的有关治疗等。这些规定按条例得以正常实施，培训班于1945年1月上旬开学，然而，临近1月中旬就中断了，因为苏联方面在克拉科维亚-卡托维兹-勃雷斯拉维亚[注]方向发起了猛烈的反攻，势不可当，德国军队不得不仓皇逃跑。就像奥斯维辛地区其他所有的集中营一样，莫诺维茨的集中营也被撤空，而且德国人带走约1.1万名囚犯，可是根据后来奇迹般存活下来的某些人提供的消息，没几天之后，当押送的士兵们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苏联红军包围而且没有任何撤退的生路时，几乎所有被带走的人都被机枪扫射而毙命。当时他们已经步行了七十来公里，一路上几乎没有停歇，也缺乏粮食供应，因为从营地出发时每人分得的只有1公斤面包、75克人造奶油、90克香肠和45克白糖。随后他们就被装进不同的列车往不同的方向开拔，但不能抵达任何目的地，于是就发生对幸存者的大屠杀，那都是些经历过千辛万苦、忍受过非人遭遇的人；许多人——也许有三四千人——原本精疲力竭地沿着大路停留在那里，却被押送的德国

士兵用手枪或步枪当场屠杀了。

营地里只剩下几千名老弱病残者，或尚未病愈、无法长途跋涉的人，他们处于几名党卫军的监视之下，而党卫军曾接到过命令，在丢弃他们之前必须全部开枪击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这道指令没有被执行；不过，无论这是因为什么缘故，我们两个至今都还活着，应该只归诸这一条：我们两个当时都滞留在医院里，一个被指派为住院患者的医疗助理，另一个则是恢复期的病人。护理病人的命令当时也只能从道义上执行，因为医药上的治疗已不可能，实际上德国人在丢弃营地之前，已经把医院所有的药品和外科器械全都撤空了，再也找不到一片阿司匹林，也看不见一把敷药用的钳子或一块棉纱布。

接下来的日子是极其悲惨的，许多病人因缺少治疗而死去，许多人因身体极度衰弱而死去，因为食物也短缺了。连水也缺少，就在那几天里发生的一次空袭中，水管子被炸毁了。幸好在近旁的一个营地里发现了一个为防冻而存放着土豆的地窖，至少能让尚未极度衰弱的患者充饥，以坚持到苏联人最终到来的那天，可以得到大量供应的分配食物。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普里莫·莱维

---

1. 佛索利（Fossoli），意大利中北部摩德纳城外卡尔比镇的一个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曾在那里设立一个集中营。
2. 比尔克瑙（Birkenau），建于1940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称为奥斯维辛二号营，拥有毒气室。
3. 法本化工集团（I. G. Farbenindustrie），于1925年建立，曾经是德国最大的化学工业集团，其总部设在法兰克福，战后被同盟国勒令解散。
4. 克拉科维亚（Cracovia）、卡托维兹、勃雷斯拉维亚（Breslavia）为波兰南部城市。

莫诺维茨-布纳集中营的幸存者、囚犯号为174517的普里莫·莱维有关奥斯维辛及其附近集中营的报告

我们把搜集在《这就是奥斯维辛》一书的材料不加任何介绍，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想知道更多的人，可以参阅《一位证人和真相》一文，或查阅书后的附录《文本的信息》。但这篇紧跟在《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后面的文本得除外，后面我们放在附录中的题为“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一文的复印件也得除外。对于这两份材料，有必要说几句。

迄今从未发表过的《莫诺维茨-布纳集中营的幸存者、囚犯号为174517的普里莫·莱维有关奥斯维辛及其附近集中营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在都灵的特拉奇尼犹太人档案馆内重新找到的，它是莱维最早提交的证据之一，而且完全可能是他回到都灵（1945年10月19日）之后留下的最早的材料。综合《文本的信息》中所述的理由，可以追溯到大约自1945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那几周的时间。《报告》是一份陈述，是莱维在追忆人物的名字及其个人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凭借自身在不同的时间和境遇中，包括在被解放后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在穿越欧洲的遣返过程中，在遣返不久之后在都灵城内，从与像他一样幸存下来的被遣返难友们早先交流的信件中所获取的信息，结合对事实的研究，并从事实本身出发进行符合逻辑的推理和中肯的审视。

这份文件的最初来源，是留存在记忆中的目击证据。文件还原了一份30个人的名单，并附有简明的、经过删选、尽可能准确的资料，以有助于日后辨认名单上的人。《这是不是个人》（*Se queeto è un uomo*）

一书的读者对那些名字——除了“小不点儿”让·萨姆艾尔和阿尔贝托之外——中的许多人颇为熟悉，可能人名的拼写有些许变动：比如工程师阿尔多·莱维，他是抵达集中营后就被送往毒气室的小女孩艾米利亚的父亲（见该书《旅途》篇），抑或是在其用餐的饭盒底部刻上“别想去搞明白”字样的克洛斯内尔（见该书《化学考试》篇），以及布拉克尔和坎德尔两个化学家，他们与普里莫·莱维后来一起组成了《那三个人去实验室》(注)。但是还有短篇小说《在利里特的一位门徒》（在安德烈·赞托时代）中的邦迪。最后就是“格鲁克斯曼·艾乌吉尼奥”，准确地说是格鲁克斯曼，他不是别人，就是《启示》篇中的斯泰因洛夫军士，而“阿尔弗雷德·洛森费尔德”不是别人，正是《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的那个难以言喻的阿尔弗雷德·L.。

* * *

到1945年1月初，不同时期里被押送到德国的意大利犹太人之中，在布纳集中营里活下来的约有40人。

1月17日那天，营地的党卫军突然接到命令，要把所有在押的囚犯，只要能行走的（不管是不是犹太人），都运送到德国境内去。

被丢弃在营地医院里的约有800名囚犯，他们都有病在身，或无法行走，其中也许有20名意大利人（本人就在这20人之中）。

他们让近一万名健康的囚犯，在营养和装备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出发，步行前往格雷维兹。在前往格雷维兹的健康人队伍里有下列人员：

阿贝纳伊姆，托斯卡纳人，他是个钟表匠

阿孙姆，米兰人，生于1925至1930年之间

巴路奇，利佛尔诺人，约25岁，生于斯米尔内

切萨雷·卡尔米，热那亚人

阿尔贝托·德拉·弗尔塔，勃雷西亚人，约24岁

哈尔佩尔讷，扎嘎勃里亚人，约25岁

曼德尔·海科，系前者之妹夫

弗朗科·萨切尔多蒂，都灵人

戈鲁克斯曼·艾乌杰尼奥，米兰人

利科·伊斯拉埃尔，扎嘎勃里亚人

奥尔维亚托，佛罗伦萨人，犹太法学博士，约25岁

塞尔乔·莱维，阿列桑德罗人，来自都灵

阿尔多·莱维，工程师，米兰人

阿尔多·莱维，会计师，米兰人

马里奥·莱维，米兰商人，约26岁

泽利科维奇，扎嘎勃里亚人，裁缝

伊西多尔·克劳乌斯内尔，荷兰人，囚犯号为169×××，物理学大学生（其妻曾住在苏黎世），约生于1920年

阿尔弗雷德·罗森菲尔德，生于罗马尼亚，住在洛雷纳，化学工程师，任冷冻设备科室主任长达42年之久

阿尔诺尔德·塞贝尔鲁斯特，数学系学生，生于波兰，约24岁，住在利普西亚

坎普兰，由圣达尔马佐镇放逐而来，生在波罗的海国家，现在米兰经商

让-肯德尔，生于罗马尼亚，约40岁，现居住在巴黎（他妻子在法国），化学家

朱莉·科夫曼，格罗兹坎斯扎人（匈牙利），约26岁，化学家

安德烈·赞托（邦迪），斯洛伐克人，曾在布拉格求学并获得学位，药剂师，约30岁，曾被德国人放逐到乌克兰工作

斯莱幸格，约于1919年生于南斯拉夫

帕尔皮特尔·勃兰凯尔，生于白俄罗斯，比利时公民，囚犯号为175（884？），住在列日（？），化学家，约35岁

让–萨姆艾尔，斯特拉斯堡人，约生于1921年，数学博士

阿尔弗雷德·科斯曼，梅茨人，路透社驻克雷蒙特–弗莱德记者

格鲁兹达斯，亚历桑德里亚人，医生，生于利嘎（莱托尼亚），囚号174001，出发迁移时身体状况良好

埃里克·赫尔斯，约生于1921年，个子很高

希尔维奥·巴尔巴拉斯，塞拉耶夫人，化学家，约生于1921年，曾居住在意大利

关于撤退时被德国人带走的纵队之命运，本人获得如下陈述：

（1）根据马赛人若耶·萨尔提耶尔先生的陈述（经由都灵的艾利克·斯克洛肖夫确认），纵队连续行走了24小时直到格雷维兹，一路上不少掉队的囚犯被护送队击毙。次日早晨，有多列装满囚犯的列车（装货的每节车皮载80个人）从格雷维兹的车站出发。萨尔提耶尔所乘坐的列车在行进20公里后停住，让囚犯们下车，并把他们赶入树林里用机枪扫射。萨尔提耶尔估计逃生者为数甚少。他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列车上囚犯的总人数，而且他肯定有些波兰当地的农民，出于同情收集了尸体上的囚犯编号。

（2）一位名叫艾乌吉尼奥（？）的博士，人称信奉基督教的波兰人杰内戈，他的陈述与上面的陈述相吻合。杰内戈在树林里装死，成功躲过党卫军为了杀死可能的幸存者所进行的扫荡。

（3）来自都灵的恩佐·莱维估计，从格雷维兹出发徒步行军后，至少有1.8万名囚犯的纵队随意被分头安置。莱维就待在一辆被多次扫射

过的运载货物的列车上。莱维被编在其中的某个团队，跋涉了好几天穿越波西米亚，他们在被丢弃集中营地里停留。在整个跋涉途中，大量再也无力行走的囚犯被杀死，尸体被丢弃在当地。莱维记得他们穿越过弗罗森堡（Flossenbürg）。

（4）从法国前政治犯、基督徒夏尔·康罗先生寄给本人的一封信中得知，康罗先生的同事们当中（数量达几百人，他们于1944年冬天被从孚日山区押送至达豪[注]，继而又从那里被运至奥斯维辛），没有一人在1945年9月回到法国。

（5）扎嘎勃里亚人曼德尔·海科也讲述了同样的事实。他被装在一列列车上，一直抵达离柏林不远的地方，没有遭遇机枪扫射。不过，他肯定为数不少的囚犯在旅途中因饥寒交迫而死亡，但人数难以确定。

（6）于几个月之前回国的勃雷西亚的一位意大利平民工人讲到他在1月20日或21日那天，与同是勃雷西亚人的阿尔贝托·德拉·弗尔塔，曾在离奥斯维辛约90公里的一个集中营碰见过，奥斯维辛那时已被苏联人占领，并由他们经营管理（德拉·弗尔塔于1月17日与其他人一起从奥斯维辛撤离）。勃雷西亚民工自己设法提前回到了意大利，他反映说德拉·弗尔塔当时健康状况良好，其为了查寻先前失踪的父亲，还想逗留在当地。

在期待可能出现的其他证词中，目前可以认为，关押在奥斯维辛和附近的集中营里面，有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囚犯可能逃脱了被毁灭的命运。其中有些人可能还在苏联人或南斯拉夫人的手中，抑或住进了某家医院，因此无法把有关他们的消息传到意大利。

1945年

---

1. 此处用的是德语版《这是不是个人》一书中的篇名“Die drei Leute vom Labor”。

2. 孚日山脉（Vosges），在法国东北部、莱茵河左岸。达豪（Dachau），系纳粹最早建立的集中营所在地，位于德国巴伐利亚。

证词

做证人：普里莫·莱维

已故的朱塞佩和艾斯特尔·鲁扎里之子

1919年7月31日生于（意大利）都灵

家庭住址：都灵乌贝托国王大街75号

本人在1944年2月26日至1945年1月27日在莫诺维茨（奥斯维辛）集中营当过囚犯（编号为174517）。

在这段囚禁期间，本人无法知晓曾经惨无人道地对待我们的那些营地领导人和责任人的真实姓名，但我认为，我们所在的营地里的所有士兵，以及党卫军——军队所有的军官和副官——都应集体承担罪责，尤其应追责于营地的总部领导和医疗机构领导。

众所周知，由每列闷罐车所押送的囚犯当中，仅有约五分之一被带入营地，就是那些一眼看上去被判定为能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所有其他人（老人、孩子、病人，以及大部分妇女）立刻都被带入毒气室处死，而且他们的尸体当即被火化。

所有被强行带入营地的人，无一例外得立刻脱光衣服，其私人物品一概被没收。集中营内部的统计表明，在营地能活过三四个月以上的只是个例外。不足的食物供应、合适衣物的缺乏、极其艰辛的劳动，以及经常遭受的体罚，令即便是体格最强壮的人也很快被制服。

党卫军定期在营地里巡查，寻找（所谓的“筛选”）出慢性病患者和

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那些人也深知自己的命运，无奈地前往毒气室和焚尸炉。

任何有逃跑企图的人，以及只是轻度违反了纪律的人，都得被处以绞刑。鉴于这些原因，莫诺维茨集中营（奥斯维辛）里，仅有不超过2%的意大利人得以返回祖国。

根据我个人调查的结果（自然是在解放之后进行的调查），我可以认定，在选择灭绝人的方式上，奥斯维辛中心的刽子手们充分暴露出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刻意的凶残。他们在毒气室使用的毒药，是由一种被称作齐克隆B的物质组成的。生产这种物质并非用于此种目的，它原本是作为杀虫剂和消毒剂用的，尤其是用来杀灭船舶底仓和仓库里的耗子。齐克隆B是用氢氰酸制成，并加上富有刺激性的催泪物质，目的是在毒气包装袋破裂或漏气时，更易让人察觉。由此可以推测，被毒死的不幸的受害者在临终时一定是痛苦不堪。

从被杀害者尸体嘴里抠出的金牙套，以及被剃下来的头发，都被另外保存起来，其用途至今不详。死者尸体的骨灰用来当作农业肥料。

特此证明

普里莫·莱维

约1946年

有关莫诺维茨的证词

1945年8月27日，在被放逐的犹太人调查委员会所在地——罗马台伯河岸桑齐奥大街9号，我们面对马西莫·阿道夫·维塔莱上校，已故的朱塞佩之子，时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出庭者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博士——身份证号520790的持有者——就其于1944年2月至1945年1月在德国集中营关押期间的遭遇，做出以下证词：

1943年12月初，我打算与妻子随同其他人前往瑞士，但到了英特尔维的兰佐(注)时，我们立刻就被边境的法西斯保安队的一支巡逻队发现并遭到逮捕，他们把我们带至兵营，没几天后，我们在几名宪兵押送下被从那里转移到摩德纳的监狱，于1943年12月21日，又被从摩德纳转押到佛索利集中营。1944年2月22日，从佛索利集中营出发，经历约8天的旅程，我们抵达了奥斯维辛。

我们到达奥斯维辛的当天晚上，我妻子约兰达与其他300名妇女，连同好几百名男子，就被带往毒气室。

在40天的禁闭期间，我被刺上囚号174489，并被带往莫诺维茨集中营，在那里我足足待了11个月，直到1945年1月26日集中营被苏联人解放。

除了那个门格勒博士——为注定要去毒气室的不幸的受害者做最后诊断的那位党卫军上尉医生——以外，营地的其他指挥官的名字，我都记不得了。就是这位医生，足有四次把我淘汰了，因为每次我从他跟前走过时都对他说，我先前是个医生。不过，我不相信我之所以能活命，归因于他念及那种同行关系，而是因为他们当时已接到命令，要让营地

被遣送囚犯中的医务人员免于一死。

莫诺维茨是从属于奥斯维辛“领导中心”的100个集中营之一，跟其他集中营一样，那里不断发生的最骇人听闻的恐怖罪行，以及种种司空见惯的、无耻凶残的行径，均是按照集中营总部领导的指令实施的。

莫诺维茨营地并不是一座灭绝营（Vernichtungslager），就是说，押送到那里的囚犯并不是只囚禁几天之后就被野蛮地残杀（或者被集体枪杀，或者被毒气室息而死）。莫诺维茨是一座“Arbeits-lager”，即强迫劳动营，在那里，犹太人的死亡应归因于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短缺的膳食供应、非人能承受的艰苦劳动，以及没有足够能用来御寒防冻、对抗恶劣天气的防护措施；还得补充说的是，那些并非因病而死的囚犯，后来是因为体力极度衰竭，无法胜任所要从事的劳动而被送往毒气室窒息而死的。最后，有一些违反营地制度和纪律的囚犯被活活绞死，他们罪不当死，却受到这样可怖的惩罚，这是绝无仅有的卑劣的刑罚。谁能够判定一个有逃跑企图的囚犯是“罪犯”呢？然而，出于这样的理由，当着所有的囚犯面被绞死的不幸者的数目却相当可观！！！

当时我们就生活在最污秽不堪、令人作呕的杂乱的环境里，那里没有任何个人卫生可讲，也无法防御各种可能传染的疾病的侵袭。从到达营地的那天起，我们就被迫脱去自己的衣服，像被强制劳动的囚犯似的穿上破旧不堪的条纹帆布囚服，而那套囚服对我们来说，却意味着能用来挡风遮雨、御寒防潮的微不足道的屏障了。集中营供应的食物营养严重不足，每日分发两顿菜汤里面放有萝卜和白菜叶，数量少得可怜的面包里还夹杂着相当多极难以消化和吸收的成分。

另外，从抵达营地的最初几天起，我们就被迫去从事各种劳动，没有经过一段应有的培训期，所以没人有足够的才能和合适的体格可以胜任那些劳动。

从心理上和道德层面上看，这种生活条件也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因

为集中营的领导层下的命令，就是要在消灭人的个体之前，力图泯灭人的人格，通过从取消人的姓名开始——众所周知，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被一个刺刻在左前臂皮肤上的号码所代替。这样一来，人的心理价值或文化价值全被抹杀了，而每个人都毫无区别地从属于一个缺乏自身人格的群体，出于惧怕和为免受肉体上的惩罚而井然有序地活着。每个在押人员在短短几天之内，都沦为一头牲畜，其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能分得一份面包或一饭盒菜汤。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少人到达营地没几天就陷入极度的绝望，在遭受一系列的痛苦和暴力之后，他们情愿立刻死去也不想那样苟延残喘地活着。因而有的人决意走近通着高压电的铁丝网触电而死。

这导致了相当数量的人处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之中：这样的处置，并不亚于亲手把他们杀死。

在1943年年底之前，在押人员无论身体条件如何，一概都得被迫去干活，即便是重病在身，也从来得不到任何治疗。

自那以后，营地建立了第一批医疗服务设施，在德国医生领导下，在押的囚犯中的医生们都被编入其中。那些暂时不能干活的病人，经过一次粗略的体检后就给予几天休息；对于那些患上重病无法再从事劳动的人，医务所就是毒气室的候诊室了。在那里主要是进行筛选，那些最体弱多病的囚犯，凡是干不了重体力活的就预先被筛掉。这些不幸的人，连同肺结核病人、疟疾病人和梅毒病人，一起被送往毒气室去，他们虽然经临床治疗已经痊愈，但因为言谈不慎供认了自己以往的病史。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医务室的组织建制绝对是不充分的；与患者的人数相比，医疗场所的空间实在太过狭小；病患没有任何换洗的衣服，完全光着身子、两个人躺在同一张病床上，两条破破烂烂的被子肮脏不堪，上面带有最令人作呕的污渍。在一间隔离病房里，凌乱地成对躺着感染了最有传染性的疾病如伤寒、白喉、麻疹、猩红热、丹毒等的患者。营地里的传染病总是以局部流行的方式存在着。那样的一间隔离病房，收

容着那些不幸的患者，就在把他们送往毒气室之前，让他们在那里待上几天，或短短几个小时。

药品匮乏到几近全无，现存的少量的药品在分发给病人时也十分吝啬，以致用药毫无效果。实际上，这是让患者自生自灭，那些活下来的病人当中，大部分人的命运也并非多好，因为一旦从医务室出来，就意味着进入毒气室。

刚刚抵达这里的相当数量的囚犯，不知按照什么选择标准，也被带往毒气室。运送来自欧洲各地的放逐犯的列车一到站，人们刚一下火车，就很快被分成两个纵队，其中一个纵队的人数少一些，被带往不同的集中营去，而另一队人则立即被送去消灭掉。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1946年？

---

1. 英特尔维的兰佐（Lanzo di Intelvi），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科莫省。

审判霍斯[注]的声明

都灵，1947年3月3日

尊敬的被放逐的犹太人调查委员会（罗马）：

为了回应贵方上月28日的来件，我立即按照你们的要求，对于我亲身遭受的全部特别经历，面对华沙法庭做如下综述。

（1）我亲身经历了下述事件：我所在的集中营（属于奥斯维辛管辖的莫诺维茨）当时面临苏联红军的进攻，被仓皇逃跑的党卫军守卫部队丢弃后，有18名囚犯留驻在被丢弃的兵营里，等待苏军前来解救。没过几天，有一股失散的党卫军偶然途经营地附近，他们当时也在溃逃，他们对营地匆匆视察一番后，用手枪近距离把18名囚犯都杀死了，还把他们的尸体沿着大路排放好。他们显然并没有接到枪杀幸存囚犯的命令，他们完全是主动采取的行动。我可以辨认出那些党卫军的面容。

（2）正如我在第一份报告中已提及的，在奥斯维辛所用的毒药经由我查验证实，由德国企业研制出来并非为此特别用途。除了主要的毒物，它含有一种腐蚀和刺激黏膜的物质，因此会使受害者在死前最后几分钟内感到痛苦不堪。

（3）我所在的集中营内的囚犯，是在莫诺维茨的布纳工厂里从事劳动，那里距离奥斯维辛7公里，是由被任命为法本企业集团的化学工程师的潘维茨（Pannwitz）博士领导。我不知道此人是否已被列入被告名单之中，但我认为他是有罪的，因为他的要求极其苛刻，态度极端生硬，总让囚犯从事超负荷的劳动，往往超过任何合理的极限，而且他还

向党卫军无情地揭发劳工任何极小的过失。

（4）在营地工作人员的小范围内，我还记得门格勒博士的名字和他的模样，他是奥斯维辛所有集中营群落的卫生总监。另外，从我所在的营地里每天施行一切暴虐和卑劣行径的负责人当中，我能够容易地辨认出两个人：一个是德国“职业”歹徒（Lagerälteste），勃雷斯拉维亚人；另一名是营地头头（Lagerkapo），他自称是政治家，也是德国人。我本人曾被前者多次殴打出血，可我不知道那两个人的名字。

最后请允许我补充一些个人资料：我是化学系的大学毕业生，从1944年2月至1945年1月在奥斯维辛-莫诺维茨劳动营干活，我从未担任过集中营内的任何职务，也没有与集中营的领导合作共事过。我会讲法语、英语和德语。我已经持有正规护照。

按照规定要求，我附上居留申报书。顺致崇高敬意。

普里莫·莱维博士

1947年

---

1. 鲁道夫·霍斯（Rudolf Franz Ferdinand Höss 1900—1947），纳粹头子，于1934年加入党卫军。后任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1940—1943），1947年在华沙被绞死。

起诉霍斯的证词

尽管我被囚禁在莫诺维茨集中营（从属于奥斯维辛管辖之下的100个“集中营”之一）的时间延长至整整11个月（从1944年2月26日至1945年1月26日），对于名叫霍斯的被告，我无法确切提供特别的证词；但是，我能够回忆并揭发他们在那里普遍犯下的种种恐怖行径和残酷暴行，对此，我既是证人，也是多次受害者，但我不能断定，这些相当真实的恐怖行径，是否得归诸“集中营”总部的明文规定，抑或得归诸莫诺维茨集中营指挥部个人的肆意妄为。由于莫诺维茨的囚犯们所遭受的种种卑劣、无耻、凶残的暴行都有悖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法则，并且与从属于奥斯维辛总部的其他99个集中营里所施行的暴行完全雷同，因此，不难简单地推断出，这一切都是按照唯一的一个中心机构所颁布的强制性命令而执行的。

从理论上来说，莫诺维茨集中营并非是一种“灭绝营”，不是那种让被押送的放逐犯临时滞留几天，之后就将他们野蛮地残杀（或集体枪杀，或用毒气窒息致死），莫诺维茨是个强制劳动的集中营。不过，在那里的犹太人注定是被毁灭的命运，都归因于那里非人的生活条件、不足的膳食供应、极度的劳累，以及无法用来抵御严寒和恶劣天气的衣着。另外得补充一点，那些并非死于疾病的人，则因体力极度衰竭，以致无法胜任强加于他们的劳动，而被禁闭在毒气室里窒息而死。最后，就是其他那些违反营地纪律条规的囚犯，他们被活活绞死：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人性上来说，他们罪不当死，不该受到如此可怕的刑罚，那样做绝对是卑劣无耻的行径，简直是骇人听闻。谁能判处一个有逃跑企图的囚犯是“罪犯”呢？

我把强加于囚犯们的生活条件称作“非人的”。这不仅是从物质意义

上而论，因为当时他们都生活在极其污秽的、杂居的环境之中，肮脏得令人作呕，没有任何讲究个人卫生的可能，无法预防各种可能的传染病或感染。自来到营地之日起，他们就被剥夺所有属于个人的衣物，囚犯们一律凑合地穿上劳改犯似的破烂的条纹布衣，那囚服就成了用来为人体挡风遮雨、御寒防潮的可怜的屏障；营养严重不足，每天分发两次菜汤，里面放有萝卜和白菜叶，还有数量极少的面包，里面含有相当多的各种人体难以吸收消化的成分。囚犯们从刚抵达营地起，未经合理的培训期，就被指派去从事他们力所不能及的繁重的劳动，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技能和体力胜任这些劳动。而那些"非人的"生活条件，还体现在心理和道德层面上，因为营地的领导层在毁灭囚犯的个体之前，想先毁灭其人格，首先每个人的名字都用一个号码代替，他们把囚犯的号码刺在左前臂的皮肤上，无视其作为人的任何心理上和文化上的价值。所有人毫无区别地都属于一种没有人格、没有个性的群体之中，出于恐惧和生怕遭受体罚而井然有序地生活着。每个囚犯在几天之内就都沦为一头牲畜，对他们来说，唯一活下去的理由似乎就是领得每天配给的面包和一饭盒菜汤。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每个放逐犯的大脑最频繁的活动，也许就是琢磨着怎么以近乎合法的手段，为自己挣得一份额外的面包和菜汤，以及如何避开监工头助手们的监视，以求得稍微休息。

不难理解，不少囚犯在抵达集中营之后不久，心理就陷入深度的沮丧和失望，在遭受一系列的痛苦和暴力之后，他们情愿立刻死去也不想那样苟延残喘地活着，因而有的人决意走向通着高压电的铁丝网触电而死。能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中，这种罪孽并不亚于亲手把他们杀死。

营地里有一个医务所，那是临近1943年底建立的，在此之前，营地绝对没有任何医疗设施，囚犯一旦患病，不仅没有任何得到治疗的可能，还得照样被迫去干活，不管他们的身体条件如何。正是在1943年年末，第一批医疗服务设施在营地建立，与其说那是出于营地指挥部对囚犯的关切，不如说也许是因为某些当上医生的被拘禁人员个人的意愿，

他们热衷于被指派去干一种符合他们的天赋才能和体现自己文化素养的工作。接下来，围绕着这个医疗服务设施设置了各科诊室，就诊的病人在那里进行粗略的体检，如果被确诊一时无法从事劳动，就可获得几天休息，这样就设立起了一个真正的医务室。尽管患者在医务室能得到一种不算差的治疗，那些病情不甚严重的囚犯，治愈后可以重返劳动岗位，但对于大部分患者来说，诊疗室只不过是进毒气室的候诊室而已。实际上，所谓的“筛选”，主要就是在医务室里进行的，体质虚弱的患者、健康状态差的囚犯、不能胜任分配给他们的苦力活的人就会事先被淘汰。这些人就被送往毒气室，肺结核病人、疟疾病人、梅毒病人跟他们一起——后两种病人临床曾得以治愈，仅仅因为不慎泄露自己的病史而被发现。

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医务室的建制绝对是不充分的：与患者的人数相比，医疗场所的空间实在太过狭小；病人没有任何换洗的衣服，完全光着身子卧床，两个人卧躺在同一张病床上，两条破破烂烂的被子肮脏不堪，上面还带有令人作呕的血迹和污渍。在一间隔离病房里，凌乱地躺着感染了最具传染性的疾病如伤寒、白喉、麻疹、猩红热、丹毒等的患者，营地里传染病总是以局部流行的方式存在着。

无须提及，大部分必不可少的药物都短缺，其他的药物也很少，分发药品给病人时很吝啬，以至于用药毫无效果，实际上是让患者自生自灭。那些幸免一死的人当中，大部分人的命运也并非多好，因为一旦从医务室出来就意味着进入毒气室。

有一定数量的囚犯刚一到就被送往毒气室，不知道是依照什么标准选择的。那些由列车运载来的囚犯，下车后立刻被分成两个纵队，一个人数较少的纵队，被送往奥斯维辛属下的一个集中营，而另一队人则被赶着登上卡车，立刻被带往灭绝营处死。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1947年

被囚禁的一位难友的证明

万达·马艾斯特罗（Vanda Maestro），自1943年7月25日起与行动党[注]成员有接触，同年12月在瓦莱·达奥斯塔[注]加入一个当时正在组建的游击支队，并在其中担任多项职务（与山谷里的人联系，分发传单，偶尔负责侦察德国长官们和法西斯分子的行动）。当时她24岁，刚获得大学文凭不久。

见过她沿着那些被白雪覆盖的小径行走的人，都忘不了她那张和蔼可亲的小脸，却又看得出她一脸掩饰不住的疲惫和极度的紧张。因为对她来说，就像在那种年代里、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生活的优秀人士一样，要做出那样的选择纯属不易，也并非一件快乐的事情，而是充满种种难题。

万达过早地失去母亲，所以她生性极其敏感，心思缜密，经常能猜透她周围的人最隐秘的想法。她的思维敏锐、为人中肯又正直，她疾恶如仇，但涉世甚浅，对人世间的种种阴谋诡计和阴暗陷阱不善设防，她不善幻想又痛恨自欺欺人的谎言。因此，她比谁经受的痛苦都要多，却几乎有着一种忍受痛苦的无尽力量。人们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持续的、自觉的、默默强忍着的痛苦的深渊，这使所有人对她肃然起敬。

当然，她并非是一位天然的女中豪杰，她也怕死，除了怕死，她更怕遭受身体上的痛苦。她在那些日子里表现出来的毅力是逐渐孕育起来的，使她不时得以焕发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

然而，万达的游击队经历是短暂的。12月13日，在德国人对活动在邻近山谷里的一支重要的游击队展开的一次大扫荡中，万达被当场捉住。她被逮捕后，立即被押送至达奥斯塔，受到长时间的审讯。她巧妙

地做出回答，使德国人无法找到她在游击队活动的具体证据；但因为她是犹太人，就被押送到佛索利收容营，继而又从那里被押往名声赫赫的集中营——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女子集中营。

这位温良忠诚、落落大方的小女子，在这里遭受了最为可怕的摧残，慢慢地熬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那是连一个个铮铮傲骨的男子汉都难以承受的，恨不得让自己最深恶痛绝的敌人遭受这样的命运。从比尔克瑙回来的人，都向我们谈起万达，说她从进入营地那天起，就受尽种种令人发指的折磨，而她那种惊人的洞察力，又令她毅然拒绝种种可鄙的骗局，那是人们往往在极度痛苦的深渊中所不得不屈从的。她对人们讲述她那可怜的脑袋上的头发如何被剃光，她的四肢如何因疾病和饥饿而很快变得软弱无力，以及她在集中营直至肉体被毁灭之前，所遭受到的种种凌辱和摧残的全部过程。

对她的结局，我们都知道，或者几乎都知道。她的名字被宣布列入女死刑犯的名单之中，我们知道她是怎么从医务所的病床下来，又怎么（在意志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前往了毒气室和焚尸炉。

普里莫·莱维
1953年

---

1. 意大利行动党（Partito d’Azione，1853—1870），原由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创建，后归属“正义与自由”反法西斯民族解放阵线的费鲁乔·帕里（Ferruccio Parri，1890—1981）领导。
2. 瓦莱·达奥斯塔（Val d’Aosta），意大利北方的一个大区。

周年纪念

集中营解放至今已经10年了，人们不得不看到，有关死亡营这个远未成为历史的论题，已经趋于被完全忘却的局面，至少在意大利是这样，这未免令人感到悲怆，而且意味深长。

在这种场合下，回忆那些数据是多余的。提醒人们集中营涉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其实际上是要把东欧的整个犹太民族全部灭绝，也纯属多余；提醒人们，如果德国纳粹当初能使其种族灭绝的计划得逞，那么以德国人出名的严谨和认真态度，其在奥斯维辛以及其他地方试验过的伎俩，将在世界各大洲全面推行，这同样纯属多余。

如今，谈论集中营是粗俗之举。往最好的方面设想，会被人指责为弘扬牺牲精神，或是偏执于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议题；往最坏的方面设想，会被人指责只不过是纯粹的谎言，甚至是对廉耻的亵渎。

然而，这种沉默是有理由的吗？我们这些幸存者应该容忍这种沉默吗？那些出于惧怕和反感而变得麻木的人，他们在鞭笞、谩骂、野蛮的吼声中，目睹过闷罐车出发，几年后又看到极少数幸存者心力交瘁地回来，他们能容忍吗？当初觉得那种一定要带回证据的使命乃是一种需要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今认为那使命业已完成，这难道正确吗？

回答只能有一个：忘却是不容许的，沉默是不容许的。如果我们都沉默了，那谁站出来说话？当然不是那些罪人和他们的同伙。倘若没有我们的证据，当初纳粹分子的残暴兽行，由于它们本身的异乎寻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被弃置在传说之中了。因此，需要站出来说话。

如今沉默已蔚然成风。有一种沉默是不安的良心的产物，甚至是丧

失良知的产物。那些被他人怂恿或胁迫而发表一种看法的人，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转移讨论的方向，把核武器、恣意的狂轰滥炸、纽伦堡的审判、复杂的苏维埃劳动营等论题混淆在一起：这些论题本身并非无足轻重，但对于从道义上解释当初法西斯的罪行来说，总体上是无关紧要的，法西斯们所采取的惨无人道的方式和举措构建了一座凶残暴行的耻辱之碑，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

但应该提到的是，这样的沉默、这种知而不语、这种避而不谈所蕴含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在德国，人们对此缄默不语，法西斯分子对此保持沉默，这很自然，其实，他们不说也罢。无论他们说什么，对我们都毫无用处。我们并不指望他们做什么可笑的解释。然而，对于文明世界的沉默，对于文化的沉默，对于我们本身的沉默，面对我们的子孙，面对长年被放逐在异国他乡后归来的朋友们，我们该说什么呢？不应该把这种沉默归诸身心的疲惫和年华的耗竭，或归诸对“生存的第一需要”（primum vivere）的正常心态。不应该把沉默归诸懦弱。我们身上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更正当的诉求，在许多场合下，它劝说我们对集中营的往事缄默不语，或者淡化和非难这些事件留在我们记忆中依然栩栩如生的形象。

这是耻辱。我们是人，跟杀害我们的刽子手一样，同属于人类大家庭。面对他们异乎寻常的滔天罪孽，我们感到自己同样是索多玛和蛾摩拉[注]的子民；一位境外的法官就有关保护我们自己的证据将向整个人类提出控告，我们无法认为自己是局外人。

我们是当初奥斯维辛所在的那个欧洲的子弟：在我们生活过的那个世纪里，科学被扭曲了，孕育出种族迫害的法令和毒气室。谁能说自己有把握免受感染？

还值得一提的是：谁要是读过《黑夜的武器》[注]，对这些痛苦坎坷的往事就不会感到新鲜。把死亡营里无数受害者的死亡称作一种荣耀，

那是毫无价值的。那不是荣耀，那是手无寸铁、软弱无奈、赤裸裸的死亡，是不光彩的、可耻的、污秽的死亡。受奴役并不体面，当初有人曾心甘情愿地忍受奴役，这应该被视作例外，令人诧异；但那种奴役制度本质上是使人处于一种卑贱的生活状态，几乎是诱惑人堕落和道德毁灭的根源。

应该把这些事情告知世人，因为它们是真实的。不过，得弄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把受害者与刽子手混为一谈：这并不减轻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的罪孽，恰恰是百倍地加重了他们的罪孽。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表明了，多少世纪以来，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人类身上，竟然留存着那种令人无法预料的潜在的凶恶和疯狂，这是恶魔的行径。他们固执地创造出制造死亡和腐败的庞大机器，难以想象世上还会有比这更大的罪恶。他们凭借仇恨、暴力、谎言，目空一切地建立起他们的王国，他们的失败是对世人的一种告诫。

普里莫·莱维

1955年

---

1. 索多玛（Sodoma）和蛾摩拉（Gomorra），巴基斯坦南部古城名。据《圣经》记述，为了惩罚那里施行鸡奸的居民，上帝曾用火雨把这两座城连同其他一些城市都烧毁了。
2. 《黑夜的武器》（Les armes de la nuit，1953），法国小说家让·布吕莱（Jean Marcel Bruller，1902—1991）的作品。

揭发约瑟夫·门格勒[注]大夫

本人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博士，1898年9月15日生于都灵市，家住该市乌贝托国王大街61号，职业：外科医生。应“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之要求，将我有关揭发前党卫军上尉军医（hauptsturmfuehrer）、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曾任医师的约瑟夫·门格勒博士的材料，由该委员会提交给弗莱堡地方法庭的检察院，以便于其按法律程序着手把他从阿根廷引渡归案。

本人声明如下：

我以犹太人身份于1944年2月20日从意大利被遣往波兰，并于1944年2月26日晚抵达奥斯维辛火车站。我乘坐的列车上装载有650名囚犯，其中最年长的是85岁，最年幼的仅仅6个月。我刚下火车，他们就在火车站的同一个站台上举行第一次筛选：我有幸被视作相当年轻的壮劳动力，可我的妻子（当时她跟我在一起，而我们不得不因他们野蛮的行径骤然分离）在当天夜里就被送往毒气室，这是我后来在集中营被解放后，从逃生出来的几位女难友那里得知的。就在当夜，我和其他95位难友被直接押往莫诺维茨-布纳工厂，在那里我接受的囚犯编号为174489，并一直在那里逗留至1945年1月17日，就是被苏联红军解放的那一天。在整整11个月里，我被迫在不同的“劳工队”里当小工，干的都是些十分累人的体力活，不是当装卸工，就是当搬运工，由于从未能在劳动营体现我作为一名医生的价值，所以我就不可能以医生的身份或者仅仅作为一个简单的护士而进入医院。

由于得承受极其艰苦的劳动——就像其他囚犯一样——我的身体状况自然迅速恶化，几近崩溃的地步。对此，在这里我不予赘述，也因为

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生活条件，如今已众所周知。就这样，正如大家所获悉的，在集中营里不时地进行所谓的“筛选”，就是对囚犯的健康状况进行那种检查，以测定其是否还能胜任劳役——由于极度劳累和繁重的工作，由于饥饿或疾病，那些体质呈现衰竭状态以至于无法再胜任极度艰苦的劳动的人，就都被送往毒气室。

在莫诺维茨集中营进行的这种筛选，分两个时段：第一次筛选由党卫军的一名军官主持，并由营地医院内的医生协助；几天之后，门格勒博士来到营地，由他通过第二次诊断加以核准，这次体检也同样快速和草率。正如我所说，两次体检都是令人可笑地敷衍了事：仅仅对囚犯看上一眼，就对囚犯做出诊断。如果说，经过第一次体检还能乐观地抱有哪怕是十分微小和天真的生的希望的话，那么第二次筛选——就是由门格勒博士进行的检查——则是决定性的，意味着一种终极审判，做出一份无以更改的死亡判决书。

门格勒博士总是身穿笔挺的军装出现在营地，显得很气派，也很高雅，他穿着铮铮发亮的长筒靴，戴着一副皮手套，手持一条牛筋鞭子。在进行令人毛骨悚然的“筛选”时，他却面带微笑，露出一种几近亲切的神情；他手持牛筋鞭，目光随着在他面前鱼贯而行的赤身裸体的囚犯而移动，他们在经过他跟前时就停留片刻，而他却总是以极其冷漠的态度指定囚犯站到他似乎正确无误判定的那个队去：左边那个队，是被判定去毒气室的人；右边那个队，是那些他判定还能干活，至少能坚持到下一轮“筛选”的人，他们是极少数的幸运者。

说到这里，必须提及关于我自己在“筛选”中四次面临门格勒博士的检查时，是如何每次都能成功地躲过终极判处那一劫的。为此，得允许我先讲一段幸运的插曲，那是我抵达莫诺维茨营地的头几天里发生的事：在指派我去那里干活的“劳工队”里，我有幸遇上了一位劳工，一位已上了岁数的营地老囚犯，他让我获悉集中营里生活的种种规章制度、各种禁忌以及制约营地活动的种种危险。他是一名阿尔萨斯的医生，叫

克罗兹（Klotz），好像是斯特拉斯堡人。不幸的是，不久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也不再知道有关他的任何消息；对此，我感到很痛苦，至少是因为我从未能向他表达过我的感激之情，感谢他给予我的那些宝贵的建议，我认为自己最终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多亏他所提示的建议中的一条。确实如此，其他的且不说，他嘱咐我得永远记住，不管自己处于何种逆境，务必表明自己当医生的资质，特别是当自己被列入某个囚犯名单中，待转往别处去的时候，尤其是被“荣幸地”告知，要被遣往某个所谓干轻活的劳动营去时。他暗示我这种“转送”所包含的危险，却不想确切地说明究竟是关乎什么，也许他是为了不让我太害怕，他是不想确认——尽管并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毒气室的存在，其实我对此早有耳闻。他只对我说，莫诺维茨劳动营里肯定没有毒气室；他说在别处也可能有那种毒气室，尽管他从未见到过；无论怎样，最好是千方百计地设法留在莫诺维茨，因此，在遇到有危险的情况时，获救的唯一可能，就是亮明自己医生的身份。

我一直没有忘记他的这条建议，每次当我不得不排着队从门格勒博士的面前经过时，我都鼓足勇气用德语大声地说：“我是意大利医生！”于是，我的生死判官就向我提一些问题，以核实我所说的话的真实性，然后就指派我站到获救者的那个队列中去。

我不知道对于医生的这种关注，是出于门格勒博士一种个人的主观意向，还是他仅仅是服从上面下达的指示，不杀害当医生的同事。我绝对无法认为这只是一种假设而不是别的，虽然我认为后一种假设更说得过去些，而这是基于某些更符合逻辑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不认为党卫军上尉军官门格勒博士能够无视其党卫军的思维方式而顾及某个群体的一种特殊的职业地位，对囚犯做出别样的判断：不管是不是医生，站在他面前的不过都是些犹太人，而既然是犹太人，作为劳工，只要在其身体条件已无法胜任所要从事的劳动时，就都得被杀死；而他——作为党卫军上尉军医——不能因为谁在职业上是同行（这样一种平淡无奇的偶然巧合）而心慈手软，背弃他曾发誓过要至死不渝地效忠的纳粹主义的

基本理论原则。

因此更有可能是，他仅仅是服从所接到的上面颁发的指令而放过犹太医生，因为德国人考虑到在当时或将来的局势下，那些特殊的犹太籍个人，兴许还有可用之处。

不管怎样，即使这种假设没有多少根据——反之，就算第一种假设更站得住脚，亦即门格勒大夫当初不杀犹太人医生是出于个人的意向——也不足以减轻其所犯罪行的本质。门格勒博士以他当医生的职业行为，嘴上挂着微笑，无动于衷地用一个小小的手势把成千上万名不幸的受害者送向死亡，他所救下的也仅仅是其中极少数的生命。

至于我，能揭发的就是当年我直接看到的门格勒博士的罪行。比如，在使用“人体鼷鼠做生物实验品”的所谓科学研究中，我并不知道他起过多大作用，我不知道在那种研究中，他个人参与过多少；已经有人就这方面向他提起诉讼，这我知道，不过我不具备支持这些审判的确实的证明材料。不过我觉得，仅仅就他在组织和决定杀死那么多人（对此，我完全有把握做证）这一罪行中所扮演的角色本身，就足够罪大恶极，就应该对门格勒博士予以最严厉的判决和最不能姑息的追责。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约1959年

---

1. 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 1911—1979），医学博士，党卫军上尉军医，1943年5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任主任医生。战后被判为一级战犯，曾潜逃至阿根廷。1979年2月因心脏病突发而溺水猝死。

给要求知道真相的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女儿的回信

一位女读者给我们的来信中写道：

我上中学二年级，跟我的许多女同学一样，我去参观了星期日闭馆的德国集中营的展览。后来，大家对展览议论纷纷。有人持怀疑态度，有人说展览只是为了做反德宣传；有人说，其中有夸大的成分，而有人断言一切都是真的。

我的同学当中有人说："假如那些事情真的发生过，那在我们的历史书上应该有某些痕迹。"另一位女同学说："如果那些照片的确是真的，我觉得就应该把它们放大，用来搞一个像玛达玛宫[注]中的'人类之家'那样大的展览。"另一些同学还说，他们不让我们学习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是因为发生过的事情实在太可怕了。老师们认为那么想的人是有道理的，他们叹息道："很遗憾。"可我希望有人能给我讲述更多些。我，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女儿，被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吓坏了，我祈求过上帝，但愿我父亲在这场大屠杀中是无辜的。

另外，我想对举办展览的那些人说，得把展出的空间搞得更大些。为了能看到整个展览（许多画挂得太高，我无法看得很仔细），我不得不足足去了三次。

要求知道真相的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女儿

《新闻报》，1959年11月29日，《时代之镜》栏目

《这是不是个人》，一部有关死亡营的书，如今已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其作者普里莫·莱维在给我们的来信中写道：

我想以“德国人集中营图片展览”举办者前“被放逐囚犯全国协会”的名义，对“要求知道真相”的小读者表示感谢，因为发表在《时代之镜》栏目中的来信，正是我们所一直期待的。

姑娘啊，那些图像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些事情确实发生过，而且就是这样发生的：它们并非发生在几个世纪之前，也并非发生在遥远的国度里，而是就发生在15年前，在我们这个欧洲的心脏里。谁对此抱有怀疑，只要乘坐一列火车，前去参观一下在那些令人悲怆之地留下的痕迹，一切就昭然若揭了。而且甚至无须那样做，因为在这里，在我们的城市中，就有几十位目击证人，还有成千上万的死者（其中也有妇女和孩子们，是孩子啊！），他们混杂地葬身在那些白骨堆里，用他们的缺席，用他们自身留下的空白证明了这一切。

我们理解“叹息着说‘很遗憾’”的那些老师们，但是我们不能苟同。不能因为那些发生过的事情骇人听闻而不让世人知晓，他们跟我们一样也都是人，当年那些大肆屠杀的罪人和要犯也都是人：他们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感到羞耻，宁愿缄默不语，这并不奇怪，许多人也是无辜的。但沉默是一种过失，在这种情况下，简直就是一种犯罪：展览（出乎意料地）获得成功之本身，就证实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人们都渴求知道真相，因此，真相不该被隐藏起来。无辜者的羞耻和沉默会掩饰责任人有罪的沉默，并延迟和使其逃避历史对其做出应有的判决。

我也希望小读者的父亲是无辜的，而且很有可能他就是无辜的，因为当初在意大利，事情的进展有所不同。但展览并非是为父辈们举办的，而是呈献给子子孙孙们的，目的是向人们揭示，在人的心灵深处，究竟保存着多少残忍的本性，并告诫人们有哪些危险过去和如今一样地在威胁着我们的文明。

普里莫·莱维

《新闻报》，1959年12月3日，《时代之镜》栏目

1. 玛达玛宫（Palazzo Madama），都灵的历史性建筑物，在意大利历史上曾是撒丁王国时期众议院议会（1848—1865）和意大利上议院所在地（1860—1864），如今是一座博物馆。

都灵的奇迹

没有人会想到，“被放逐的犹太人”的展览以及接着在卡利涅亚诺宫的文化协会举行的与年轻人的两次谈话，竟然取得如此的成功。来参与谈话的人数很多，主要是年轻人，但不光是年轻人。他们饶有兴趣地聆听谈话，提出的一些很中肯的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整整两个晚上，他们都紧紧地围在那些肩负着使命的发言者的身边。他们努力想通过一种有人性的接触，来知晓不同于在学校课堂上听到的一些事情。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中可明显地看出，他们不仅需要了解事实，而且想深入错综复杂的（对他们以及其他人来说是模糊不清的）许多“为什么”和“怎么样”之中。

“谁该承担大屠杀的责任？”“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纳粹法西斯要把犹太人全都杀绝？”“在那种令人绝望的形势下，为什么那么少的人能够自卫？”“集中营在历史上有过先例吗？”

正如人们所见，这些问题富有意义。总体来说，它们似乎表明了一种占压倒性多数的想法，而且相当明确，也就是说，反映了从根本上一无所知却又渴望知情的年轻人的那种思想状态。他们反对暴力和妥协，他们比所预见的要更加远离当初那种野蛮残忍的世界，因此，对于延续至现今世界上的一切残忍和凶险的事物，他们同样也毫无防备、无能为力。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种印象，还是一种很难把它引申到评判意大利整个年青一代的印象。卡利涅亚诺宫的“样本”并非是一般性的平均的样本，然而重要的是它能使人察觉到，在垮掉的年青一代和迷茫惶惑的年青一代身边，也存在如此纯洁的年青一代，他们是警觉、认真的，而且

是好奇的。另外，大家都知道这牵涉某些思想理念和某些精神状态，它们一旦开始传布并进入特定的环境之中，就会开始以其本身的生命力而经久流传。

也许，必须经历15年的岁月、半辈子的工夫，才能在这样一些接触中找到正确的基调；不过，现在所有在场的人共同的印象是：时间成熟了，不再是沉默的时候了。我在卡利涅亚诺宫答应过要与年轻人接着做其他一些对话，但愿如此长时间的、反常的沉默能最终被打破。

普里莫·莱维

1959年12月

---

1. 卡利涅亚诺宫（Palazzo Carignano），都灵巴洛克式的建筑，曾是当年撒丁王国众议院所在地，系建筑师瓜里尼（G. Guarini，1624—1683）之杰作。

德国纳粹党的时代

在都灵低调揭幕（人们可以这么说）的“被放逐的犹太人”展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展出期间的日日夜夜里，密密麻麻的人群，面对那些可怕骇人的形象，无时无刻不深受感动，闭幕的日期不得不两次推迟。而接着在卡利涅亚诺宫的文化协会举行的两次与年轻人的交谈所受到都灵公众的欢迎程度，也同样出人意料。出席的公众人数极多，他们专心致志，又若有所思。这两次活动本身所取得的积极的正面成果，值得让人深切关注，这不容小视的成果蕴含着一种责备：也许已为时太晚，也许我们已浪费了许多年华，我们在该说话的时候沉默了，我们辜负了一种期待。

然而，展览和谈话的成果也包含一种教训（其实并非是新的教训，因为无论怎么说，人类世俗的历史就是一系列的重新发现）：在我们这样喧嚣而又浮躁的年代里，充斥着各种公开的宣传和潜在的诱惑，还有浮夸的华丽辞藻，以及卑鄙的妥协和丑闻、疲惫而失去活力的社会，真理的声音非但没有消逝，反而赢得了一种新的音色、一个更清晰的亮点。看上去太过美好而似乎有点失真，然而，恰恰就是如此：对已写下的、业已发表过的言语广泛的低估与鄙视并非是最终极的，也不是全面、普遍的，有些东西获得了拯救。如今谁说真话，依然受到关注，并且依然被人们相信，尽管这似乎挺奇怪。

这是值得庆贺的，不过，这种信任的表现包含着一种期许，它迫使人扪心自问：如何把我们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精神上和感情上的一份财富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而在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上，我们是不是也错了呢？很可能是的，我们错了。我们犯了既遗忘又没有尽到责任的过错。我们沉默了，犯了怠惰的过错，而且犯了对言语的功能丧失信心之

过错；当我们开口说话了，却常常采用并接受一种并非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这又是我们的过失。我们深知，抵抗运动遭遇过一些敌人，而且现在仍然有敌人，这些敌人仍然采取各种手段，让人们尽量少谈及抵抗运动中发生过的一切，这很自然。不过，我怀疑，这种或多或少有意而为的打压手段，采用的是最微妙的方式，也就是事先用抵抗运动的历史作为摆设，把其恭恭敬敬地供奉在“祖国之历史”这座高贵的城堡之中。

令我担心的是，如今我们也煞费苦心地参与这种华丽包装的过程。我们经常采用一种过分华丽的辞藻，一种歌功颂德的、赞美的却也是空洞的语言来描述和传播昨天的历史。有人把抵抗运动说成是“第二次民族复兴运动”，人们可以用最好的论题支持或否认这种提法，但我自问，强调它的这一面是否合适，抑或不如坚持这样一个事实：抵抗运动在继续，或者说，至少应该继续下去，因为抵抗运动的目标只是部分地达到了。事实上，人们热衷于从1848年、1860年、1918年、1945年的历史事件中，断定那是这种理想的一种继续，却不屑于考虑从1945年至今，这种更令人忧虑和更为明显的抵抗运动的继续：20年法西斯统治的休止符号在逐渐淡去，但法西斯的阴魂不散。

总之，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孙们能听到这些声音，而且代代相传，我们就应该少对他们谈什么荣光、胜利，少说些英雄主义和神圣的使命，而多讲些那种艰苦的、充满危险的毫无价值的生活；多讲讲当初日复一日所遭受到的折磨，那些交杂着希望和绝望的日子；多讲讲我们那些死去的难友以及他们默默地接受了的职责；多讲讲人民的参与（但不是全部人民）；多讲讲我们所犯的错误和避免了的错误，以及那些地下活动和军事行动的经验，那是通过犯错误好不容易获得的经验，人们为此是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也要讲讲各个政党的组建中进行的艰辛的协调（并非是自发的，也不总是完美的）。

唯有这样，年轻人才能听到我们最近的历史，它如同用人类历史事件所构成的一幅织锦，而并非是为政府内阁名目繁多的政纲增添的一个

砝码[注]。

普里莫·莱维

1960年

---

1. 原文为“pensum”，拉丁文，原意为“重量”“分量”，这里译为“砝码”。

审判艾希曼[注]的证词

1960年6月14日，罗马

普里莫·莱维博士的证词

家住都灵，维托利奥大街67号

1943年9月9日，我跟一些朋友一起躲在瓦莱·达奥斯塔，确切地是在靠近维琴特（Vincent）车站的布鲁松小镇，距离大区首府54公里的地方。

先前我们组建了一支游击队，我记得其中有不少犹太人，如圭多·巴基（Guido bachi），目前是以奥利维蒂（Olivetti）公司代表的身份待在巴黎，还有切萨雷·维塔（Cesare Vita），以及后来与莫米利亚诺结婚的露恰娜·尼幸姆（Luciana Nissim），目前定居在米兰，是《对抗魔鬼的女人》一书的作者，还有万达·马艾斯特罗，被放逐后死于一所死亡营。

有一个名叫梅奥利（Meoli）的家伙，也加入了我们一伙儿，因为他是一名内奸，不久后就出卖了我们。除了切萨雷·维塔成功地逃走之外，我们全都在1943年9月13日被捕，并被押送至达奥斯塔的法西斯国民卫队的兵营里。在那里我们遇见了法西斯国民卫队队长费洛，他得悉我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后，对我们相当友善，他后来于1945年被游击队击毙。我应该承认，作为游击队员，我们当初相当缺乏经验，不过法西斯军士们显得更缺乏经验，搞了种什么“审判”。他们之中有一个阿尔托-阿迪杰[注]人，讲一口标准的德语，有某个叫卡涅的人，他之前曾出卖过另一支游击队，也有“我们的”这个梅奥利。他们指望从我们嘴里得知其

他游击队员的名字，尤其是那些头头们的名字。尽管我们都有假文件，但我们立即声明自己是犹太人，这样做的结果对我们相当有利，由于他们对我们的屋子搜查得那么粗糙，连我事先已经藏在屋子里的地下活动传单和左轮手枪都没有搜出来。国民卫队队长得知我们是犹太人，而不是“真正的游击队员”，就对我们说：“你们不会有任何麻烦的，我们把你们送到摩德纳附近的佛索利营地去。”

他们按时发给我们供给士兵们食用的饭菜。1944年1月底，他们用一列客运火车把我们送到佛索利。

在那个营地里当时我们过得相当好，人们不谈论大屠杀，而且气氛足够平和，他们允许我们留着随身带着的钱，也可以接收从外面寄来的钱。我们轮流在厨房干活，而且也在营地干别的差使，还建了一个食堂，可实际上没什么吃的！

我在佛索利遇上了阿尔图罗·福阿（Arturo Foà），他是都灵人，我们得知他与法西斯主义有共鸣后，就对他相当不信任；还有威尼斯犹太人贫民窟里的所有乞丐，以及那个收容所的老人们。记得有某个叫斯卡拉梅拉（Scaramella）和一个叫乌西利（Usigli）的女难友。

那里还有两三百个南斯拉夫人和一些英国平民百姓。

2月18日，当得悉德国党卫军来到那里时，大家都惊恐万分，果然，第二天我们就得到通知说，在24小时之内得启程。没有人企图逃跑。

他们把我们装上运载牲口的车皮，上面写着“奥斯维辛”的字样，那个时刻，我们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旅程持续了三天半，我们事先集体准备了一路上吃的食物，那是他们允许我们带着上路的。我们是650名犹太人……

一路上，党卫军押送队对我们很凶残，很不人道，很多人被殴打出血。抵达奥斯维辛之后，他们问我们谁能从事劳动。我们之中有96人做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们就把我们带至莫诺维茨-布纳，距离奥斯维辛7公里的地方：26名具有劳动力的女子被带往比尔克瑙劳动营，其他所有人都被送往毒气室！！！

在我们的劳动营里有几位犹太人医生。我记得有科恩卡（Coenka）大夫，雅典人；威斯（Weiss）大夫，斯特拉斯堡人；奥伦斯茨忒因（Orensztejn），波兰人。他们表现得相当好，但对于萨姆艾利迪斯（Samuelidis）大夫，沙罗尼克人，我不能予以同样的评价，他对于前来求医的患者很不耐心，还向党卫军告密，揭发病人！！！相反，有好几个名叫莱维的法国医生，都显得相当有人性！

我们的劳动营营长名叫约瑟夫·勒辛（Josef Lessing），荷兰籍的犹太人，是职业的乐队乐师，有20至60人归他指挥，作为98号劳动营的负责人，他不仅凶狠，而且对人刻薄。

那个营地里的劳工中，我记得有一个叫迪·波尔托（Di Porto）的罗马人，还有一个人叫帕翁切罗（Pavoncello）。莱洛·佩鲁贾（Lello Perugia）也是罗马人，艾乌吉尼奥·拉文纳（Eugenio Ravenna）是一个商人，乔治·科恩（Giorgio Cohen）是弗拉拉人，还有一个从特里亚斯特来的半个希腊人韦内其亚（Venezia）。那个劳动营的劳工中有95%是犹太人！我在其中服务的工厂领导，当时不愿意承认我们依法应得到报酬；于是，就在我被遣返回国很多年后，集中营存活者们按照一项法律条款，向那家工厂提出审判后，他们就承认错误并偿还我80万里拉的酬金，作为对我的补偿！

苏联军队抵达后，我们又被转押至奥斯维辛集中营，等待能否遣返回国。

漫长的回国历程相当惊险离奇，苏联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有从海

上回国的可能，就索性让我们在敖德萨[注]上了船。

他们先把我们转送到卡托维兹，然后抵达明斯克和斯卢茨克[注]。感谢上帝开恩，最后我们终于回到了意大利。

普里莫·莱维

1960年

---

1. 阿道夫·艾希曼（Adolfo Otto Eichmann 1906—1962），党卫军军官，屠杀犹太人的主要策划者，被称为“死刑的执行者”。1962年被以色列法庭判处死刑。
2. 阿尔托-阿迪杰（Alto-Adige），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城市。
3. 敖德萨（Odessa），原苏联乌克兰共和国的城市。
4. 斯卢茨克（Sluck），位于白俄罗斯明斯克以南大约60英里的村庄。

为审判艾希曼提供的证词

纳粹集中营被捣毁至今已过去很多年了。对于全世界来说，那是充满重大事件的年代，而对于我们这些幸存者来说，则是弄清真相、澄清史实的年代。因此，如今我们有能力说明当初一时无法说清楚的事情，当初刚刚获得解放的我们，可以说还沉醉在重新赢得新生的迷惘之中。如今，在我们身上，而且在所有人身上，有一种更为宽阔、更为开放的意向，它取代了一时的心灵冲动、满腔愤怒、怜悯同情和难以置信的惊愕。我们个人的故事，从感人的新闻报道，趋向变成人类的历史。

我想，这应该归诸年轻人对我们的话语所表现出的重新关注，一种新的氛围建立起来了，做出一种判断的时机成熟了。

我们很高兴察觉到这一点：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采取反对我们的立场，没有任何人为当初迫害我们的人公开做辩解（有些不正常的人这样做了，不过，他们恰恰就是不正常的人）。然而，在我们与公众至今已有无数次的会面中，公众频繁提出的有两种异议。为什么你们有偏心？为什么你们只谈纳粹集中营，避而不谈最近历史上其他黑暗的篇章呢？抑或是更为普遍的异议：为什么你们不断地向我们谈论恐怖呢？

对于第一个异议，我觉得有义务做直接的回答：我们对你们谈论纳粹集中营，是因为我们曾经在那里逗留过，因为它们构成人类历史上最无耻卑鄙的一页。你们在展览中、在都灵这里看到的那些形象，都是我们直接经历过的，那些形象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它们对我们产生过极大影响；这些考验和磨砺丰富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成了评判者。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人犯过其他的罪行，而且还在不断地犯罪——我们的谴责是引申地指向所有这些罪恶的。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我们

听说的所有消息，大屠杀、种种的刑罚、闷罐车、无辜百姓白白遭受的痛苦，以及种种不公正的行为，每一个消息都与我们有关，都令我们动容——我们谴责这一切罪恶。无论谁向世人讲述残杀妇孺的暴行，不管那些暴行出于何人之手、发生在地球的哪块土地上，也不管他是以何种思想的名义行事，讲述者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都声援他。

不过，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为我们曾经目睹过的一切暴行提出证据，这里就牵涉第二种异议。你们为什么还要谈论那些残暴的行径，事情不是都过去了吗？如今的德国人不是已经表示要与他们的过错决裂吗？为什么还要散布另一次仇恨呢？为什么要搅得我们的儿女们局促不安呢？

类似这样的问题往往是产生于不信任或怀疑的心态，但也不尽然；不管怎样，人们可以用很多方式予以回答。不错，人们可以认为，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述出来，为了使所有人的道德良知保持清醒，并起来反抗，筑起堤坝，使将来人们的一切空想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使人们永远也听不到谈及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我们也应该永远提醒世人，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弥补，许多责任人逃脱了一切制裁，而且因司法的疏漏只有部分责任人偶然地落入法网；也应该提醒世人，那些幸存者本身以及无数受害者的家庭，尚未得到任何认可或帮助，没有得到即便是微不足道的赔偿。

不过，我觉得问题的核心不在这里。我觉得，即便在一个奇迹般稳定的、拥有法制的世界里，即便假设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威胁到和平的世界里，一切暴力业已消逝，一切伤害得以修复和补偿，任何有罪之人得到惩罚，即便在一个如此远离我们的世界里，对过去表示沉默，还是错误的，更是愚蠢的。历史不能被删改得面目全非，那都是一些意味深长的历史事件，人能从中隐约地看到一种病入膏肓的征兆，而对此保持缄默是不被允许的。

你们想一想，不到20年之前，就在这个文明的欧洲的心脏里，有的人曾梦想过实现一种癫狂的梦——脚踩着几百万具尸体，用无数奴隶的

血肉，建立起一个千年帝国之梦。这种理念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过，极少数拒绝那种理念的人却遭到镇压被处死，其他所有人都赞同过，有些人带着厌恶，有些人无动于衷，有些人却欣喜雀跃。那不仅仅只是一个梦。帝国，一个昙花一现的帝国，那里有过成堆的尸体和奴隶。

与人类以往精心设计的截然不同的集中营建成了，当时称作劳动营，抑或干脆称作劳改营，但它们的终极目的很明确，就是致人死亡，让人痛苦地死去。但是后来德国落在了被艾希曼称为“犹太主义的生物源泉”的那些人手中（请注意动物学的俚语：犹太人是一种动物，他们是昆虫，是一种病毒，因为大自然开了一个神秘的玩笑，让他们偶然有了近似人的外貌），那么，人们就应设法用某种更快捷、更为产业化的手段来灭绝他们。

于是乎，顺从的德国技术师们就着手工作，毒气室就被设计并建造出来，他们找到了一种经济实惠、性能可靠、理想的毒药。那原本是一种用来杀灭船舶底舱老鼠的瓦斯，却被德国党卫军部队向德国法本集团公司大批量地订购，数量之大令人不安。法本工业集团迅速办理订货，收纳账单，其他的一概不予过问。是不是有老鼠肆虐成灾了？不该知道的最好别问。德国企业家们毫无思想顾忌，昧着良心在毒药上赚大钱。

这牵涉埃尔福特[注]的托普弗公司及其子女，还有铁制的建筑物（在布痕瓦尔德[注]的高炉上还挂有牌子，不是在已被炸毁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高炉上）。该公司接受了订单，要制造出一种每小时能焚毁1000具尸体的火化装置。设备设计并制造成功了，并当着托普弗公司的主任工程师及其子女的面检验合格。整套设备于1943年初开始运行，一直高效率地运行到1944年10月。你们可以算一算。然而，还有更恶劣、更糟糕的事情，它表明无耻的罪恶是多么容易得逞。请你们注意，这不仅仅在德国，德国人凡在他们所到之处都搞这套伎俩。这是一种小孩子玩的游戏，物色到叛徒后，让他们当总管，腐蚀人的良知，营造或恢复那种貌似一致苟同的氛围或公开的恐怖气氛，这是实施他们的帝国蓝图所必需

的。

德国人在法国——其永远敌对的法国——的统治就是这样实现的，在当初强大自由的挪威也是如此，在尽管实行过20年苏维埃制度的乌克兰也这样，就是在波兰犹太人贫民窟里也发生同样的事情，人们恐怖地这样讲述着，甚至在集中营里面也如此。暴力的肆虐横行、诈骗舞弊的盛行、非人的奴役欺压，犹如洪水猛兽，没有任何堤坝能抵挡得住，除了那些抵抗运动蓬勃发展的欧洲的零星孤岛之外。

我说过，在集中营里也同样是如此。如果我们真的想提高免疫能力，不受蛊惑，那么在真理面前，我们不应该停滞不前，我们不能因那些溢美之词而宽容原谅。集中营不仅是折磨人致死的场所，也是使人沉沦的地方。人的良知从未像在集中营里那样受到强暴、伤害和扭曲，没有任何地方有过我先前提到的那样骇人听闻的事件，这证实了人的良知是那么脆弱，那么容易被颠覆，又那么轻易地被淹没。哲学家贾斯佩尔·卡尔[注]、诗人托马斯·曼[注]竟然放弃以合理的秘诀来解读希特勒主义，他们用这样的文字——“dämonische Mächte”，称其是“魔鬼般的权力”，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这个层面说，经营集中营的技巧有许多特别却又令人困惑的含义。他们要达到侮辱囚犯的人格、令人失去尊严并把人沦为牲畜的目的。为此，他们让囚犯乘坐闷罐车，刻意让其混合杂居，故意不供给水（这里不涉及经济上的因素）。为此，他们让囚犯在胸口贴上黄色星星，一律剃去头发，连女子都得剃光头。为此，他们在囚犯胳膊上刺字，让其穿上滑稽可笑的囚服，拖着得一拐一瘸走路的木屐。为此——不然，就让人难以理解——他们每天都让衣衫褴褛的囚犯们踏着军人的步伐，井然有序地列队在军乐队面前通过，一种必须履行的典型仪式，一道既滑稽可笑更令人悲怆的风景。除了营地的主人们之外，还有希特勒的童子军（Hitlerjugend）在一旁观看，这都是些14至18岁的孩子，这会给他们年轻的心灵里留下何种印象，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他们谈到

我们时就是“这些犹太人”“共产党人”“我们国家的敌人”吗？然而，这哪里还是人？他们是玩偶，是牲口：他们身上肮脏不堪，衣衫褴褛，他们从不洗漱；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从不反抗，他们想的只是填饱肚子。那么，就得让他们一直干到死，就该把他们都杀了。把他们与我们做比较、对他们实施我们的法律是可笑的。

通过另一条途径，同样可以达到侮辱人格、使人丧失尊严的目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即使是最高层，都是从囚犯中选拔出来，许多人还是犹太人。不应该认为这样会改善营地囚犯们的生活条件，事实完全相反。这是一种逆向的“筛选”，被选中的往往是最卑劣的、最有暴力倾向的、最凶恶的人，只要他们能好好合作，就赋予他们一切权力，发给额外的食物和衣服，可免去繁重的劳动，可免除去毒气室送死。他们也确实是好好合作着，于是，司令官霍斯可以毫不内疚，可以举起手说“我的手是干净的”，“我们并不比你们肮脏，我们的奴隶，他们自己与我们一起共过事”。你们可以重读一下霍斯在其日记里写下的可怕的篇章，里面讲到在毒气室和在焚尸炉工作的特遣队，你们就会懂得什么是罪恶的传染。

然而，传染并非是单向性的。妄想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世界，这不仅令人憎恶，而且是一种野兽般的疯狂。他们妄想创建一个具备至高无上的日耳曼一切优良品格的血统高贵的民族，并由一群饥肠辘辘的不成人样的奴隶伺候着。

在德国，没有比党卫军和纳粹党的机制更腐朽、更污秽的东西了。他们呼吁灭绝犹太人、波兰人、苏联人，以及德国本土心理有缺陷的人，这种声音在民众中、在军队里广泛传播，助长了（撇开一切道义上的判断）在民族社会主义周围营造一种不信任和分裂的氛围。从某种程度上讲，与这种氛围本身相关联的是军事上的颠覆，以及轴心国和同盟制度的崩溃。德国人不甘愿邀请他们的盟军头领们参观死亡营的设施，但消息传开了，德国人暴露了自己不仅是靠不住的盟友，还露出一副危

险的盟友的面孔。所有从苏联前线回来的意大利军人都讲述他们所见到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集体埋死人的乱葬岗，在田野里像野兽般被追逐的妇女和儿童，以及整列整列装载着冻死或饿死的苏联战俘的火车。

循环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意识到自己是在为一种卑鄙的事业而战斗，打仗的士兵们感到十分气馁：数量越来越多的德国士兵——尽管继续按他们的本性在尽职——感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格言（他们系在子弹带上的）是一种多么强烈的讽刺。它不是灾难的原因，却助长了灾难。

大家都知道，历史并非总是公平的，而天命不总是能应验，相反，我们都热爱正义。为什么我们得向我们的子女隐瞒这历史审判的杰出典范呢？为什么不对他们说出真相？说希特勒创建了死亡营，而他被打败了；不仅如此，还要告诉他们，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正是因为他想创造死亡的文明，所以被打败了。

普里莫·莱维

1961年

---

1. 埃尔福特（Erfurt），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工业中心城市。
2. 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城市。
3. 贾斯佩尔·卡尔（Jaspers Karl，1883—1969），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重要代表。
4.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作家。被誉为20世纪德国文学第一人，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因反希特勒主义的立场而被迫先后流亡美国和瑞士。

放逐和灭绝犹太人

种族主义的法令颁布时，我19岁。当时我在都灵大学读化学专业一年级。一种神秘的天意赋予了我一时的天资，使我完成了学业。应该承认，在当时大学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我过得还不坏。大学生中激进的法西斯分子为数甚少，而且一般也不是危险分子。面对那些新的法令，他们也感到相当困惑，那些法令从一开始实行就显得是愚蠢之举，无非是效仿德国人的那些更为凶残的法律；不过，当时抱一种怀疑主义态度的人占上风，我本人也受其感染：那是一种装聋作哑和视而不见的气氛，人人都顺应着这种气氛，无论是大学生还是教授，无论是法西斯分子还是反法西斯分子，抑或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人们感到战争正要来临，而战争也真的来了；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事情并没有发生很多变化。我在大大小小法令的欺压、蹂躏之下，继续我的学业，不过，找到躲避的途径并不难。

对犹太人施行迫害和歧视的法令，我在大学同学和教授中没有遇到表示声援的人，也没有人表示出敌视。不过，雅利安人之间的友谊在一个个逐渐瓦解，除了那些极少数不怕被当作“假虔信派”[注]，或者那些就像法西斯官方称之为“荣誉犹太人”的人以外。但是在私底下，法西斯大学团体（GUF）的法西斯党魁们自身也带着某种有罪的神情，尴尬地看着我们。

1941年，我以自己最优异的学科成绩获得了学位。我经常想到，这个成绩只是部分地属于我应得到的，它凝聚着不甘心随波逐流的导师们的一种苦心，为此他们谨小慎微又胆战心惊。另外，他们之中，没有人把我当作内部学生接纳过我，在当时那可是一种太过严重的轻率之举。

有一点我得承认，在那些岁月里，无论是我，还是跟我处境相同的年轻人，脑海里都不曾掠过一种积极对抗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法西斯主义是卓有成效的：它未能成功地征服人的良知，但它成功地麻痹了人的良知。法西斯主义曾经炫耀自己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风尚和人的品行，而实际上，它促使人们产生一种严重的懈怠，一种精神上普遍的、隐秘的空缺。我们当初自称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但与追求民主精神的前辈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割断了。我们得过且过地学习、工作、开展政治讨论——经院式学术性的讨论，它们是贫乏的、充满空想的。

我在米兰相当容易地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当时很多年轻人都去当了军人，社会上明显缺乏技术人员。1943年，事情却骤然起了变化。先是3月都灵工人举行大罢工，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那是法西斯全盛时期的一次罢工，战争正处于白热化。政府方面做出了一种出奇胆怯的反应。人们不能再熟视无睹了，终于发出某种不同的声音，不再随波逐流，也不再一边倒地站队。在意大利，当时除了法西斯之外就是空白，这并不是真的。

5个月之后，7月25日，政府和法西斯的机制令人难以相信地闪电般地解体，就证实了这一点。接着就是热火朝天的几个星期，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行动党、自由党先后建立，各种政治方针和纲领、新的名字、新的事物层出不穷；人们亟须做出一种选择，却又缺乏一种选择的标准，而德国人在勃雷内罗[注]，还与在我们家里的德国人一起干，巴多利奥[注]将军发出的模棱两可的声音："战争在继续。"

9月8日，灾难来临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也是意想不到的。那是最后的大混乱。我们默默地看着德国的战车突然闯入米兰的街头。我失去了一切联系。我没有一个果断的计划就回到都灵，并抵达瓦莱·达奥斯塔。当时我毫不怀疑，是该做些什么了，但是许多关于该做的事情的言论，我虽然听到过，也谈到过，但我的思想极其混乱，不知究竟该做些什么。别的年轻人都涌向那些山区：有逃避服兵役的，有溃散的军人，

也有工人以及山谷里的居民。我们组织起队伍。我们与在都灵组织起来的抵抗运动的策源地取得不定期的联系，但我们既没有钱，也没有武器，更没有经验。

不久之后，12月13日，随着一次告密，法西斯国民卫队的一次大规模的扫荡令我们措手不及。许多人成功地逃脱，我却被逮住了。我持有假证件，本来也许可以掩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是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审讯中，我承认了自己是犹太人。事后我冷静地做了判断，认为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样做肯定是一个特大的错误，不过，当时我觉得那是对自己加入游击队的事实最好的解释。另外，我觉得在那种时刻否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正如你们所见到的那样，当时我很年轻，很天真！）

我被送到了佛索利，在意大利北方抓捕到的所有犹太人都陆陆续续地聚集到那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健康的、生病的，还有濒于死亡的人；有百万富翁，也有乞丐。所有的人都等待着某些恐怖的事情发生，但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到接踵而来的事情。当我们的人数达到650名时，党卫军出现在了营地，他们向我们宣布说，两天之内我们就将出发，全部都得走，无一例外。去往何处？不得而知。旅程持续了三天。我想，没有必要再描述在一列闷罐车里的三天旅程：寒冷、饥渴、劳累、无眠，尤其是恐惧。

我们在夜里抵达一个偏远的地方。我们之中无人知晓“奥斯维辛”那个名字意味着什么。他们让我们从车皮里下来，迅速地盘问了我们：“你身体健康吗？你能干活吗？”按照回答，根据一种极其草率的考查，他们当即就把我们分成三组：有劳动力的男子96人（我属于其中之一）；有劳动力的女子29人；最后是所有剩下的人。妇女们徒步前往比尔克瑙集中营。29名女子当中，后来只回来4人。我们前往莫诺维茨集中营，后来有10个人回来。其他所有无劳动能力的人中，无一人返回。他们都是老弱病残者，有孩子，也有不愿丢下孩子的母亲。我们是在很

久之后才得知这些事情的：他们被塞进毒气室里，随后在焚尸炉里被烧掉。奥斯维辛为此而存在，奥斯维辛就是为此服务的。就这样，650个人当中，回来了14个。

我们男子组被押送至莫诺维茨集中营，它离“首府”七公里，属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群落。我应该直说的是，比起其他集中营里的条件，当时它不算是最艰苦的。经历过更为恶劣岁月的那些上了岁数的囚犯，讽刺地称呼它是“疗养所”。其中并没有什么人道主义的因素，民族社会主义是不认同这种因素的。其中另有一些原因。莫诺维茨集中营从属于一个规模巨大的工地，那里当时正在建设一个法本化工联合企业，它是德国化工企业的托拉斯。那是占地面积达六平方公里的一片工地，是个一望无际的庞大工程。莫诺维茨集中营是那个化工集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地域上看也是如此，营地位于工厂周边、外围之内。

在工地上干活的有四万名劳工，其中有一万人是我们这些莫诺维茨的奴隶。我们的劳动，以及所做出的贡献，是正式纳入德国人的工作计划的，而且还计算在财政年度预算当中的，对任何人都不例外，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何况，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在工地上与德国民工每天都有接触，那些德国民工自己至今也一无所知，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们当初的劳动应该是有报酬的，但不是给我们；每一个工作日，法本化工联合企业都支付六个马克给我们的老板，就是党卫军，我们是属于党卫军领导的。

我经常寻思着，这样的组织机构中蕴含着多少冷酷的算计，包含着多少疯狂和暴虐。显然，从党卫军角度来看，我们的劳动付出只不过相当于另一种“行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的一种副产品。因为很清楚，没有一个企业家，怎么说呢？没有一个黑奴贩子，哪怕是古时候法老时代的犯人头目，会真的想从我们这样的劳工身上去赚取一种经济利益的。我们所有人几乎都从事挖土、搬运等繁重劳动，而当时我们身上的力气还不如一个孩子，而且我们之中大部分人生平从未握过一把铁

锹。极少数人具备某种有用的专业特长，比如，有人当过电工、机械师、化工技术员等，才让他们干一些比较细致的工作；然而，每个人都不难明白，怎么能让一个工程师在那样的处境下干好工作呢：一个终日挨饿、衣衫褴褛的人，一个长满溃烂的伤口、满身虱子、从来得不到漱洗、蓬头垢面的人，一个深知在几个月之内就得去死的人，一个知道也许明天就会被弄死的人，他是不会有爱心，也无法热爱其所从事的工作，更不会对工作感到有什么兴趣的。他甚至会憎恨其所做的工作，因为那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工作。

用言语让人们明白，生活在一个集中营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并不容易；而用简洁的言语来表达，就更不容易。就说饥饿，那是与大家通常了解的饥饿截然不同的一件事情，那是一种长期的慢性饥饿，而且它不在肠胃里，而在脑子里，变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魔咒，在一天的每时每刻都忘不了它；夜间，在睡眠的自始至终，梦见的就只是吃东西，或者说，梦见正要吃东西，而后来，就像坦塔罗斯[注]的神话里描述的那样，在最后一瞬间，有某种魔力让食物全都消失了。说到劳累，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没有人尝过这种劳累，那是驮畜般的劳累、受人鄙视的劳累、无法逃脱的劳累，得不到强使其劳动之人的同情怜悯，它伴随着被人视作无用之辈的感受，是野兽般残忍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没有目的的劳累。说到寒冷，即便是最卑微的乞丐在冬天里也能设法穿些破衣烂衫御寒，找到一席温暖的铺位、一杯葡萄酒。可是在集中营里，没有任何抵御寒冷的办法：人们得穿着厚布单衣，在冰天雪地里度过十分漫长的工作日，在异国他乡一种恶劣的气候环境中淋着雨，甚至连流淌在血管里的血也是冰冷而又贫乏的，无从予以保护。这样的饥寒交迫和辛苦劳累，就必然导致疾病。集中营里有医务室，但用来治疗各种轻度疾病的药物只有两种：阿司匹林和乌洛托品。治疗严重的疾病，或者也不算太严重却又难以治愈的疾病，如因饥饿引起的浮肿病，这病在当时很普遍，就只有一种人人都知道的药物、根本性的药物，它叫“壁炉”，那是大家对它的简称：它就是比尔克瑙的焚尸炉。

但是在极其少的劳动间歇时刻里，比如，在例外的休息日里（我一年之中只有过五天），不必承受任何肢体上的痛苦和劳累，却充满了另一种痛苦，不乏忧伤和悲怆；那是人心灵上的痛苦，它来自意识的回归，再度感受到远离家乡之愁、难以获得自由之苦，它源自对尚活在人世却无法接近的亲人的思念，源自对像被运往屠宰场的牲口那样已死去的故人的怀念。

不过，莫诺维茨算是一个不错的集中营，我这么说，并不带任何讥讽。在莫诺维茨的囚犯平均能存活三个月，因为它是一座“劳动营”，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灭绝营。而在海尔姆诺、索比勃尔、特雷勃令克和迈丹内克的集中营里，囚犯平均只能活一至两个星期。如果说没有人谈及这些集中营的实况，那是因为没有一个犹太人从这些地方活着回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在莫诺维茨待了一年，之所以能从那里活着出来，是由于各种偶然的巧合。首先，我这个人一向进食量少，因此，集中营里定量供应的食物，尽管对我来说也不充足，但不像对其他许多人来说那样少得可怕，远远不足以维持身体的需要。的确应该注意到，恰恰正是那些身强体壮的人和运动员类型的人，成了极度饥饿的首批受害者。我见到一些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民，他们体格十分健壮，可是到集中营一个月之后，就都饿成了一具骷髅而走上去“壁炉”（焚尸炉）之路。另外，我早先经受过山里生活的磨炼，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能抵御寒冷，能熬得住艰苦和劳累而没有病倒。我懂一点德语，从进入集中营一开始，我就尽可能地努力学些德语。

这里我顺便得插一句，并提醒一下，集中营使用的语言之混乱，是怎么导致那里的生活如同地狱一般。营地里用德语和波兰语下达的各种命令日夜不绝于耳，处处听到的是凶狠的恫吓、大声的谩骂和吼叫；囚犯们必须能够听得懂，或当即猜测出那里所施行的各种规章制度、条例禁令，还有各种古怪甚至是滑稽可笑的指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

初集中营里的希腊人、法国人以及意大利人有那么高的死亡率，就在于他们对德语和波兰语的一无所知。单凭猜测要弄懂别人的话是很不容易的，比如，一阵拳打脚踢突然把你们打翻在地，就只是因为你们穿的上衣有四颗或六颗纽扣，而不是五颗；或是因为在寒冬腊月里，他们看见你们头上戴着帽子躺在床上了。

不过，通晓德语对于我来说是相当幸运的事情。1944年7月，法本集团的德国人需要懂化学的人去他们的实验室工作。我们之中有很多人申请，要去的人太多了。必须得确定谁是化学师，谁不是。德国人是“认真的人”，他们举行了一场严肃的考试，自然是用德语考试。至于应试者是否已沦为勉强能站得住的、活着的幽灵，他们压根儿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生产，也就是找到断定是有用的技术人员。他们找了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不认为自己对法本化工集团真有过什么用。那几个月里，不断有飞机轰炸，因此，我作为“专业人才”的工作，就局限在把精致的测量仪器从实验室搬到地下室，再从地下室搬回实验室，一天往返三四次。不过，首先，我不曾想过让自己成为对他们有用的人。不管怎样，这样我就有了少有的特权：在1944至1945年冬天的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我能待在室内暖和的地方，不用从事过分艰辛的劳动。

多亏命运最后一次奇迹般的干预，我得救了。正如我前面所说，我在集中营的整整一年之中，没有得过什么病，可是临近1945年1月10日，就在听得见苏联人的隆隆炮声之际，我患上猩红热，住进了营地的医务室。没过几天后，整个集中营全都撤空，斯雷西亚北部所有的集中营同时都撤空了，包括奥斯维辛在内。这也许是奥斯维辛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最可怕的篇章。看来，这次撤离行动是由希特勒亲自决定的，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启动了：所有能够行走的囚犯——在奥斯维辛地区有15万之多——被迫踏上征途，顶着凛冽的寒风在雪地上行走，没有食物，没有停歇，连续走了七天七夜，前往莫坦森、布痕瓦尔德、达豪

——有好几百公里的路程，沿路都挤满了溃散的士兵、逃跑的平民以及行军中的官兵队伍。

这种疯狂的行军有两个目的：一是为臆想中的一次反攻补充劳动力，二是不在身后留下人证。因此，掉队的人无一活命。无论谁拖累行军速度，当即就被击毙。在放逐生涯中的那次可怕的再次放逐中，存活下来的人不超过十分之一。这些幸存者随后又被编入我前面提到过的其他集中营，那里早已人满为患，而他们又得立刻投入艰苦的劳动。而我，当时跟病号们留在了莫诺维茨的医务室里，因此躲过了这地狱般可怕的冒险之旅。

党卫军曾接到过命令，要纵火焚烧我们传染病人所在的棚屋，并用机枪击毙想逃生的病人。当他们正准备执行命令时，一次猛烈的空袭把营地炸得一片狼藉。空袭结束时，德国人早都逃走了。我们这些病号就被丢弃在营地自生自灭，整整十天没有食物，也得不到任何治疗，干守着那倒霉的棚屋。1945年1月27日，当苏联人来到营地时，有一半多的病号已经饿死或病死了。

普里莫·莱维
1961年

---

1. 假虔信派，系17世纪德国路德教的一个宗派，在这里是“假装有怜悯心者”的意思。
2. 勃雷内罗（Brennero），意大利和奥地利的交界处，阿尔比斯山的山口，是波河平原与欧洲中部之间十分重要的交通要道，属于意大利北部特雷蒂诺-阿尔多-阿迪杰大区。
3. 巴多利奥（Badoglio Pietro，1871—1956），军人，政治家，墨索里尼被捕后，被意大利国王召去组成临时政府，与英美联军于1943年11月8日举行停战谈判。
4. 坦塔罗斯（Tantalo），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吕底亚王。因他把自己的儿子帕罗普斯剁成碎块，献给诸神吃，触怒了主神宙斯，宙斯罚他永世站在水中，那水深至他的下巴，他口渴想喝水，水位就退落；他头上有果树，当他肚子饿想吃果子时，树枝就升高。

审判博斯哈默尔㊟的声明

遣送的准备工作。1944年1月27日，我被分配到佛索利集中营。营地是在意大利警方监督之下运营的；我抵达那里时，营地收容着约350名意大利和外国的犹太人。临近2月15日，约有10名德国党卫军士官来到佛索利营地，其中有一名德国上士，也是党卫军的；他们剥夺了意大利官员们的权力，直接组织了遣送。他们让翻译告知我们，所有的犹太人将启程去一个寒冷的国家，因此，最好随身带上一些厚衣服、被子或皮衣。当然，除了带上贵重物品、金钱和外汇之外。等到犹太人在营地的人数达到650名时，他们就开始遣送；病得十分严重的人也被遣送走，其中有一个将近90岁的老妇已濒于死亡。而传染病患者以及一些英国籍的犹太人，却留在了意大利。德国方面既没有准备也不分发任何旅途上所需的食物，不过，我们被获准在当地购买了一些食品带上。

1944年2月22日，我们从营地被运送到火车站，是乘坐由意大利人驾驶的汽车去的，但由上面提到过的德国党卫军士兵负责押送。他们态度十分粗暴野蛮，对我们拳打脚踢，催促我们上下汽车，并赶着我们进入火车车厢。车皮（是运载货物的闷罐车）内事先没有安置任何盛水容器，也没有任何卫生设备，地板上铺着薄薄的一层稻草。

这就是我所遭遇的第一次把犹太人从佛索利遣送至德国的情形：2月22日从佛索利出发，2月26日晚上抵达奥斯维辛。

旅途押送队。由身穿党卫军制服的德国人组成，其中至少有两名是我在上面提及的10个人之中的。

遣送的目的地。在每一节车皮外面，挂着粘贴在专门框架里的牌子，上面清楚地写着“奥斯维辛”的字样。

在佛索利营地里负监督和行政管理的意大利警方的官员中，我记得有下列名字： 阿韦塔比莱、德泰斯科、塔利亚拉特拉。他们行为正派，对待我们挺人道；我认为他们知道，也应该记得负责押送我们乘列车的德国人的名字。

普里莫·莱维

1965年

---

1. 弗里德里希·博斯哈默尔（Friedrich Bosshammer），前德国保安警察局驻维罗纳总指挥部指挥官。

犹太人的遣送

因为我是犹太人，所以不能加入军队，并且不能进入大学工作，于是9月8日前后，我就加入了一支游击队。我们经常遇上一大批来自法国和意大利各地的军人，他们朝相反的方向行进：有人回家，有人寻找部队，有人寻找一个头头。

我们一跟这些曾经的军人交谈，就发现他们想说的都是一件事：不应该跟着德国人打仗，因为他们目睹德国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些军人到过希腊、南斯拉夫和俄罗斯的前线，他们说："这不是战争，这些人不是同盟者，他们不是士兵，他们不是人。"把我们意大利人连接在一起的团结精神，就产生于这种明显的人性，就是那种纯洁的、简单的人性，它在意大利依然存在，尽管意大利人有许多缺点。我觉得，这是不可忽略的第一要素，它彰显了返回国内的意大利军人的气质。

第二要素是：你们可以觉得我是愚蠢的，虽然我是作为游击队员被抓捕的，但我无意识地声明了自己是犹太人，最后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我在莫诺维茨劳动营干活，它紧靠着关押战俘的集中营，里面有英国、美国和苏联战俘，以及波兰、法国与意大利的战俘——他们中有些是军人，有些是扫荡中被抓来的平民，另外还有所谓的"志愿者劳工"。意大利战俘过得并不比我们好到哪里去，他们的集中营里没有毒气室和焚尸炉，这是真的，而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特点，不过，在最初的时候，他们营地的环境条件和衣着状况与我们相差无几。

但是，那些意大利军人中有专业知识的劳工或有一技之长的，他们的处境要好一些；我们都得到过这些人的帮助；不光从这些人，我们还

从意大利平民囚犯那里得到过帮助；并且不光是我们意大利人，而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承认这一点。我们的那些同胞的仁爱之心感人肺腑。德国人都知道，意大利人都是“好样儿的”，他们用讥讽的口气这么说；那是真的，那是被大家公认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与人们在这天晚上议论许久的一件事休戚相关，就是意大利军人们以极高的百分比，几乎是全部军士，毅然拒绝加入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注]，因为加入就意味着赞同纳粹主义，就是支持纳粹制度非人道的行径。

说罢这些，虽然今晚我是作为被捕的游击队员前来做证，证明我说到的那些人当时无从选择，而对于年轻人，对于我这一辈的年轻人来说，是可以做出一种选择的（而从我这方面来说，是在后来做出的选择）：选择“不”，选择不赞同。

为不能做选择的人做证，就是为所有意大利和外国的犹太公民做证。这些人当初不能做任何选择：他们之中有妇女和老人，他们是多年来与外部世界割断任何联系的人。从1939年起，他们就生活在不公开的秘密状态，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做出某种选择的。我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管怎样，尽管有巨大的困难，尽管没有一个组织，但当初是有过一种抵抗的，不仅仅在波兰、苏联、乌克兰的少数犹太人内部，而且就在集中营里面，他们也参与其中。犹太人群体团结一致，还与其他集中营里发生和经历过的地下活动合作。

自然，那些被关押在政治犯集中营里的人，与那些被关押在大部分是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人不一样；理由很明显，在一个关押政治犯或大部分是政治犯和战俘的集中营里，囚犯们以往都上过学校，一般在学校里经受过严格的政治培训。他们多半是一些充满活力的人，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被押送至集中营时，自己正处在正常工作和事业的顶峰时期。何况，他们之间容易产生一种团结精神，至少在同一民族的团队之间，也是出于政治理念的相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情况就大不相同；那是一座巴别塔[注]，至少对我们意大利人来说，是坠入了黑

暗的深渊，也就是被丢进一个相互不明白、我们难以理解的天地之中。我们不理解的理由有很多，也因为语言不通，而且营地里实施一种铁一般的规章制度，没有人开导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得凭直觉去获知，因为说话少又经常出错，一旦出错就得死；而且因为民族的混杂，来历和思想又如此的多样、复杂和混乱，我们真的需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辨别方向、明确做法，而几个月之中人也就死了。

押在奥斯维辛的囚犯中95%是犹太人，约5%是政治犯和所谓挂“绿三角”的人，也就是普通罪犯。从法律上看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有区别，而且区别很大：政治犯和挂“绿三角”的罪犯几乎都是德国人，这一点，连德国人自己也从来不会忘记。甚至是大部分已被希特勒杀害的德国共产党人，由于种族和语言的差异，他们也被看作与犹太人截然不同的人。那些对我们态度经常都很好的德国政治犯，都是被关了5至10年或12年的囚犯，大家都知道“大好的前程”意味着什么。他们都曾有过“大好的前程”；没有获得大好前程的，就不会再有什么前程了。因此，撇开一切规章制度不说，虽然他们不该有一种不同的待遇，但他们仍然享有，抑或他们通过组织起来获得。

我所在的集中营，是一个不错的营地，因为是劳动营，囚犯在那里平均能活三个月；三个月之中，营地人数减少一半，但总有新带来的囚犯加以补充。我说那是一个不错的集中营有很多理由，因为它是一个劳动营，可以有很多机会与意大利军人，甚至跟英国军人取得联系；把我们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的屏障并非是密不可透的，存在着某些通道和缺口。不过，大家都知道比尔克瑙集中营是怎么回事：那是人只能进去不能出来的一种集中营，在那里谈不上什么平均存活率，它只用于毁灭人。

我这样说，并非是想在关入各个集中营的人之间建立一种三六九等的秩序，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想提示大家，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甚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也产生过一种抵抗运动；不是秘密的事件，而是

真正发生过的，它至今尚未被记载在历史中（因为那次事件中没有人存活下来），就是那次破坏焚尸炉的行动。

鉴于某些证人尚活着，在对现场进行视察的基础上，还是有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彻底弄清那次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在那种"一无所有"的"零"条件下，有一小队人想方设法，不仅引爆了焚尸炉，还找到了武器，跟德国人战斗，杀死了好些德国人，并力图逃跑。

值得提醒的是，还有三十来个囚犯成功地穿越了国境，但由一些被德国人吓破了胆的波兰人交还给了德国人。就这样，这不多的几十名英雄第一次在奥斯维辛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本来不仅有助于他们，而且有助于营地里全部被囚禁的人员，可他们却看到自己的企图不幸地落空了。

普里莫·莱维

1966年

---

1. 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 S. I.，1943年9月23日—1945年4月25日），也称萨罗共和国，因其所在地在意大利北方加达湖畔的小镇萨罗而得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墨索里尼建立的傀儡政权。

2. 巴别塔（Babel），《圣经》中所叙述的由诺亚的后裔所建的一座通天的高塔，当时世人语言相同。后来耶和华弄乱了天下人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言语不同，让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于是巴别塔终未建成，从此世上就产生了成百上千种语言。后来人们用巴别塔来比喻嘈杂混乱的地方。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指控博斯哈默尔的调查问卷

调查表（德意双语）

（1）您在意大利被捕之前，一直生活在哪里？

——在都灵。

（2）您是在何处被何人逮捕的？

——1943年12月3日，在英特尔维的兰佐（科摩），在瑞士边境被法西斯保安军逮捕；当时我是被瑞士驱逐出境，原本我是打算与妻子到瑞士去避难的。

（3）您为何被捕？

——因为我是犹太人。

（4）被捕后，您被放逐到何处？

——先是在科摩的监狱里，后来在摩德纳的监狱，然后又被押往佛索利集中营。

（5）您在卡尔比（摩德纳附近）的佛索利警方的临时性集中营里待过吗？

如果情况是如此：您是何时，又是从何处被押送到那里的？您在那

里待了多久？

——在佛索利的营地逗留时间：从1943年12月21日至1944年2月21日。

您和您的难友们在那里的待遇如何？

——在意大利警方的管辖之下，也就是说，直到启程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两天，我们的待遇不算太坏。

（6）您是在意大利认识了前党卫军上校军官、突击队队长弗里德里希•博斯哈默尔吗？如果认识，您是在什么机会和在什么场合中认识他的？

——我不知道，我从不曾知道党卫军军官和士兵们的名字。

（7）您是在何时从卡尔比的佛索利（或者可能从意大利的另一个地方）被押送到奥斯维辛的？（请尽可能地提供确切资料。）

——1944年2月21日晚从佛索利出发，1944年2月26日抵达奥斯维辛。

（8）从意大利出发时，您知道被放逐至何处吗？

——知道，是去奥斯维辛。

（9）被放逐之前，您是否知道被押送的犹太人会受到死亡的威胁，或者至少您害怕会死吗？

——我知道得很清楚。

如果是如此，那您是怎么得知的？您的惧怕因何产生？

——是从南斯拉夫、德国、波兰和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难民那里得知的消息，他们对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完全知晓。

（10）您是以什么方式被遣送到奥斯维辛的？（遣送的方式、装卸的车站、列车的路线等。）

——乘坐火车，是运货的车皮，每个车皮装载40至50个人，车厢地板上没有铺草，也没有被子。火车的路线：佛索利——勃雷内罗——维也纳——莫拉斯卡——奥斯特拉瓦——奥斯维辛。

（11）从意大利到奥斯维辛花了多长时间？

——五天。

（12）请您讲述前往奥斯维辛一路上的确切的情况。（是载客列车还是运货列车，您与多少人待在一个车厢里，膳食的提供如何，比如旅行之前及旅途中是否有热的食物和饮料，火车停站期间是否有可能下车，旅途中的死亡率，等等。）

——从未提供过热的食物，旅行之前和旅途中都没有，抵达后也没有；食物有黑面包、奶酪和一些果酱；喝的是每天一次用食时分发的凉水；一天有一次在列车停在旷野地时可以下车，以满足解手的需要，但是在难友们和押送的士兵面前；有一位75岁的老人死了；车厢里冻得要命，口渴难忍。

（13）根据您的估计，同一趟车上有多少人被押送至奥斯维辛？（比如，您可以根据列车的长度、每节车厢的人数和占据空间的尺寸来做估计，也可以从意大利上车时以及在奥斯维辛下车时观察到的情况做出估计。）

——肯定地说，与我一起被遣送的一趟车上共有650人。年岁最大的75岁（死在旅途中），最小的三个月。

（14）您到达的是奥斯维辛的什么地方？您在哪里被卸下车？

——我在1944年2月26日晚上9点抵达奥斯维辛的火车站，下车后，当即就被分成几个队：一边是妇女和儿童，另一边是男子。然后每个队又被分成两组：年轻力壮的站在一边，上岁数的、14岁以下的儿童和病人站在另一边。

（15）筛选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

——筛选进行得很迅速，也很粗暴；我们被列入壮劳动力的那一队，由95名男子组成，而且立刻用好几辆卡车送往莫诺维茨劳动营（称作“布纳”）；被准许入劳动营的妇女（12名女子）则被送往比尔克瑙。

（16）经过筛选后，多少男子和多少女子被迫从事营地的劳动？其他人后来如何？

——95名男子和12名妇女从事营地劳动；其他人都立刻被带往比尔克瑙毒气室，当晚就窒息而死。获准从事劳动的95名男子和12名女子中，战后重返意大利的分别是8名男子和4名女子。

（17）发给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编号是多少？

——174489。

（18）您是在何时何地得知在奥斯维辛的犹太人的遭遇的？

——从1942年冬至1943年，我是在救助到意大利避难的外国犹太人组织里行医期间得知的。

（19）a.　除了您之外，与您乘坐同一趟列车的人中间，战后有多少人幸存下来？

——七男四女。

b. 请您指明您所认识的可能的幸存者的名字和地址。

——普里莫·莱维博士，都灵，乌贝托国王大街75号

阿尔多·莫斯卡迪博士，比萨，阿尔诺河沿河大道，博齐街2号

露恰纳·尼幸姆博士，米兰，？？？大街

斯泰拉·瓦拉布雷加，？？？？？？

欧金尼奥·拉文纳，弗拉拉，博洛尼亚大街。

鲁恰诺·马利亚尼，米兰（1968年12月去世）

莱奥·泽利科乌斯基，阿尔科（特伦托），卡皮特里大街，49号

？·泽利科韦茨，？？？？？

c. 同车的难友中，您认识的哪些人在奥斯维辛被杀死了?

约兰达·德·贝内代蒂，阿尔巴人（库内奥）

弗朗科·萨切尔多蒂，那不勒斯人

雷纳多·奥尔托纳，都灵人

圭多·梅利，摩德纳人

马里奥·莱维，工程师，米兰人，偕同妻子和女儿

朱塞佩·？·露丽亚，都灵人

圭多·瓦拉布雷加，都灵人，偕同妻子

恩里科·马拉亚尼，威尼斯人，偕同妻子、儿子、父亲、母亲和两

个表姐妹

？·克鲁克斯曼，维也纳人

？·以斯拉艾尔和妻子萨拉耶夫人

西格拉·？·卡比利奥

瓦拉布雷加一家，热那亚人（父亲、母亲及其儿子和女儿）

马乔雷·巴萨尼一家，乌迪内人（父亲、母亲及其儿子和女儿）

拉文纳一家，弗拉拉人（父亲、母亲和女儿）

特德斯科一家，威尼斯人（父亲，母亲，及其两个儿子）

1970年8月5日于都灵
（日期）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签字）

1970年

普里莫·莱维指控博斯哈默尔的调查问卷

调查表

（1）您在意大利被捕之前，一直生活在哪里？

——在意大利的都灵和米兰。

（2）您是在何时被何人逮捕的？

——1943年12月13日，被法西斯国民卫队在布鲁松（达奥斯塔）附近逮捕。

（3）您为何被捕？

——因为参加游击队活动，我个人的犹太人身份是后来暴露的。

（4）被捕后，您被放逐到何处？

——先被押送至达奥斯塔的法西斯国民卫队兵营，然后，（将近1944年1月底）被押送至卡尔比的佛索利营地。

（5）您在卡尔比（摩德纳附近）的佛索利警方的临时性集中营里待过吗？

——是的。

如果情况是如此，您是何时，又是从何处被押送到那里的？您在那里待了多久？

——从达奥斯塔（见上面所述）。我在佛索利一直待到1944年2月22日。

您和您的难友们在那里的待遇如何?

——我们在佛索利逗留期间，营地在意大利警方的管辖之下。我们没有遭到恶劣的对待，但是对于没有钱的人来说，食物是缺乏的。

（6）您是在意大利认识了前党卫军上校军官、突击队队长弗里德里希•博斯哈默尔吗？如果认识，您是在什么机会和在什么场合中认识他的?

——不认识。

（7）您是在何时从卡尔比的佛索利（或者可能从意大利的另一个地方）被押送到奥斯维辛的？（请尽可能地提供确切资料。）

——我从佛索利于1944年2月22日被遣送至奥斯维辛。

（8）从意大利出发时，您知道被放逐至何处吗?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列车的车厢外面挂着标有“奥斯维辛”的牌子，不过，我们之中没人知道奥斯维辛在何处，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9）被放逐之前，您是否知道被押送的犹太人会受到死亡的威胁，或者至少您害怕会死吗?

——我当时很害怕。

如果是如此，那您是怎么得知的？您的惧怕因何产生?

——从英国广播电台得知的消息，还从与许多外国的犹太人（特别

是克罗地亚人）交谈中得知的，他们是为了逃避纳粹分子的占领在意大利避难的。

（10）您是以什么方式被遣送到奥斯维辛的？（遣送的方式、装卸的车站、列车的路线等。）

——从卡尔比火车站至奥斯维辛火车站，乘坐的是运货车皮，途经曼多瓦、维罗纳、勃雷内罗、萨里斯堡、维也纳、伯尔诺（捷克境内）。

（11）从意大利到奥斯维辛花了多长时间？

——四天。

（12）请您讲述前往奥斯维辛一路上的确切的情况。（是载客列车还是运货列车，您与多少人待在一节车厢里，膳食的提供如何，比如旅行之前及旅途中是否有热的食物和饮料，火车停车期间是否有可能下车，旅途中的死亡率，等等。）

——列车由12个车皮组成，每节车皮装45至60人。旅途中我们既没领到食物，也未曾有任何种类的饮料，只是之前允许我们随身带上面包、果酱和水。每天允许我们从车厢下来一次，禁止我们在火车停站时从车窗讨要食物。据我所知，至少有一位妇女在旅途中死去，他们禁止把尸体卸下车厢。

（13）根据您的估计，同一趟车上有多少人被押送至奥斯维辛？（比如，您可以根据列车的长度、每节车厢的人数和占据空间的尺寸来做估计，也可以从意大利上车时以及在奥斯维辛下车时观察到的情况做出估计。）

——那列火车上被放逐的人有650名。

（14）您到达的是奥斯维辛的什么地方？您在哪里被卸下车？

——我们在夜里下的车，在奥斯维辛城的火车站（不是在比尔克瑙），就在那里进行了筛选。

（15）筛选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

——筛选当即就进行，过程很快。看上一眼，提一个问题：“你是健康的还是有病？”按照回答，向我们指引三个方向，那里有三辆以上的车等着（分别是有劳动能力的男子、有劳动能力的女子、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16）经过筛选后，多少男子和多少女子被迫从事营地的劳动？其他人后来如何？

——去从事劳动的有69名男子（去莫诺维茨-布纳），29名女子（去比尔克瑙），其余所有的人都在二至三天内被害死。

（17）发给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编号是多少？

——174517。

（18）您是在何时何地得知在奥斯维辛的犹太人的遭遇的？

——在莫诺维茨-布纳营地内，从与被囚禁的难友们的交谈中得知的。

（19）a.　除了您之外，与您乘坐同一趟列车的人中间，战后有多少人幸存下来？

b. 请您指明您所认识的可能的幸存者的名字和地址。

c. 同车的难友中，您认识的哪些人在奥斯维辛被杀死了？

——据我所知，与我同一趟车被放逐的难友中有13个存活下来。

其中有：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乌贝托国王大街61号，都灵欧金尼奥·拉文纳，弗拉拉

利科·伊斯拉埃尔，基尔亚特·蒂弗，伊茨雷埃尔大街4号

阿尔多·莫斯卡迪，博齐大街1号，比萨

露恰纳·尼幸姆·莫米利亚诺，科里多尼大街1号F.，米兰

备注：有关本人被捕和被放逐的细节，都包含在我的《这是不是个人》一书中，艾依纳乌迪出版社出版。在德国，也由法兰克福的费舍尔图书社出版（书名原文为“Ist das ein Mensch?”，1961年）。

1970年9月2日
（日期）

普里莫·莱维
（签字）

普里莫·莱维，乌贝托国王大街75号，都灵，
10128，意大利
1970年

审讯博斯哈默尔之证词

都灵法院，1971年5月3日星期一

普里莫·莱维，1919年7月31日生于都灵，家住乌贝托国王大街75号，都灵。

“我是完全合法的犹太人。”

“倘若必须进行第二次审讯，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希望能在意大利做证。”

本人于1943年12月因他人的告密被法西斯国民卫队抓捕。国民卫队的行动目的，是要抓捕我所属的一个游击支队，而不是抓捕犹太人。

被捕后我受到法西斯国民卫队和意大利警方的审问，在这次审问中，我声明自己是犹太人。根据我的这个声明，我就被转送至卡尔比附近的佛索利收容营。将近1944年1月底，我被押送至佛索利营地。

据我所知，那个时候，佛索利营地属于意大利警方管辖。

我们与意大利警方官员们的关系还不错。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时，他们曾多次向我们保证，营地将会继续在意大利管辖之下，我们不会落入德国当局手中。

我无法确切地说清楚，德国当局是何时替代了意大利当局在营地的领导的，不过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党卫军的人出现在营地的日子是1944年2月20日——我可以保证就是这个日期，因为我一回国，就立刻写下一

些笔记，它们后来都被放入一本书内，这本书的意大利文题目为“这是不是个人”。1947年，该书由德西尔瓦出版社出版，而后被译成德文，书名为“这是个人吗？”，于1961年由费舍尔图书社出版。

大约在20日那天，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队党卫军，有四五个人——确切的数字我记不得了。不过，他们是党卫军的人，这一点我可以确切地认定，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国防军与党卫军的制服是有区别的。根据我的一些囚友们所说，这些党卫军士官已在营地驻守好几天了，可我在近2月20日才第一次看到他们。我说不出他们是什么军衔，但我能肯定，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个是军官，因为我听到过他在命令其他人。我没有注意过他是否与其他党卫军一起来到营地的。这位军官还跟我们用德语攀谈了几句，偶尔还用几个意大利词语，我记得听见过他用意大利语对其他人说“营地大，没柴火”，他这是在有意责备营地前任的管理层的无能。听了他的这句话，我们对未来的命运寄予了某些希望。

他们把被告博斯哈默尔的一些照片拿给我看了，但在这些形象中，我无法辨认出当初我见过的某些人的形象。根据我的记忆，在我抵达佛索利营地时，意大利犹太人有100至200人；后来犹太人的人数迅速增加，在被放逐时达到了650名。2月20日之前不久，有一批来自都灵新监狱的犹太人抵达佛索利营地。我说不清他们是由意大利人还是由德国人押送来的，也说不好那60至80名犹太人是否是与党卫军一起抵达佛索利的。在2月下旬，犹太人是否更加频繁地抵达营地，我说不确切，但我记得，大约在我们抵达后两个星期，有一批刚到营地的犹太人不得不席地睡了一宿，因为营地没有地方能够接待他们。据我回忆，我在佛索利营地逗留期间，大约有400名犹太人分批分期地抵达。

营地的管理权表面上是留在意大利人手中，但我们很快就感觉到，营地的实际指挥权似乎已转交给德国人了；果然，就在2月20日当天晚上，一位党卫军士兵在被我们问及时说，我们将于第二天抑或后天全部启程。那也许是我听到的最初的一些德语词语，说这句话的德国人是一

名普通士兵。

宣布启程后，营地内部的情况并未有多大变化，但外部的守卫加强了，德国人方面声称说：倘若我们之中有一个人逃跑，就将有10个人被枪毙。我说不准这是由谁亲自宣布的指令。2月21日早晨，我们之中有人问党卫军的士兵们是否应该随身带上我们的东西，能不能够这样做。他们回答说，我们将会受到很好的对待，不过，我们前往的目的地是一个寒冷的国度，因此建议我们带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金钱、黄金、珠宝、外汇，尤其是裘皮大衣和被子等。我们问党卫军的士兵，我们将前往哪个目的地，我们会遇到什么情况，但他们回答我们说不知道。

我记不得，对于全家被放逐的囚犯，他们是否私底下进行过一次审问，很可能他们对非意大利籍的犹太人那样做了。不过，党卫军手里肯定有一份按字母表排列的名单，因为2月22日早晨举行了一次点名，叫到名字的每个人都得回答“到”。我确切地记得被放逐的犹太人的人数是650名，因为点名结束时，一名德国兵说：“总共650人，报告完毕。”由谁点的名，是军官还是士兵，这我记不得了。

我可以肯定的是，启程的日子是2月22日，不仅是根据我提到的那本书中所记述，也根据我保存的一封信的备份，那是我回到意大利后立刻写给我在美洲的一些亲戚的信。

德国人来到营地之后，为了免除被放逐，我们这方面的人与营地的意大利警方是否有过接触，我不记得了。在启程之前的日子里，我们为了免于被放逐，曾竭力想获得某些保障，但我们得到的却是某些十分含糊的承诺……[注]

点名完毕之后，我们连同我们的行李被装上几辆大轿车，从营地被押送到卡尔比火车站，党卫军跟随着我们，我们的行李被装载在车顶上，到达火车站后，一名党卫军人命令我爬上车顶卸行李：那个时候，我还听不懂德国人的话，我不明白他这个命令，那个德国兵就揍我，用

暴力逼迫我爬上车顶。

我觉得自己是乘在前面的一辆大轿车里，从佛索利被押运至卡尔比火车站。我说不准这些大轿车是只运行一次，还是多次往返于佛索利和卡尔比之间。当我到达卡尔比火车站时，我似乎记得火车还几乎是空的。按照德国人的意向，从第一节车厢开始，每节车厢内的乘车人员得按照名字的字母表顺序来分配；不过，我们用某种办法避免了这样的安排，使我们不至于与某些朋友分开。我似乎记得，我乘坐的大轿车，是早晨将近10点钟从佛索利出发的。临近下午两点时，火车全部满员，不过直到将近下午6点火车才启程。许多想到其他车厢里与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的囚犯，遭到了粗暴的殴打。

这种让囚犯按名字的字母表顺序分配车厢的命令，得到了严格的遵守，德国人用这种方式，把一家人分隔开安排在不同的车厢里。我挨了德国人的脚踢，他们还用步枪枪托揍我。我的一名同事，因为想换个车厢，就被击倒在车厢的门框上，前额受了伤，以致他带着伤抵达奥斯维辛，伤口还开着口子。

列车由12节货车车皮组成，每节车皮装载45至60人。我所在的车厢是最小的，容纳了45人。我所在车皮里的人，可以从挂在同一车厢外面的一块牌子上读到“奥斯维辛”的字样，但我们之中没有人知道这个字的含义，也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押送我们的卫队乘坐的是一节特别的车厢，我记不得那个车厢是在列车的前部还是尾部，我也记不得那是一节运货的车厢还是一节载客的车厢，这节车厢还装载着旅途的储备物资。

押送我们的卫队是由党卫军组成，至少一部分是党卫军：当时我们在旅途中的心理状态，不容许我们对他们加以区别。有人说我在1945年曾指认过至少两名押送人员是在佛索利见过的党卫军，那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我的记忆比现在清晰，不管怎样，在那个时候，我是尽可能以

最真实的方式予以回答的。

我曾经在佛索利见到过的党卫军军官，是否在押送我们的大轿车上，抑或是在后来前往奥斯维辛的那趟列车上，这我都记不得了。

车厢里仅地板上铺有些许稻草，没有任何类型的厕所，也没有便桶。我们的车厢里有一些孩子，因此，放有几只夜壶，通过车厢的小窗口，我们可以把夜壶里的粪便倒掉。一天仅有一次机会可以从车厢出来，列车有时停留在某个火车站，有时停留在旷野里。无论列车停在何处，囚犯们都得在车厢下面或者在离列车不远的地方当众解大小便，男女混杂在一起，总是有押送队在场监视。夜里，大家相互挤在一起，刚刚够侧着身子席地而睡。车厢里没有取暖设备，人呼出的气在车厢内部管道上都凝结成霜。夜里十分寒冷，白天稍稍好一些，因为人可以活动身子。

关于食物，允许我们事先准备抹上果酱的面包、奶酪和水，随身带上；面包和果酱的数量足够充饥，但饮用水特别缺少，因为在佛索利我们没有盛水的容器，所以大家都口渴得厉害。押送队禁止我们从车厢外要水喝，不许我们从车窗口接水。

整个旅程中，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热的食物。唯有每天一次从车厢下来的时候，每节车厢两三名囚犯由押送队带领着，去储备食物的车厢，领取他们同一车厢人的面包和果酱。仅有一次，在维也纳，允许我们更换储备用水。我们车厢里有一个尚在哺乳的婴儿和一个三岁的小女孩，除了配给的面包和果酱之外，他们也没有什么吃的。有人告诉我说，整个旅程中至少有一人死了，我记不得是男是女。这个细节是我的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告诉我的，他也是被那趟列车遣送走的。我很愿意按照这个意思校正一下自己在1970年9月2日所做的证词。

2月26日夜里，我们这趟列车结束了旅程：火车停靠在奥斯维辛城（不是比尔克瑙，也不在中心集中营）的民用火车站。我们刚一下火

车，就进行了一次极其快速的筛选：我们当即被分成三组。95或96名男子壮劳动力分在第一组，我就属于这一组内；29名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属于第二组；其他所有人都被看作是不能干活的人，属于第三组。

能参加劳动的女子人数，纯属我自己当时的估计。不过，回国后，我从幸存的妇女们那里得到了证实，的确就是29名妇女。

我所属的有劳动能力的那一组，当天夜里就被他们用一辆卡车押运到莫诺维茨-布纳集中营。人数最多的那一组，是由不适合干活的人组成（全都是孩子、老人、带着儿女的母亲、病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他们都被装上大卡车，被押送至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目的地。仅仅在几个月之后，当我在莫诺维茨营地里开始听得懂德语，并且能理解我囚友们说的话时，我这才明白了，那些不宜参加劳动的人在抵达之后的几天之内，统统被害死了——我回到意大利之后，他们之中没有一人被找到，也不再有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传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这份证词后面，我附上一份我的笔记，就是75名囚犯的名单，这是我回到意大利之后重新回想起来的。它牵涉当初在95名或96名有劳动力的囚犯中，跟我一起进入莫诺维茨集中营的75个人。画上圈的是那些幸存至集中营解放的人名；标有字母t的，是那些于1945年1月从奥斯维辛撤走时被押送至布痕瓦尔德和毛特豪森的囚犯；标有字母s的是那些在筛选中被指定送往毒气室死去的人；标有字母m的是那些死于疾病的人；标有字母l的是那个唯一在解放后、在返回祖国之前死去的囚犯。有些囚友的编号我还能重新想起来：囚犯编号的前面的几个数字，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均为174。我的囚号为174517。

到达奥斯维辛之前，我不知道那些集中营的名字，也不清楚那里施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的细节；不过，有关施行灭绝犹太人的行动的具体消息，我是通过以下的来源获悉的：

（1）发表在瑞士报纸上的文章，尤其是《洛桑小报》，大战期

间，在意大利能读到此报；

（2）私下收听联军播放的电台，特别是伦敦的电台；

（3）由英国政府公布的关于德国在灭绝营施行暴力的一本《白皮书》，当时那是秘密地传到我手中的小册子，我自己把它从英文翻译成意大利文；

（4）与那些从俄罗斯、克罗地亚和希腊归来的意大利军人的多次交谈，他们都目睹过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虐待、杀戮和放逐；

（5）1942年至1943年期间，与从克罗地亚和波兰来的犹太难民的交谈，他们是在意大利避难的。

鉴于所有信息来源可知，我们在被放逐时就想到，命里注定得面临一次十分艰苦的囚禁，将遭受强制劳动，将忍受食品供应的匮乏，等等，但我们没有预见到，集中营竟然如此系统地又如此大规模地施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此证词经本人审阅、确认和签署。

普里莫·莱维

1971年

---

1. 从中我们明白了，意大利警方是没有什么权威的。——原书注

集中营的欧洲

放逐囚犯和集中营的历史，是与法西斯在欧洲施行暴政的历史分不开的：它代表暴政的基本法则被发挥到了极致，超出铭刻在人类良知的道德法则的底线。倘若纳粹社会主义占了上风（而它当初是能占上风的），那么，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将被纳入一种独一无二的体制之中，在那里主宰一切的就是对异族人的仇恨、偏执和鄙视。

产生集中营的理论根据很简单，因此也很危险：每个外国人都是敌人，而每个敌人都得被杀死；凡是从语言、宗教、外貌、习俗和思想等方面感觉到与自己不同的人，就都是外国人。被德国人民定义为敌人的第一批“外国人”，是在他们本国找到的。早在1933年，就是兴登堡[注]元帅授命于阿道夫·希特勒建立新政府没过几个月之后，在德国就约有50个集中营存在。1939年，集中营数以百计。估计这个时期的受害者的人数就达30万，除了许多犹太人以外，绝大部分是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那时的集中营主要被看作恫吓威慑的工具而令人害怕，尚未成为有组织的大屠杀的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在集中营历史上标志着一个转折点。随着波兰被占领，德国拥有了（用艾希曼的话来说）“犹太主义的生物源泉”：除了在“特别行动”中被抓捕的人数不确定的平民、游击队员和军人以外，还有250万犹太人。这是一支庞大的命运不济的受害者和奴隶的队伍——“集中营”的最后目的被一分为二了。它们不仅仅是镇压的工具，而且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施行有组织的大屠杀的恐怖的机器以及强制劳动的中心，他们指望集中营能助德国的好战努力一臂之力。每一座资历最深的老牌集中营都迅速繁殖衍生：建立起大大小小新的“外部营地”（Aussenlager），其中有许多营地又变成了一个个辐射中心，像一

张可怕的大网，直至覆盖了大城市的整个地域，以及所有被陆续占领和征服的国家。

于是，在20世纪的全盛时期，就在文明的欧洲中心诞生了令整个人类历史铭记在心的最野蛮的奴隶制度。每天都有好几十列火车从挪威、希腊、荷兰、意大利、匈牙利出发：列车上挤满了“人力资源”，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辜而又手无寸铁，他们连续好几天、好几个星期被禁闭在载货的车皮里，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吃。

他们是犹太人及持有各种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的人，还有在扫荡过程中偶然被抓捕的人。当时德国和许多被占领的国家到处都设有集中营，那些列车都是汇集到集中营里去的，不过，新到达的犹太人中，仅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人能跨过铁丝网，被带往劳动营。其他人，就是所有老人、孩子、病人、残疾人以及超过德国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额度的剩余劳动力，都用杀灭害虫那样的方式被冷酷无情地杀死了。而通过了筛选的门槛、变成囚犯（Häftlinge）的被放逐者，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干活的牲畜还恶劣得多。

要干的活儿令人精疲力竭：冰天雪地里挨冻，遭受日晒雨淋，在泥泞中滚爬，稍有不慎就遭拳打脚踢，或挨鞭子抽打。没有休息的日子，也没有歇工的希望。谁要是病了，就上医务室，不过，医务室就是死亡的候客室，这大家都知道。集中营里有一句谚语：“一个正直的囚犯活不过三个月。”

兄弟般的友爱和团结，也是被压迫者最后的力量和希望所在，集中营里却欠缺这种情谊和精神。每个人都得跟其余的每个人进行斗争，你身边的人就是你的第一个敌人，他觊觎你的面包和鞋子，仅仅因为有他的存在，就会减去你一拃的铺位。他对你来说是个外人，他与你一起分担苦难，却远离着你：在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爱，如果他比你更痛苦，他就嫉妒，如果他不那么痛苦，他就惧怕。集中营的法则使他变成了一匹狼：为了让自己不至于沦为一匹狼，依然是个人，你自己就得搏斗。

人们不得不为这种新的恐惧铸造一个新的名字：灭绝种族的屠杀。意思就是，大批地灭绝整个民族。然而，要达到这个结果并不容易。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共同采取措施，建立党卫军的行政机关，那乃是国家中真正的国家，再加上德国的企业。

临近1942年年底，办事人员与技术人员决定以最好的方式——既快捷又廉价地——悄无声息地杀死几百万手无寸铁的人。他们用的是氢氰酸，那是长期以来用来杀灭船舶底仓里的耗子的一种杀虫剂：德国人非常仓促而又审慎地制造出了新的设备，开设了一种从未见过的企业，那就是制造死亡的工厂。器材设备及其可怕的功能，都以含糊的而又委婉的说法加以搪塞，用官方的用语通常就说成是："特别的设备装置""特别的处理""迁移至东方的国度"。

奥斯维辛是集中营的大本营，把从别处积累的经验收集起来，经过对照比较后，在那里完善地予以实施。1943年，至少有20个"外部营地"从属于奥斯维辛中心营地，不过，其中一个名叫比尔克瑙（波兰语为Brzezinka）的集中营是赫赫有名的。它具备一些密封的地下室，里面总共可以容纳3000人：那里是一些毒气室，在那里用毒气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可致人死亡。因为要让尸体及时消失并非易事，所以在比尔克瑙还有配套的设备，一座十分庞大的燃料装置，即焚尸炉，其他的集中营里随后也陆续建起了焚尸炉。

1944年的4月至5月期间，在奥斯维辛每天有6万人被杀害。

这已达到了野蛮残暴的极限，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里所提供的资料和证据，作为一种无以复加的人性的扭曲和变态，已被世人所看到并铭记在心，它们将被传至最遥远的未来。应该把这些现象视作由暴虐和仇恨酿成的独特可怕的果实，这是每个人的希望：要让人们从人类林林总总血腥的历史中辨认出这些现象的根源之所在，绝不能让暴虐和仇恨所酿成的果实萌生出新的种子来，明天不，永远都不。

普里莫·莱维

1973年

---

1.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Benechen Dorff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将军，政治家，保守派和军国主义分子的代表人物，曾任共和国总统（1925—1934）。1933年1月3日，他把政府领导权移交给了希特勒。

这就是奥斯维辛

我们的人数从来不是很多：30年前，当我们带着刺在左前臂上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浅蓝色的囚犯编号（有人当时仍然留着它）回到意大利，并把它呈现在我们亲人惊愕的目光下时，在千万名被放逐的人之中，我们仅仅就几百个人。所以，当初伦敦广播电台讲述的消息全是真的，当初阿拉贡[注]在信中用法语所写的那些话也是真的："像牲畜一样被打上烙印，像牲畜一样被运往屠宰场。"

现在我们已减少成几十个人。也许我们人数太少，以至于没有人聆听我们说话了；另外，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是令人厌烦的讲述者。有时甚至在眼前出现一种象征性的梦，好奇怪，那是在我们被囚禁期间夜里经常做的梦：对话者不再听我们在说什么，他听不懂，心不在焉的，然后就走掉了，留下我们自己孤零零的。不过，我们仍然得讲述出来：这是对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囚友们的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它赋予我们的幸存以某种意义。我们有了一种人生的基本经历（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懂得了某些关于"人"的含义，那是我们觉得有必要传播的含义。

我们意识到了"人"是征服者：尽管有几千年的法典和法庭，"人"始终是这样的征服者。许多社会制度提出要抑制这种滋长不平等和滥用权力的趋势，可另一些社会制度却赞美这种趋势，并使其合法化，把它指定为最终的政治目的。人们可以把这些制度定义为法西斯的，无须用任何牵强附会的措辞：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的其他一些定义，但我们觉得更符合我们经历过的特殊事件的定义就是，那些在理论和实践中否定所有人之间平等的基本权利的一切制度，全都是法西斯主义。如今，个人或阶级因其权利遭到了否认，很少能够适应法西斯制度，所以暴力或欺诈变得必不可少。为了消灭反对者，他们就不能不采用暴力。为了向忠

于职守的人证实滥用权力是值得赞许和合法的，为了说服被征服者（在人们可以相信的广泛的范围内）他们的牺牲并非是一种牺牲，或者为了实现某种不确定的超凡目的他们的牺牲是必不可少的，就得采取欺诈手段。

在施行欺诈或相应的暴力上，不同的法西斯制度之间所展示的优势各不相同。意大利法西斯在欧洲是长子，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拓者，其在一种并非太过血腥的镇压的原始基石上，树立了一座蒙骗和愚弄的巨大丰碑（在法西斯年代里学习过的人，对其还保存着一种令人悲催的回忆），其效果一直持续到现今。富有意大利经验的纳粹社会主义，在遥远年代的蛮族人骚动的孕育下，又受到阿道夫·希特勒狂暴人格的催化，从一开始就崇尚暴力，在集中营里重新发现了旧时的奴隶体制，一种具有当时人们所崇尚的恐怖威慑潜能的“王国工具”（instrumentun regni），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在这条道路上快速又执着地奋进。

事实是（或者应该是）人所皆知的。从1933年3月开始，希特勒登上总理职位3个月之后，第一批集中营立刻就由党卫军仓促地装备就绪；在大战前夕，集中营就完成了“正规化”，而且倍增至一百多个；集中营从数量和规模上可怕的增长，与德国对波兰和苏联西部版图的侵犯是同步进行的，那里容纳着“犹太主义的生物源泉”。

从这几个月开始，集中营就改变了性质：从作为恐惧和政治威慑的工具变成了“人体骨骼的磨坊”，成为具有屠杀几百万人的规模（光是在奥斯维辛就是400万）的毁灭人的工具，而且还组织起企业化的营地，具备致人集体中毒死亡的设备，以及像大教堂那么庞大的焚尸炉（光是在集中营帝国首府的奥斯维辛，每天焚烧的尸体就多达2.4万具）；后来，随着德国军力受到初步的挫折，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的缺乏，集中营就发生了第二次改变，与灭绝政治上的敌对分子的最终目的（这是从未被否认的）并驾齐驱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建立一支庞大的奴隶队伍，让他们从事不给予任何报酬的强制劳动，直至死亡。

到了这一步，眼前呈现出的是一幅令人头晕目眩的被占领的欧洲的版图：光是在德国，上面谈及的集中营，也就是那些一般无法从那里活着出来的集中营，已经有好几百个了，还得加上几千个其他类型的集中营。只要想想，光是被关入集中营里的意大利军人就有60万，根据夏伊勒[注]的估计，1944年在德国强迫劳动的劳工至少有900万。

因此，集中营并不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现象。当初的德国企业就建立在集中营的基础上，它们是法西斯化的欧洲的一种基本的体制。从纳粹主义方面来说，如果轴心国获得胜利，这种制度将得以维持，进而得到延伸和完善，这并非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到时法西斯主义将得到充分的实现：特权的合法化，不平等和不自由的合法化。

甚至在集中营内部也建立并特意开创了一种典型的法西斯的权威体制：囚犯中间建立的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其中权力最大的人就工作得最少；所有的授职，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职务（清扫工、洗碗工、夜间值班看守），都由上面授予；平民百姓，就是完全没有头衔的囚犯，则完全没有任何权利；集中营里甚至有个恐怖的秘密警察的分支，由无数告密者和特务构成。总之，集中营的微观世界逼真地反映了极权国家的社会结构，在那里（至少从理论上）“秩序”是至高无上的，没有比集中营更井然有序的地方了。当然，我并不是说，要以我们那样的过去引导我们憎恨秩序本身，我们要憎恨的是那样的秩序，因为那是一种没有人权的秩序。

背负着过去这一切，如今听到谈论新的秩序、黑色的秩序，对于我们来说很奇怪：以往发生过的事件，似乎从未曾发生过，似乎并不意味着什么，而且似乎毫无用处。可是魏玛共和国[注]的气氛与我们目前的气氛好像并没有太多区别；而且从当初德国纳粹分子突击队（SA）建立的早期的集中营起，到德国的毁灭，到欧洲的解体，以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了6000万人，仅仅才过去12年。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繁殖得很快的毒瘤，我们正面临着其卷土重来的危险——呼吁人们在其一开始

抬头就起来反对它，这难道过分吗？

普里莫·莱维
1975年

---

1. 路易斯·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超现实主义代表作家，著有《欢乐之火》（1920）、《恒动》（1925）、《巴西莱阿之钟》（1935）；曾参加过抵抗运动，以此为题材的诗集有《悲伤》（1941）和《法国的狄安娜》（1945）等。
2.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1904—1993），美国记者、新闻分析员。他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担任战地记者期间，报道了纳粹德国从兴起到灭亡的经过。
3. 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k），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在德国建立的政体，其宪法是由集聚在魏玛的议会来制定，直到希特勒上台（1933年）。

政治放逐犯

帝国[注]每一块划分的领土，都建有自己的死亡集中营：奥地利的毛特豪森（Mauthausen），巴维耶拉的达豪（Dachau），图林吉亚的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汉诺威的贝尔森（Belsen），塞尔瓦-波耶马的弗洛森比格（Flossenbürg），以及斯雷西亚的奥斯维辛。它们之中有些集中营——格罗斯罗森（Grossrosen）、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和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几乎专门是为女囚犯设立的。每个集中营都有一个重要的核心，以及分布在周围整个地区的无数从属机构（Arbeit Kommando，即劳动指挥部）。

每个营地的政治放逐犯的注册登记方式是渐进的。中心营地与各个不同的劳动指挥部之间的运输往来十分频繁，而集中营与集中营之间的往来却不太频繁，随之而来的注册登记的方式也有所变化，有些集中营里就施行文身制度。

希特勒的疯狂在于，他不仅把特定的个人或一群人看作须与之搏斗的敌人，还把整个种族都看作敌人，而集中营就变成犹太人的公墓，尤为突出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很快与犹太人站在一起的，有在内战期间被德国人逮捕的反对佛朗哥的西班牙人，还有从领土被分别兼并后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爱国志士们。

从1939年开始，纳粹主义就把被占领的各个民族的爱国志士看作政治上的敌人，那些民族把对侵略者的抵抗视作对国家尽责的表现，而从那时起，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就挤满了整个欧洲的抵抗分子、自由人士、真正的国际精英。最早是波兰人，然后是法国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希腊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苏联人、南斯拉夫人，最后自

1943年9月8日之后，就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最后来到集中营，这并不减轻我们的同胞在集中营囚禁期间所遭受的磨难程度。死去的意大利人的百分比大约是93%左右，确实并不低于其他国籍死去的人的比例。

在每个中心集中营里，以及大部分劳动营里，都有一座焚尸炉在运作，没有建焚尸炉的营地也往那儿运尸体。尽管如此，尸体火化的速度要比人死的速度慢得多，因此大量的尸体都堆积在不同部门隔了一道墙的院落里，而后来尸体也都被埋在乱葬岗里了。

从意大利放逐的囚犯约有5万，这个数字包括被放逐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2.5万名犹太人（男人、女人和孩子），其中约只有上千人返回了意大利。

其余从意大利放逐的大部分人都前往毛特豪森集中营，在那里几乎有1万名爱国者死去了，只有730名幸存者，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在回国后，因疾病和生活困苦而去世。

第一批50名被放逐者，于1943年12月从都灵被遣送到毛特豪森。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报纸《亚历山德里亚的人民》以异常兴奋的语气宣布消息说：其中有两个人幸存下来。

1944年2月，从曾多次放逐过政治犯的圣维托雷监狱出来的工人们被遣送，他们是在米兰的塞斯托·圣约翰[注]进行过反抗的志士；3月从都灵启程的一趟列车上载有700多名爱国志士，除了有一大批在兰佐山谷的战斗中被抓的游击队员外，大部分是菲亚特的工人，以及3月上旬劳工大罢工的发起者，他们鼓动被迫为德国人干活的企业罢工并导致企业瘫痪。

后来，放逐的节奏逐月可怕地加快。甚至在被抓捕后没过几天不经审判就予以放逐，审讯却往往是以德国人的方式进行，不是在“民族大饭店”里，就是在前往都灵的阿斯蒂大街的“王后饭店”，抑或前往米兰

的特利斯特别墅：在乘坐运货的闷罐车越过边境之前，爱国志士们都在摩德纳（1944年7月，在那里足有69名爱国志士遭机枪扫射当场被击毙，其中就有已故的参议员加斯帕洛托的儿子）附近的佛索利收容营，或者在贝尔加莫的监狱里，或者在博尔扎诺的集中营里滞留数日。鉴于他们所面临的物质匮乏，被褥、衣服和食品倒是能不断地汇聚至营地，那是德国人建议囚犯们向家属们要来的。囚犯们一到营地就被脱光衣服，被全身搜查、剃光毛发，穿上劳改犯的囚服。囚犯各自的国籍，则是用缝在囚号旁的红三角上的缩写来区别，而政治犯的红三角则是与囚服上缝着一个绿色三角标志的普通罪犯区别开来。被指派负责监视营地各部门内部动向的囚犯多半是德国人的普通罪犯，或者是从最凶残的杀人犯当中选拔出来的，他们随身备有内藏刀剑的手杖和橡皮棍。

党卫军负责从外部监视营地，每天两次清点囚犯人数。

清晨4点起床，6点开始干活，工作多半是挖土和搬运石块；中间停歇三刻钟分发菜汤，下午6点收工。那些被指派去中心集中营的附属营地从事机械劳动的囚犯，其作息时间和待遇也相同，不过，那里的工作分成日夜两个班轮流，12个小时轮一班，而夜班的工作特别辛苦。

通常在将近晚上8点钟分发完面包，这时营地里一片寂静；不过，囚犯在夜里很快会不断地惊醒过来，有时是举行一次紧急集合，更经常的是对草褥垫和人进行一次搜查，或者仅仅就是为预防寄生虫而进行周期性检查。于是，在耀眼的探照灯光照射下，囚犯们赤身裸体地在营地的院子内列好队，任何真正的或者仅被推测为违纪的行为，都得挨棍棒揍打予以处罚，揍5到25下不等；谁身上或床褥上发现有一只虫子，也得挨揍，这是我们的狱吏们用来对抗寄生虫的唯一办法。

在今天这种场合，集中营里生活的种种细节可以忽略不谈，因为关于这个论题，各国的幸存者都写过许多书，那都是被无可辩驳的证据和资料所证实的。

第一个被解放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由苏联军队解放的。最后被解放的是毛特豪森集中营，是美苏军队联合采取的解放行动。

对于毛特豪森集中营来说，它最后一个被解放其实是一种幸运，因为面对苏联军队和英美联军要解放集中营的压力，德国人尽其所能地撤空其他所有集中营。那种撤空的行动，是名副其实的群体大屠杀！只要看看这幅情景就足矣！当苏联军队正要解放奥斯维辛时，囚犯们排着纵队，像自动的尸体，沿着斯雷西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路上行进，队伍一直延伸至毛特豪森，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好几千人中不到100人），在天寒地冻的冬夜，活着抵达毛特豪森营地后，却只能站在淋浴室的院子里一直待到天亮，因为按照卫生准则，他们在进入棚屋之前都得洗淋浴。

我们还想说的是，按照记事年表，毛特豪森集中营主要是在1945年4月开始用毒气室屠杀囚犯的，而在不到三天时间内，就约有1万名囚犯被毒死。在别的时期内，毒气室的运行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是有限制的。然而，奥斯维辛每天都在采用这种迅速绝杀的形式，有关这方面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大约在5年之内，超过500万人被毒气毒死！

在1944年那些最悲催的岁月里，精神和肉体上备受折磨的被放逐的囚犯们，当时抱有任何逃生的希望简直是痴心妄想，而当死亡不断出现时——深夜里，就在每个人躺着的那个像棺材似的杉木铺位的一旁，不断出现实实在在的尸体——随着注定要面对的死亡，令人不由得对生命的亲切感都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对于死亡的一种奇怪而又无奈的司空见惯，死亡业已在预料之中，显得那么熟悉，于是一种淡定而又庄严的告诫油然而生：要为生存下去而斗争，因为在那么多的人之中，至少有一个人必须活下来；要在必将到来的胜利之日去迎接解放，把最后剩下的力气花在有待完成的一种使命上，那就是要向世人诠释其他人的牺牲。让世界认识到法西斯主义这种思想观念的可怖，它否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权利的相等，让人们认识到世上有一种可怕的方式，它蔑

视基督教文明的最原始的诉求，它泯灭人的尊严，威胁人类，要把死亡营的奴役制度推广到全世界。

普里莫·莱维

1975年

---

1. 原文为“Reich”，指第三帝国（1933—1945），即纳粹主义所建立的政体。
2. 塞斯托·圣约翰，米兰市中一个区的名称。

奥斯维辛关押意大利人的囚室内部展厅解说词草稿

放逐囚犯的历史和死亡营的历史，以及奥斯维辛这个地方的历史，是与法西斯纳粹在欧洲的暴政史分不开的：从1921年初次焚烧意大利劳工部起，到1933年在德国广场上焚烧书籍，一直到比尔克瑙的焚尸炉冒出可耻的浓烟，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割不断的关联。德国籍犹太人海因里希·海涅[注]曾这样警示过人们：焚书的人，最终必然会焚烧人。这是古老的智慧，暴力是一颗不会自行熄灭的火种。

提醒他人和我们自己记住这一点，是令人悲伤的，却是有必要的。欧洲镇压工人运动和破坏民主的第一次试验产生于意大利，也就是法西斯主义，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危机，源自“残缺的胜利”之神话，古时候的贫困和过错培育了它。从法西斯主义衍生出一种狂热，膨胀成了对“承奉天意之人”的顶礼膜拜、有组织的强加于人的热情，一切决定都只依仗于一个人的专横武断。

不过，并非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当过法西斯分子，我们这些死在这里的意大利人可以证明这一点。法西斯主义的近旁，有另一条从未中断的线，它就产生于意大利，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早，那就是反法西斯主义。所有为反对法西斯而进行过斗争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证明这一点，1923年在都灵牺牲的工人烈士们、牢狱里的囚犯们、被放逐者和流亡在外的人，以及我们所有持不同政治信仰的弟兄们，他们为法西斯而忍受过痛苦，他们为抵抗由民族社会主义入侵者复辟的法西斯政权而死去。还有其他意大利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证明这一点，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条战线上阵亡了，他们曾违心地拼死对抗一个并非是他们的敌人的敌人，而且过晚地察觉到那原来是一个骗局。他们也是法西斯主

义的受害者——不知情的受害者。

我们并非不知情者。我们之中有些人是游击队员和政治斗士，他们在战争的最后岁月里遭到逮捕、被放逐，并且死在了这里，当时第三帝国行将崩溃，想到即将临近解放，他们心碎欲裂。我们之中大部分是犹太人——来自意大利各个城市的犹太人，也有外国犹太人，来自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以及德国的犹太人，他们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的种族主义法令胁迫下施行反闪米特族主义的意大利，曾获得过意大利人民仁爱和文明的对待。那些外国籍的犹太人之中有富人和穷人，有男人和女人，有健康者和病人。我们之中当初有许多孩子，也有濒于死亡的老人，然而，我们都像货物似的被装上闷罐车皮，而我们的命运、那些翻越奥斯维辛铁栅栏的人的命运、所有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把几百万人像有害的昆虫似的成批地集体屠杀，这样的暴行，即使在最黑暗的世纪里也从未发生过——让孩子和濒死的老人们就这样去送死。曾几何时，我们，一个文明国家的基督和犹太人的子孙（不过我们不喜欢这样区分），在此证实这一点，而文明在经受黑暗的法西斯之后才重新得以回归。

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我们曾无辜地被宰杀，纳粹法西斯的暴虐和野蛮在这里达到了顶点。来访者，请你观察一下这个营地的遗迹，好好沉思一番：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你都不是一个局外人。别枉费了你的旅行，别让我们白白地死亡。为了你和你的儿女，让奥斯维辛死难者的骨灰成为警示：你在这里看到了仇恨留下的痕迹，可别让仇恨结出的可怕果实孕育出新的种子，明天不，永远都不。

普里莫·莱维

1978年11月8日

---

1.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德国诗人，剧作家，随笔杂文作家。

在奥斯维辛的一个秘密防卫组织

许多年前，我在奥斯维辛当囚犯时曾遇上过一件事情，令我一时无法理解。临近1944年5月，上面给我们的劳工队指派了一个新工头：一个30岁上下的波兰犹太人，整天紧锁着眉头，寡言少语，显然是患有神经官能症。他经常无缘无故地揍我们。其实，在那里人人都喜欢揍人，在那种混乱无序的环境中，揍人是最容易的沟通方式，是人人都懂的“语言”，新来的人也一样：不过，那个工头往往是故意揍人，他沉着冷静，骨子里透着一种刻薄，有意伤害你，让你蒙受痛苦、受到凌辱。我与我的一位南斯拉夫囚友曾议论过工头的这种行为，他听后奇怪地微微一笑，并告诉我说：“是吗？不过你将会看到，他这样长不了。”果然，没过几天，那个爱揍人的工头消失不见了，没人知道他的下落，简直像是在人间蒸发了，一切都像是他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不过，在集中营里经常发生许多令人费解的事情，集中营组织机构本身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我后来就不再去想那件事情了。

在随之而来的12月，人们已经听到苏联的大炮轰鸣声越来越近，我偶然遇上了我的一位朋友，来自米兰的工程师阿尔多·莱维，我好久没见到他了。当时他急着要走，我记不得是为了什么事，而且我也很忙。他跟我打了招呼，并且对我说：“也许很快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有什么事，你尽管找我。”

我和阿尔多·莱维后来是在营地解放的戏剧性的纷扰之中再次相遇的，但是连同12月那次相遇发生的事件，我在很长时间之后才回想起我俩的匆匆相遇。后来在一次“作为平民百姓”出席的充满欢庆气氛的场合（就是前被放逐人员在罗马的一次聚会），期间有一顿招待午餐，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法国退伍军人：他曾在我待过的集中营里服役，但无论

是他还是我，都记不得彼此认识过。我们就今昔不同的生活境遇做了对比，相互交换了几句老一套俏皮话，如今是想吃什么都容易找到，而当初曾经是那么不易，等等。我们两个都喝了点酒，这就使得我们彼此都敞开了心扉。他对我说，在奥斯维辛的莫诺维茨，他参加过一个秘密的防卫组织，集中营内部生活中许多决定性的事件都取决于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而且组织上曾以他的法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指派他作为书记员在“政治部”工作，或者说是作为主管集中营内部政治问题的盖世太保工作。我问他，那次莱维工程师匆匆对我说的话，是否意味着他也属于这个秘密组织，他回答我说，很可能是，不过，为了保密起见，他们中的每个人只认识很少几个其他成员。

有关那个消失不见的工头的事件，我也要他做一番解释，可是他微微一笑，这使我不禁想起南斯拉夫囚友的那另一次微笑，似乎近在咫尺，历历在目。他回答说，是的，在某种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会冒极大的风险，从已筛选出要送往比尔克瑙毒气室的名单中抹掉一个名字，用另一个人的名字替代。不过，我们的那个工头的事件，他不记得了，但他觉得自己似乎处理过类似的事件：曾经有几次，他们就这样让一个密探或一个偷面包的窃贼突然消失不见，抑或就这样营救出秘密组织的一位成员。我知道，当初关于密谋罪的法律是十分严厉的，但我从未想到过，随便一个人的名字，比如我的名字，居然能用来保存在政治上比我更有价值的一个人的生命。我问他，在我所知的曾经冒过的许多风险中，也存在这种不为人知的风险吗。他用法语回答我：“显然是的。”

普里莫·莱维

1979年

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

亲爱的罗萨娜：

尽管我（眼下）无幸亲自认识你，但我感到自己是你的朋友，从很多方面来说，我觉得自己就近在你身旁。你要求我为“其他人”当时的处境做证，而当时我也像所有被纳粹分子占领的欧洲犹太人一样，被定义为“其他人”，就是说，被判定为外人，甚至被纳入敌人之列。我想，这种无异于从“正常人”的群体里被开除出去的判决，往往是来自外界；我想，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会感觉到自己是“其他人”，抑或自发地成为“其他人”。因此，这种判决总是令人痛心的，十分痛心。尽管这种对意大利犹太人的判决，在最初时没有比在他处更悲惨，正因为他们并非是“其他人”，所以他们不感到自己是“其他人”：千百年以来，他们就与意大利民族其余的人融合在一起，他们与其他意大利人有同样的习俗、语言、弊病和美德，尤其是面对法西斯的时候，他们与其他意大利人一样，就是抱着一种怀疑或无奈地忍受的态度，对法西斯主义表示满腔热情的只是少数人。1938年，就是在意大利颁布种族隔离法令时，我仅仅19岁，是一名大学生。与我的非犹太同龄人和朋友们分开，令我很难过，但并不感到羞辱（至少对我来说）。从报纸上读到的对意大利犹太人的所有谴责，实在是太滑稽可笑，以至于令人难以相信。事实上，这些消息也很少获得意大利公众的信任，连坚定的法西斯分子也不甚相信：在这个层面上，让意大利人民把自己看作比犹太人更加优越的民族，他们不太能接受，那是种族主义的法令无偿地赐予他们的身价。就像许多与我处境相同的人一样，我多少有意识地反击了法西斯宣传那些无端的谴责，有了一种觉悟，甚至为自己是少数者而感到自豪，那是以往我所不曾具有的。

1943年9月，意大利北方被德国军队占领了，局势骤然恶化。意大利所有的城市都爆发了一场对犹太人的真正的捕猎：德国的警察部队，很遗憾，也有意大利的警察，他们搜查了各处的避难所，那些没有能够抑或不愿意被放逐的犹太人都躲在那里，警察经常是根据被收买的某个告密者提供的一些举报去搜捕的。在约35000名居住在意大利的犹太人中，他们找到了8000人，这些恰恰是最没有自卫能力和缺乏生计的人，有赤贫者、患病的人，以及无人救济的老人。纳粹分子对这些人的迫害无比残忍：在这种荒谬绝顶的大屠杀中，他们连濒死的人和孩子们都不放过。

我是在瓦莱·达奥斯塔作为游击队员被抓捕的，但很快就被辨认出是犹太人。他们先把我带往摩德纳附近的佛索利收容营，于1944年2月底从那里被押送至奥斯维辛。不过，这个如今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名字当初却不为众人所知。我们那趟运载货物的列车拖拽着650个人，每节车皮50人，旅途历经五天，期间分发过食物，但没有水喝。在抵达的车站上，我们被赶下了车，然而，经过快速的筛选，我们立马就被分成三队。有劳动能力的男子，以及相应的有劳动力的女子，分别组成了两个队（96名男子、29名女子），其他所有人，也就是老人、病人和孩子——多达525人——都没有在集中营予以注册登记，就直接就被送往毒气室和焚尸炉了。据我在集中营后来得悉的消息，这种约一比四的比例，对每趟列车来说似乎都是固定的：一个犹太劳动力与四个去送死的人的比例。也就是说，大屠杀比经济剥削更为重要。

至于我个人的命运，在我的《这是不是个人》一书中已做过描述，远远不是当初在奥斯维辛受难的囚犯典型的命运。典型的命运是：囚犯往往仅仅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就会因心力交瘁，或者由于营养不良和饥饿所导致的疾病而死去。只要想一想，正式分发的食物所含营养的总热量约每天1600卡路里，就是说，仅仅够维持一个处于绝对休息状态的人的体力，而囚犯们却是穿着难以御寒的衣服，在极其寒冷的气候条件下被迫干着繁重的劳动。我重申：我们每个得以幸存下来的人，都是

命运的宠儿。我的幸运是多重的：一年的囚禁期间我从未生过病，可就在集中营被德国人丢弃的时候，我恰恰得了病，病得正是时候，面对不断挺进的苏联红军，由于某些神秘的原因，德国人疏忽抑或是忘了要灭绝那些无法跟着他们逃跑的病号。另外，我遇上了一个“自由的”意大利泥瓦匠，连续好几个月中，他一直偷着捎面包和菜汤给我。在1944年最后的几个月里，那是些最寒冷的日子，我终于体现了自己作为化学师的价值，被派到一个分析实验室里做一份并不那么辛苦和艰难的工作。

在跟我一起进集中营的96名男子中，幸存15个；29名女子当中，幸存8个。那么，在我们乘坐的那趟列车上被放逐的650名囚犯中，只有23个幸存者，存活率是3.5%。不过，那是一列幸运的火车，因为它是在解放之前不到一年的时候从意大利出发的：几乎没有人能够熬过2至3年的囚禁生活而存活下来。人数的合计，我是在回到意大利之后才得悉的，不过它与我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的相当一致，受害者的人数总计在600万左右，这个数字是由最终未能逃脱法律审判的纳粹头目们自己提供的。这600万人中，约有350万是在奥斯维辛被杀害的。

这是我遭受过的经历，它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如今我手臂上仍然留存着的刺青，就是这种经历的象征：它是当初我没有名字时的名字，我是编号为174517的囚犯。它刺刻在我身上，但它没有泯灭我活下去的意愿，相反，它更增加了我的这种意愿，因为它赋予我的生命一种目标，就是要带着证据出去，为了使类似的事情永远不再发生。这就是我写这些书所祈求的目的。

普里莫·莱维

1979年

追忆一个好人

我想以此篇短文追忆一位长期在我身边的好人，他曾经与我风雨同舟，他帮助过很多人却很少向别人求助，有一次他救了我的命，而就在几天之前他悄然去世了，终年85岁。他曾是一名医生：我想，在他半个多世纪的职业生涯中，他的病人不下几千人，所有的病人都会带着感恩之心和亲切之情怀念他，就像对一个竭尽全力救助你的人，他从不傲慢，也不强加于人，而是帮你彻底解决问题（不仅仅是健康上的问题），替你排忧解难。

他不漂亮，但他那丑陋的外表透着一种魅力。对此他还自得其乐，并且像个喜剧演员借助一具假面似的，会充分加以利用。他长着一个大歪鼻子，金黄色的浓眉跟灌木丛似的，眉宇间一双明亮的天蓝色眼睛几近天真无邪，从不流露出忧郁。最近几年来他耳朵聋了，他却并不因此而怨天尤人，不过，他原先就有自己独特的参与他人交谈的方式。倘若谈话令他感兴趣，他就会彬彬有礼、颇为得体地参与，但从来不提高嗓门（何况他从年轻时起声音就微弱，微微有些发颤）；如果他对谈话不感兴趣，就不再关注，他会显得心不在焉，毫不掩饰自己的不以为然——他会像乌龟蜷缩在硬壳里似的，径自翻阅一本书，或看着天花板，抑或会在屋子里转悠，好像那里就只有他自个儿似的。

但他在患者面前从不分心，总是十分专注。在休假时，他就会尽兴地娱乐消遣，而且事后还津津乐道，引以为豪；实际上他经常拿自己不多的弱点调侃，从不夸耀自己的优点：耐心、亲切和一种无言的勇气。表面看来，他挺脆弱，却拥有一种少有的精神力量，这更多地表现在他的承受，而不是他的行动之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会把这种力量传递给他身边的人。

我对他1943年之前的事情所知甚少；而从那时起，他未曾有过一种快乐的生活。他是犹太人，为了逃避德国人的抓捕，那年秋天，他曾企图跟一大群亲戚越境去瑞士。他们已经越过了国境，但是瑞士的边防军不肯通融：他们仅仅接受了老人、孩子及孩子的父母，其他人则统统被遣返回意大利边境——果然，他们全都落入了法西斯分子和德国人的手里。我与他是在意大利佛索利收容营里认识的，我们一起被放逐到奥斯维辛，从那以后，我们就没再分开过，直到1945年10月返回意大利。

一进入集中营，他的妻子——对人很仗义且不善自卫，她像保护自己丈夫似的保护着其他人免受欺凌——很快就被杀害了。他声明过自己当医生的资质，但他不懂德语，因此，就随着大家听天由命：在泥巴和雪地里从事艰辛的劳动，推车皮，铲煤块，运泥土，搬石头。这对所有人来说是一种繁重的劳动，而对他来说则是致命的，他身体单薄，很少经受磨炼，又不再年轻。在工地上没干几天后，他的双脚就被笨重的木屐给磨破了，整个脚都肿了起来，他不得不入住医务所。

党卫军医生在那里频繁巡查：他们判定他已经无法从事劳动，并把他放入去毒气室处死的名单之中；后来，多亏了他那些在职的同行，也就是那些在营地医务所当医生的囚犯们——其中有法国人和波兰人——的帮忙：他们连续四次成功地在死亡名单中除去他的名字。不过，在等待被判死亡和临时解决的间歇，他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己的本色：他体格弱小，但没有被集中营非人的生活所摧毁，温和而又平静地意识到自己是所有人的朋友，不带怨恨，没有忧伤，没有恐惧。

我们一起获得了解放；我们一起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奔波了几千公里，也就是在这次没有尽头、难以言喻的旅程中，他那种热情的、不可征服的形象，他那种颇有感染力的对希望的期盼，以及他作为没有药物来治疗病人的医生的热忱，显得尤为可贵，不仅对我们极少数从奥斯维辛返回的幸存者是如此，而且对行进在遣返回国的崎岖道路上的其他上千名男女意大利人，也是如此。

终于返回了都灵，他的毅力在所有遣返回来的人员中尤为突出，他保持与当初被囚禁的难友们之间仁爱的沟通渠道，即使是遥远的难友，甚或是外国的难友，与他都有联系。从那以后，他差不多又活了40年，唯有像他那样的人，才能为自己营造出那样一种境遇：户籍上他是独身一人，其实，他周围有一大堆的新老朋友，所有的朋友都觉得对他有所亏欠——很多人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感激他，有的因得到过他的一个明智的建议而心存感激，有的仅仅因为有他的存在，因为他那天真却永远令人难以忘怀，也不令人伤心的微笑而感激他，因为它慰藉人心。

普里莫·莱维

1983年

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富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我们的命运是不太值得羡慕的。我并不是说，后来世界上不再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了——自然灾害和人类自己造成的集体悲剧，到处都有发生——不过，尽管有种种预料，却没有任何事件是可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发生的一切相比拟的。因此，不管愿意与否，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证人。由皮埃蒙特大区展开的有关当年被放逐的幸存人员的回忆之调查是正确且又及时的，因为从受害者之广度和受害人的数字来说，这最后的重大事件在逐步勾勒出人类历史上，至少到目前为止，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

我是以证人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与此有关的。为此，我感到荣幸，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一本书，可以取悦或不取悦读者，可以有教育意义或没有教育意义，可以被人或不被人记得或重读。而这对我，作为讲述当初放逐囚犯事件的作家来说还是不够的。自从我撰写《这是不是个人》这第一部书起，我就期望我写的那些书——尽管是以我的名字署的名——能作为集体创作的作品被人阅读，像是能代表其他声音而发出的一种声音。另外，我还期望我的那些书能成为我们与我们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之间沟通的一扇窗或一座桥梁。我们这些当初的被放逐者，围坐在餐厅里，相互讲述我们那些业已遥远的事情，那是令人惬意的，却是无用的。是的，只要我们还活着，那么开口讲述出来，乃是我们的任务，不过，我们得讲给别人听，讲给那些当初尚未出生的人听，为了让他们知道“人究竟可以达到何等地步”。

因此，如果说现今我大部分的工作是与我的读者做一种不间断的对话，这并非是一种偶然。我收到许多写满“为什么”的信件，他们要求采访我，首先是，而且特别是由年轻人提出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集中

营的恐怖是怎么得以发生的？这种恐怖是否会再出现？

我不相信存在预言家或者其他能预测未来的人；至今还以预言家自居的人，经常都以可笑的方式可悲地失败了。我可不觉得自己是预言家，也不是近代史权威的诠释者。然而，这两个问题是如此迫切，使我感到有责任试图做出一种回答，而且是一连串的回答，这些回答就是借着这次研讨会的机会所散发的那些材料。有些材料是回答意大利、美国、英国的读者的，另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材料，是我从复杂的书信往来联络网上获得的成果，多年以来，这些书信往来使我跟《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德国读者有面对面的交流。那是当初犯下种族灭绝罪行者的子孙后代的声音，当初他们的父辈也许是受人命令，又或是些不想去了解事情真相的人。有些是当初持不同政见的德国人的声音，他们尽其所能地或多或少反对过他们的国家所犯的罪行。我觉得应该给以上这些人留下空间。

我们这些幸存者都是证人，而每个证人都有责任（也是依照法律），以完全的、真实的方式予以回答。不过，对于我们来说，这也牵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因为我们的队伍一直是那么弱小单薄，还在不断地缩小。我努力想尽到这份责任，我新近出版了《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你们之中也许有人已经读到了，此书至少很快将被翻译成英语和德语。这本书也是就放逐囚犯的事件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有关纳粹分子的那种放逐）而撰写的，并且尽量给予了回答，它是我已持续40多年的漫长对话的一部分：我觉得它与我们这次研讨会很契合。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我希望它能充实研讨会本身的议题，就是为让更多的人更好地理解今天的历史而做出微薄的贡献，我们有幸从暴力之中存活下来，当今的暴力乃是我们当初遭受过的那种暴力的产物。

普里莫·莱维

1986年

附录

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

普里莫·莱维和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下面提供的两个文件，不仅彰显出了一种非凡的记忆力，更是普里莫·莱维在被遣返回国后，立即坚忍不拔地展开一番艰难的调查的成果。他着手寻找昔日被囚禁的难友，与他们重新建立直接的通信联系；他到处打听囚友们的消息，无论是当初与他一起搭乘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趟列车上的难友，还是与他一起被关入莫诺维茨-布纳的（男性）囚犯，抑或是那些被送往比尔克瑙的（女性）囚犯。《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读者大概还会记得，作者在书的结尾回想起，在返回祖国后与夏尔曾相互交换过“长长的书信”，并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次见到他”，这种希望实现了。

这里转载的第一页未曾发表过的表格，出自普里莫·莱维的私人档案。我们衷心感谢作家的子女们能够同意把它公布于众。这是1971年5月3日，莱维在都灵交给德国检察长德特里希·霍尔茨内的名单的一份副本（在审判前党卫军上校弗里德里希·博斯哈默尔的预审阶段），检察长亲自来到意大利询问普里莫·莱维和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以及其他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在跟大法官的交谈中，普里莫·莱维本人对文件的特点做了如下解释：

在这份证词后面，我附上一份我的笔记，就是75名囚犯的名单，这是我回到意大利之后重新回想起来的。它牵涉当初在95名或

96名有劳动力的囚犯中，跟我一起进入莫诺维茨集中营的75个人。画上圈的是那些幸存至集中营解放的人名；标有字母t的，是那些于1945年1月从奥斯维辛撤走时被押送至布痕瓦尔德和毛特豪森的囚犯；标有字母s的是那些在筛选中被指定送往毒气室死去的人；标有字母m的是那些死于疾病的人；标有字母l的是那个唯一在解放后、在返回祖国之前死去的囚犯。有些囚友的编号我还能重新想起来：囚犯编号的前面的几个数字，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均为174。我的囚号为174517。

名单上的名字实际上是76名。

15年之后，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的《无用的暴力》一章内，莱维提供了他被遣送的旅途中一个颇有意义的细节："1944年2月，我被押送搭乘的那趟列车，是第一列从佛索利收容所出发的火车。（在这之前，其他列车均已从罗马和米兰出发，但我们没有听到过有关的消息。）"在12节车皮上都打上RSHA的字样，那是"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的缩写，就是由希姆莱于1939年9月27日创立的第三帝国中央安全局，他把指挥权托交给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注]，在后者被捷克斯洛伐克的游击队暗杀（布拉格，1942年6月4日）后，由希姆莱亲自担任临时领导，后来从1943年1月30日起交给卡尔滕布伦宁[注]。放逐犹太人的任务，重又交回给第三帝国中央安全局，特别的部门则交由阿道夫·艾希曼指挥。其他关于莱维所提供之名单的意义的重要资料可以在莉莉娅娜·皮乔托（Liliana Picciotto）所写的《回忆之书》（*Il libro della memoria*）中的《从意大利放逐的犹太人（1943—1945）》一章中读到［见1991年出版，穆尔西亚（Mursia）出版社，米兰，2002年新修订版，见第48—49页］：

根据奥斯维辛博物馆档案里所保存的文件资料，在抵达奥斯维辛后通过筛选进入营地的95名男囚犯的编号，从174471至174565；注册登记的29名女囚犯的编号，从75669至75697。

放逐者的名单（transportliste）没有保存，因为不知道被放逐者的总人数。当代犹太人资料中心(注)在寻找过程中鉴定出来的人数是489名，其中23人幸存下来。就是根据内务部(注)部长圭多·布法里尼·圭迪于1943年11月30日下达的抓捕令，被意大利特工人员逮捕的意大利和外国的犹太人。[……]

德国保安警局驻维罗纳总指挥部(注)，因担心不能及时凑满一趟列车的有效人数，曾对军事长官和警官们施加压力，让他们施行新的抓捕行动，为了能“在当月（2月）18日之内，而不是之后”移送。

后来这趟列车上被辨认出来的孩子（1931年以后出生）是31名，老人（1885年之前出生的）是18名。于1855年出生的最年长的妇女名叫安娜·约纳，最年幼的莱奥·马里亚尼，仅1岁。

事实上，莱奥·马里亚尼当时只有两个月大，因为他是于1943年12月18日出生在威尼斯，同年11月7日在他之前出生在费拉拉的是布鲁诺·法尔贝尔。多亏伊塔罗·蒂巴尔迪（Italo Tibaldi）的调查，我们获得了这新近的信息，根据他的调查鉴定出的人数达490名，幸存者的人数固定在24名，其中8个女的，16个男的。人们可查看伊塔罗·蒂巴尔迪所写的《普里莫·莱维和他的“旅伴们”》（*Primo Levi e i suoi «compagni di viaggio»*）一书，《历史的证人和作家，普里莫·莱维》一文中的“回顾从佛索利移送至奥斯维辛的历程”一节。该书由保罗·莫米利亚诺·莱维和罗萨娜·戈丽丝编著（朱迪纳出版社，佛罗伦萨，1999年，第149—232页）。

我们在这里提供的第二份材料，恰恰与交给（但不知在何时）伊塔罗·蒂巴尔迪的一份名单相一致，那是一份为检察官霍尔茨内准备的名单，全部是由普里莫·莱维亲手写成，并且有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在页面天头和地脚所写的两处说明。莱昂纳多的笔迹至今尚未得到认证。正像在以往的证词中已经出现过的那样，莱维的朋友把出发的日期以及抵

达集中营的日期提前了一天。

此材料已经被对莱维的同车囚友的调查的附录转载，资料是用影印件保存在米兰的“回忆放逐犹太人基金会”里，源自蒂巴尔迪提供的材料，档案封套编号121，卷宗号293，标题为“普里莫·莱维的回忆”。

原件已交给审讯博斯哈默尔的检察官霍尔茨内。1971年5月3日。

从佛索利被放逐者的名单（1944年2月21日），于1944年2月25日抵达奥斯维辛，并被带至莫诺维茨-布纳劳动营。
长方格圈起来的是幸存者的名字。

一位证人和真相

法比奥·莱维和多梅尼科·斯卡尔帕

在卡托维兹

由伦敦刊印的盟军宣传杂志《月份》在意大利发行，该杂志在第17期上发表了如下消息，日期是1945年5月7日：

> 由苏联专家组成，并有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的教授参加的一个政府工作委员会，完成了其有关奥斯维辛[注]集中营情况的调查。约有3000名各国的幸存者接受了询问，鉴于他们的声明，以及在营地找到的资料，工作委员会能够确定，从1941年到今年初这段时间内，在奥斯维辛死了400万人[注]。受害者之中有苏联人、波兰人、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报告接着声明，被放逐至集中营

的人，大部分被立即送往那个毒气室窒息而死。约六分之一的人被选拔去劳动。劳动营占地面积约300公顷，约可容纳25万人。德国人在撤退时，押走约6万名营地囚犯，1万多名留在营地的人被苏联军人解放。在营地找到了准备运往德国去的700公斤女人头发。

当时刚解放后不久。就在那几个星期之内，上述报道中所刊登的事实逐渐被各种更准确的消息来源所证实。至于数字，那是被明确认定了的，部分数字在随后的调查中得到重新评估，尽管来自波兰的令人震惊的最初报告之重要性是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更重要的是，上述的报道为我们做出了一份特别的贡献：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背景，本书开篇的文章《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应该就是在那种背景下产生的。

文本的作者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和普里莫·莱维，有过一种相似的经历，他们长期在逆境中休戚与共。两个人都是都灵的犹太人，都在1943年9月8日以后被法西斯国民卫队逮捕。贝内代蒂和他妻子约兰达，是在被驱逐至瑞士边境的英特尔维的兰佐附近被捕的，莱维则是在瓦莱·达奥斯塔的阿玛依（Amay）被捕，当时他正参加当地最初建立的一个游击支队。他们都被转移至位于摩德纳附近的卡尔比的佛索利，一个收容犹太人的营地；遭囚禁几个星期之后，他们于1944年2月22日被装上同一列放逐囚犯的火车，目的地是奥斯维辛。

那么，他们有同样的命运，但履历不同，岁数也不同：贝内代蒂的职业是医生，当时是46岁；莱维刚从都灵大学化学系毕业，24岁。他们在莫诺维茨（奥斯维辛第三营）经历了11个月的磨难幸存了下来。在那里，纳粹分子利用囚禁在集中营的奴隶劳力，想建立一家名为布纳的合成橡胶厂，可是那个工厂后来从未开始运营过。1945年1月，在苏联军队即将来到之际，纳粹分子强迫营地所有健康的囚犯加入撤离集中营的行列，踏上了远征之路，莱昂纳多和普里莫与几千名丧失行走能力的病号却被德国人丢弃在营地自生自灭。这样，当解放者到达营地时，他们

能够踏上回国的长途旅程——他们一起经过了几个月在欧洲的艰辛跋涉——得以回到都灵。

解放后，贝内代蒂来到奥斯维辛中心营地，以医生的身份向苏联指挥部报到，听凭他们安排：

> 但他们当时没有药品。我的任务是为每个住院病人写病历……我看到不少病人死去。我留在了那里，他们逐步地撤空了奥斯维辛的营地，把我们带到卡托维兹。但他们让我留在奥斯维辛那里当医生。当时我是留在那里的唯一的意大利人，我害怕与囚友们失去联系。于是，有一天，我没跟任何人说什么，自己登上一列火车去了卡托维兹，我知道那里有其他的难友……在那里，我自然是重新当起医生给意大利人看病。不过，当时那里多少有点药品。㊟

在卡托维兹，准确地说是在博古切茨的医务室里，莱昂纳多与普里莫再次相遇，他给普里莫留下的印象正如在奥斯维辛时的他：

> 他在医务室的三次筛选中，有三次被选中去毒气室，而在他那些任职的同事们声援下，他三次有幸逃脱了厄运。㊟不过，在那样的环境下，除了幸运，他具有一种基本的优秀品德——一种无限的承受能力、一种无言的勇气，那不是天生的，不是宗教的，不是超凡的，而是随时随地都具备的坚定不移的勇气，一种刚毅不屈的意志支撑了他奇迹般地挑战极限，而不致崩溃。㊟

在莱昂纳多方面，他于1945年4月25日给幸存的家人写的一封信里，是如此描写其重新从事的医生这个职业的：

> 我成了一个比较杰出的形象，因为当时我是唯一的意大利医生。我提名都灵的化学博士普里莫·莱维作为我的助手，他对我是

一种珍贵的帮助：他很聪明，有志向，很快就熟悉了他的工作，说实在的，那并不难。(注)

就在那几个星期内，“关押前意大利囚犯的莫诺维茨集中营指挥部”要求医生及助手提交一份《有关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医疗设施情况的报告》(注)，以备送往“苏联政府”。当时我们没有这份文件的直接线索，只能靠自己从随后起草的文稿中挖掘出来的材料，这将在随后提到。人们只能推测多半是由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做出的一种贡献，因为他是两个人当中真正的医学专家。不过，这里少不了其年轻的合作者的谨慎悉心的分析。我们甚至并不知晓，送交给苏联人的文本是不是用意大利文表述，抑或可以推测是被翻译成两位作者都相当熟知的语言，即法语。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莫诺维茨集中营医疗服务设施的运营情况，苏联指挥部表示出特别关切——或者，至少这是报告本身提示我们的；不过，研究似乎应该加以深入——造成解放部队在到达集中营时所发现的种种恐怖情景的原因，似乎有待从纳粹分子对放逐者的健康情况的漠视中去寻找，至少在第一轮的审讯中被证实是如此。不管怎样，胜利者优先向在营地工作过的医生们求教，力图重现当初集中营里曾发生过的一切情景：鉴于其所从事的职业性质，他们确实是可信的，而且因为他们同以清楚而客观的形式描述的事实保持着必要的距离，何况人们事先已确定，要分析当初被纳粹分子堆砌在集中营制度之中的几百万人体——灵魂似乎马上变得不甚重要——所受到的待遇。

一份科学报告

于是，那第一份报告就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路，而且无疑值得我们去档案里找寻它，也许它还与许多别的报告一起保存在文档里呢。不过，它也踏上了回意大利的路，被放在了莱维和贝内代蒂两个幸存者寒酸的

行李箱内，二人于1945年10月19日刚一回到都灵，就对报告重新稍做整理，让其又浮出了水面。

第一份报告的副本，几乎肯定是在1946年最初的几个月内递交给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历史文献局在都灵的办事处；多亏吉奥乔·瓦卡利诺（Giorgio Vaccarino）的关切，他是解放运动中的显要人物，那份报告仍保存在抵抗运动都灵办事处的档案里。那是一份用打字机打在一张薄纸上的文本，文字很整齐，有17页。在简短的前言中，两位作者以太过乐观的语气自问：鉴于反映集中营恐怖场面的照片等文献资料到处都有传播，是否还有人“也许”会不知道“死亡营”当初的“残忍行径”？接着，很快就谈到那些资料是怎么按照苏联人的要求写就的，并且提到在原稿上加上的“某些一般性的消息”：可以推测，报告的开头是关于作者被放逐至奥斯维辛的旅行，报告的末尾是关于营地最后几天的消息。占文本三分之二的整个中心部分，就像用大写字母写的标题所展示的，是一份详细的**《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以下简称《医疗报告》）。

从题目指出的地理位置的准确说明来看，文本的切入点显然是提供分析性的资料和通报情况。就这点来看，此报告似乎完全符合医学博士客观如实的谨慎态度，以及较之年轻的化学博士的科学精神。有关身为作者的“我们”的情况却不多，更多的是描述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旅程。此外，报告的话题撇开了个人的情况，而是聚焦有关营地的生活条件及其病态的反常效应，刻意忽略一切与报告的中心课题无关的任何因素，从中凸显出莫诺维茨集中营最普遍的、反常的、令人震惊的一幅画面。然而，它又连续不断地、清晰地向读者指出，当初支撑着营地“医疗”机构的逻辑体系。一方面是害狂躁症似的讲究表面上的礼仪程式——纳粹分子的一种真正的魔怔，另一方面却是系统性地大规模杀绝老弱病残者，一切都是有组织地进行，目的是让被放逐的囚犯平均活不过短短几个月。在关于奥斯维辛的《医疗报告》中，作者不仅揭示强迫大批人群经受的痛苦磨难，还直言不讳地揭露在营地中施行的极端手段，

叙述毒气室致命的按钮、焚尸炉冒出的浓烟，甚至描述交给特遣队成员的任务——提到特遣队成员都是“从犯有严重凶杀血案的刑事重犯中挑选出来的”，并且回想起他们那种确实形同猛兽的凶恶野蛮的面容。关于特遣队的存在以及他们所承担的恐怖的任务，像莱维和贝内代蒂这样严格且认真的作者，除非用更多的时间加以考证，否则是绝不会改口的；至于特遣队成员的来源，他们是后来才得知的，是纳粹分子特意从像其他人一样的犹太人中间选出来的，由他们负责分批撤空焚尸炉。

在莫诺维茨那样的一个营地里设置貌似医疗机构的一种逻辑体系，无非就是一种绝杀的逻辑体系，想实施受监控的灭绝行为。而在“绝杀犹太人”方面，《医疗报告》从开头几行就毅然决然地予以叙述，以免读者对事实的总体含义产生某些误解。而交给都灵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历史档案室的副本被标上一种“类别”，结果却削弱了该文本所要传达的分量：在原始的卷宗分类标签上，我们果然找到了用铅笔写的“法西斯暴行”的字样，对于一起大部分仍未被世人知晓的极端的历史事件，除了把其归入固定的相关卷宗里，似乎没有其他方式加以分门别类了。问题很清楚——不光是在都灵，在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地方[注]，这个问题更加普遍——即便是那些跟法西斯战斗过、对当年纳粹主义对犹太人施行迫害的特点和规模不甚了解的人，也都会这么做。

对于曾经遭受过极端苦难的人而言，更有另一种理由，就是想此文本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关注，虽然当时的氛围并不有利。莱维和贝内代蒂在前言中写道，现在很多人“也许”都已经知道真相。可事情并非如此；尤其是，更多的人是不想知道、不愿意聆听从死亡营幸存下来的人的讲述。不管怎样，要把那第一份系统反映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实况，尤其是有关“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公布在一份医疗杂志上的想法，是为了对抗那种愚昧无知，不管其源于何处；但不是选择一份面向少数人的专业性很强的期刊，而是刊登在《医药智慧女神》上，该刊物作为“供有实践经验的医生阅读的周刊”面向公众，因此赢得了一个相当宽广的平台，其影响远远超出了都灵市区的范围。

在都灵这样有着一种扎实的传统医学氛围的城市，直至1938年种族歧视的法令颁布时，那里的犹太人一直有很强大的影响，仅以朱塞佩·莱维（Giuseppe Levi）这样一个形象就足以说明，他于1946年11月24日发表的那篇文章提出了最雄心勃勃的挑战，就是想唤起更高层次的公众——正是医生们，对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根本价值（那是纳粹分子曾经肆意予以蔑视和践踏的价值）极为敏感——对纳粹所犯绝杀罪行的关注。当时，无论如何必须再做些什么，到了那个地步，已经不光是医生和化学家的任务，还需要作家拿起笔来。普里莫·莱维接受了挑战，他早就酝酿着要把自己被放逐的遭遇，以最广泛的探讨人性的视角讲述出来。他做出的这种新的努力，又一次在都灵民族解放委员会文献局的资料中得以证实，它被保存在“皮埃蒙特关于抵抗运动和当代史研究学会”（Istoreto），在装有《医疗报告》的同一个小卷宗里，只隔着不多的其他几页纸，是用打字机打的《十天的遭遇》的一篇稿子，即《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最后一章，却是莱维当时曾急着想写的第一章。《十天的遭遇》的最后一页在作者亲笔签字的下面，可以读到的日期是：1946年2月[注]。这就是说，两个文本都应该被看作平行的：是在同一个时期酝酿、写就、发行的文本，不能把其中的一份看作另一份的前身。它们可以相互对比，但它们是相互独立的。

《医疗报告》是普里莫·莱维与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合作产生并加以完善而成的，它经历过坎坷的事变，如今却承担着一种科学上的功能。《十天的遭遇》则是另一回事，它仅仅只是普里莫一次文学上的尝试。两位作者一起在同样的地方，而哪怕也在同样的那些人的身边周转，只是表明了他们向不同的方向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比如，《十天的遭遇》与上面已经提到的打字稿完全一致，这并非偶然——那份稿子是1947年秋[注]在《这是不是个人》一书决定出版之前写下的，原本是要求做进一步修改之用的，结果它于同一个时期被存放在都灵犹太人团体的文档之中，而且还存在第三档案馆。《医疗报告》和此后不久出版的《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结尾一章都存放在一起，就是在有关被放逐的

犹太人调查委员会那里，委员会在罗马，在马西莫·阿道夫·维塔莱上校领导下很快就开展调查，而且就在莱维和贝内代蒂返回意大利之后不久，收集到最初几次放逐至莫诺维茨集中营的综合材料。除了在这同一部集子中能读到那些材料，读者还可以在别处找到。

此外，《十天的遭遇》的文本也是以一个医务室作为背景，这似乎并非偶然，而且正是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医务室。如果《医疗报告》是以其泛指的、一般化的语气描述了“那些在他人的眼里只是一种东西的人”的非人经历，那么，《十天的遭遇》则是用“在寒夜里围着炉子”、感到“自己重新成为人”的那些人的讲述作为结尾。两个文本以两种不同却又互补的方式向没有经历过奥斯维辛或拒绝相信那段史实的人，讲述了奥斯维辛。

一次新近的发现

《医疗报告》在向作者认为重要的一些机构和人士散发之后，随即又发表在《医药智慧女神》杂志上，此后就被搁置在一边，以致人们在很长时间内不再听到和谈及它。仅仅到1982年，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逝世前一年，他在接受前“被放逐囚犯全国协会”的一次采访中提及过。人们在问及他是否考虑要写一些关于集中营的经历时，他曾回答说：

> 我曾经写过……不，我唯一曾经写过的东西，是一篇长文章，是关于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医疗服务设施的长篇描述，我把它发表在一个医药杂志上了。(注)

那次采访是属于在意大利首次进行的大规模的研究——由“被放逐囚犯全国协会”在都灵组织发起，这并非偶然，有关被放逐囚犯的研究是在对于种族灭绝的历史根本不感兴趣的一种气氛中组织的活动。作为一个很久以前所写的文本，又是出现在一个如此不为人瞩目的交谈中，

被采访者那瞬间的提示并没有让它引起多大关注。另外，在普里莫·莱维的一些作品和采访中也只字未提及这份《医疗报告》，尽管普里莫·莱维对自己作为证人的责任从未懈怠过，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与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友谊日益加深。

于是，就得等到1991年，这一回是在两次相隔不久的学术会议召开过程中，《医疗报告》再次被公众发现和提及：第一次会议是9月在圣·萨尔瓦多雷·孟菲拉托召开，第二次是在12月，由“被放逐囚犯全国协会”组织在都灵召开。借着举办这两次会议的机会，阿尔贝托·卡瓦利奥尼介绍了那篇文章，它很快就被视作一个新的重要收获[注]，不久后，它又被重新刊登在两部出版间隔很短的普里莫·莱维的传记[注]中。1997年，《医疗报告》被纳入由马可·贝波利蒂编辑的莱维作品全集中，并在欧洲各国陆续翻译出版。[注]此外，对《医疗报告》的重新认知，与随着作者的去世而出现的其地位在国际上被认可同步倍增，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医疗报告》几乎是一个未曾出版的文本——当然并非如此——尤其是因为它写就的时刻，不过也因为它是在作者谢世之后再现的，只不过是把它跟作品的其余部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跟《这是不是个人》一书联系在一起了。

由于《医疗报告》对其完整性、自立性和明确的目的性稍过忽视，很快被指为《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一份原始资料，几乎就是它的一种前身。人们对两者的内容进行了对照，寻找其中的关联，尤其是在《医疗报告》中自传性资料密集的地方。人们注意到有关毒气室和焚尸炉的确切描述，这在莱维的最主要作品《这是不是个人》中却没有。作者与贝内代蒂合作写就的《医疗报告》是采用更具科学性和泛指的手法，文笔的格调特别朴实简洁；这就又回归到作者那种同样的写作初衷——可以这么说——以此证实莱维的写作态度，也为了使其定格在原始的出发点，也就是使自己成为沟通精密的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

在关于《医疗报告》的那些评论中，又浮现出另一个质疑，尽管因

为难以回答而并未坚持：普里莫·莱维和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两个人之中，究竟谁是《医疗报告》的执笔者？他们各自写的又是什么？医生主要过问的是疾病，这似乎太自然不过了。可是，这牵涉要分辨出哪些内容应归于未来的作家莱维的手笔：在《医疗报告》的首尾部分增加的内容，是一些更直接地反映作者经历的资料，是否可能是莱维在返回都灵后拟写的？带有几分嘲讽和讥笑口吻的段落（实际上是相当少）又是谁写的呢？抑或是否可以推测是由未来的作家那不俗的笔头表述能力对《医疗报告》进行过通篇的校对修改——也许这种推测对医生不甚公正？

关于这一点，有一段被多次引用过的对贝内代蒂的采访录，值得在这里重新提一下。我们看看几段对话。采访者问：“您从来不想写点什么？您从来不想留下一种回忆？”他回答：“不曾想过，不曾想过，因为……理由很简单，普里莫·莱维的书出来后，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他已经把一切都写了。而如果要我写起那些经历……我会写出一本不好看的书……只是勉强地重复写那些他写得那么好的事情。您说呢？”[注]这就是贝内代蒂的态度；不过，试问如果有谁要求普里莫·莱维用他自己的语言来描述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医疗条件，莱维是否会做出同样的回答呢？

遭受过十分相似的屈辱的两个人，对一份由两个人签名的文本加以确认，也许就意味着两人对同样的言辞应共同负有责任。也就是说，要认同一种共同的模式，也就是毫无疑问地，《医疗报告》对于普里莫·莱维来说是如此，对于德·贝内代蒂也是如此。那是建立在两人共同经历的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如同建立在其他许多人共同经历的基础上一样；不过，从那种模式中更容易辨认出自己，因为那是力求把历史客观地呈现出来的模式。莱维几乎肯定是从中反映出其后来作为见证人-作家的那种大义凛然的风格：即使面对最最令人困惑的现实，也要寻找真相的激情冲动和对于事物的普遍感知。不过，对于贝内代蒂可以说同样也如此，通过那份《医疗报告》，他作为医生，验证了自己即便处于最

困难的情况下，也在客观诊断疾病方面显示出自身的效能，而且视之为定然要把自己成就为“好人”㊟——就像他的朋友普里莫·莱维有一天把他定义为是一位最好的医生一样——的那一堂课，永远珍藏在心里。

表达作者初衷的文本

早在1945—1946年两年之中，有关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医疗报告》就已经被纳入文献资料，普里莫·莱维和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在随后的几十年内，以各自的方式，抱着同样的夙愿，努力提供和收集资料。当《医疗报告》的两位作者把它当作介绍早已众所周知的属于过去的——尽管是刚刚过去的——事实的一份重要资料，于1946年11月重新刊登在《医药智慧女神》的杂志上时，它就像是在战争期间或是在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写就的一篇战斗檄文。在那战后不久的年代里，《医疗报告》是第一份含有科技特性的由从集中营幸存的意大利籍前囚犯呈交的证据：这是一个有力的举动，因为它很具体，面向当时有兴趣了解种族灭绝历史的为数不多的公众。

收集在本书中的由两位作者签署的其他一些文本，在几年的过程中，同样也逐步得以编撰问世（只是部分地发表过），目的是传播人们执意想知道的有关集中营里的实况，那是建立在精确真实的资料之上的一种认知。作为表达写作初衷的文本，尤其是没有文学抱负的文本，其目的是告知和质询不断变化的不同的对话者。今天重新阅读这些文本，有助于发现莱维的作品所考虑不到的一种尺度，以及从1945年直到他去世那年的一种更大的时间跨度。确实如此，与他那些多半是采用不甚直接的形式所做的关于放逐囚犯的最出名作品中的描述相比，这些文本以更明确的方式阐明了他的选择和思想。因此，这些文本更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莱维的工作方式，确定其新的思想产生的年代，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跟上他新思想的发展进程，就是说，在那些思想尚未发展成像他于1986年发表的最后著作《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所表现的那样完整之前。

我们收集在《这就是奥斯维辛》中的莱维的文本，都是些文章、审判的证词、座谈记录、讲话以及其他官方性的发言。所收集的各种文件，有时是不止一次发表过，却又分散在不甚普及的出版物的版面上，因此是被长期遗忘了。这些文件的大部分——23篇中有14篇文本附录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以及4篇是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文本——没有出现在1997年莱维作品全集的版本上，即是由艾依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由马科·贝尔波利蒂编著的版本：实际上，那是些最近几年里零星寻得的文本。另一些文本更为有名，而且已收集在莱维的全集中；不过，还是考虑把它们发表在这里，因为它们与之前的文本一样，能用来组合成一幅颇具特色的有机的画面。今天，我们在一个新的背景下阅读这些文本，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读，并且可以更加彰显其未曾发表过的令人颇感兴趣的特点。

我们把它们定义为“表达作者初衷的文本”，并且在这种形象基础上，排除了《这就是奥斯维辛》一书中那些穿插在莱维个人经历和集中营历史之间的某种思考，以及经过某种性质过滤的文本，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合宜的。对作为证词的文本，对种族灭绝的历史，哪怕是——如鲁道夫·霍斯的回忆——由纳粹党魁们签署的文本，也没有出现由他所写的前言和评论，更找不到他那些颇有争议的文章。本书也删去了那些有创意的文章、短篇小说或诗歌，以及对其作品的各种评论和说明，最后，也没有收入那些明显具历史性反思一类的文章，就是普里莫·莱维作为随笔作家而非证人来发表的那些言论。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出于对文集这种定位的尊重，我们放弃了作者那篇重要的（况且是非常有名的）论述：《奥斯维辛的黑洞》，其于1987年1月22日刊登在《新闻报》上。

从全书包括的文本的整体来看，从其资料按时间排列的顺序，从文本的格调及其议题所展示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我们期望文集能突现出用某种新颖笔墨勾勒出来的莱维的一个侧面。

回忆与寻找

这部集子首次向我们提供了——不过，仔细想想，它更是一种确认——重要的新消息，这在读过《医疗报告》之后，立刻能体会到。这是在都灵特拉奇尼犹太人档案馆里重新找到的一份未曾发表的文件：四页用打字机打出文字的纸页，保存在《十天的遭遇》同一个卷宗里。《莫诺维茨-布纳集中营的幸存者、囚犯号为174517的普里莫·莱维有关奥斯维辛及其附近集中营的报告》于临近1945年年底莱维刚回到意大利几个星期之后写就。当初的目的是向“遭受种族灭绝的犹太公民团体”提供有关所有被放逐的难友们的消息，那是他作为幸存者直至那一刻所能搜集到的。莱维确实拟写了一份加上评注的30个人的名单，他们就是那些从奥斯维辛撤走后、踏上致命的跋涉旅程的囚犯：当呈交此证词时，他还不知道他们不幸的结局。在这份文件的旁边是另一份名单：一份简单的84人的名单，其中有男有女，他们在抵达集中营后就立刻经过筛选被送去毒气室，或者死在囚禁期间，或者杳无音信地消失了，或者就在1945年1月17日和18日的夜里被撤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名单上并没有都灵人的名字，或者说只有被杀绝的都灵整个一家子人的名字：不是什么特殊的名字，那些名字只是留给想知道其命运的人的。

这两份名单，几乎肯定是莱维回国后正式作为证人的第一个举动，是一种同情之举、一种还原真相之举，他在之后的几十年岁月中多次为之努力。这种纯洁的人性的光芒，萦绕在每一个名字之中，普里莫·莱维身上天生具有的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体现在那些纸页上的每一行信息之中。

从他敲击打字机留在墨带滚筒上的印记，从他在名字后面敲击留出空格的斜杠，可以捕捉到他风格的标志：那个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阿贝纳姆，托斯卡纳人——一个姓，一个来历，是为了去寻找那儿的某个人——留出的空格后面，打上了“他会修理钟表”这句话，不是“钟表匠”或者“当过钟表匠”，而是“他会做什么”。一种回忆，像是留在一截

电影胶片、一封短信上的一幅轮廓肖像：那是一种品质和一个人的实情、一个具体的修饰语（表语），是一张道德身份证上的一个特别的符号、一门悉心从事的娴熟的手艺。而且就在这里，成了证人的普里莫·莱维，从我们用这个文集搜集资料的过程一开始，就成了善于从事更为复杂手艺的普里莫·莱维：他不局限于搜集资料，还审核资料，并把它们交织在一起，置于相互关联之中，从而不仅增进了对资料的了解和认识，还使资料更加人性化。

从他那些被放逐的难友那里所获得的证据，以及从逐渐浮现出来的书信来往资料中，可以看出莱维是以顽强的毅力，从一切他能求得帮助的人那里，悉心地尽快获得有关他那些难友们命运的消息，而一旦获悉消息后，他又善于过滤和甄别，并且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方式，把资料精致巧妙地组织起来。

这个书面报告是在我们的文集送印的前几天，在装有《这就是奥斯维辛》卷宗里重又找到的，它赋予莱维的作品一种新的尺度，同时又再次证实了：莱维是一个孜孜不倦地探讨“人究竟是什么，人究竟会做出什么来”这个很少有人感兴趣的问题的人。

审判的证据

就在《医疗报告》缓慢地开始流传的几个月期间，普里莫·莱维的第一份在都灵写就的报告也刚刚摆脱被遗忘的命运，与此同时，普里莫·莱维踏上了他生平最合乎其志向的道路——文学创作之路，许多名字——阿尔贝托、克劳斯内尔、“小伙计”、小女孩艾米利亚·莱维、军士施泰因洛夫、工程师阿弗雷德·L.——正准备在其《这是不是个人》一书中跃然纸上。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任何别的机会来汇报他被放逐的亲身经历。首先，战后对纳粹战犯立案审判的困难重重。莱维确信，要审判所有实施过纳粹法西斯主义并制造过种种恐怖行径的责任人，法庭也许是最合适的场所，他同样坚信，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亲自参加法

庭辩论，或者通过呈交书面证词，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

虽然莱维力图这样做，但1947年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司令官鲁道夫·霍斯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时，他没能去华沙出席，而在被传的其他证人中就有他的朋友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本书刊载了在审判之前两人共同拟定的声明，从写作时间上它十分接近1945年最初几个月在波兰写就的《医疗报告》的时间，却在判决霍斯死刑许多年之后，于1970—1971年在审讯从意大利放逐囚犯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弗里德里希·博斯哈默尔之际，才又重新被放在了一起。不过，它们所遵循的路线部分有所不同：由于莱昂纳多直接了解约瑟夫·门格勒本人及其罪行事实，所以就于1959年前后，为指控约瑟夫·门格勒出庭做证，而普里莫则是1960年在临近审判艾希曼时，把他的一份声明寄给了耶路撒冷的法院。

就像对待其他案件一样，对于莱维来说，能在一个审讯罪犯的场所参与审判，蕴含着对一部严肃的法典的尊重。提供精确无误的信息尤为重要，这就包含对事实的精心筛选，使人们感到对其有把握，哪怕自己提供的证词减少到仅仅是一丁点儿资料。另外，为确保犯罪者的名字准确无疑，为在必要时能够指明其体貌特征，得尽量详细反映事件的原貌，应该明确而又清楚指出个人对事件该负的责任：比如，关于党卫军在临近苏联人解放之际，在仓促地丢弃莫诺维茨集中营之前，冷酷地悄然杀害了18名囚犯的事件，在莱维《审判霍斯的声明》（1947）中，可以读到："我可以辨认出那些党卫军的面容。"

另外，证据得充分显示出一种区别对待的原则，这有利于法官们根据受指控的官员个人所承担的不同角色及其他们的不同表现，在必要时做相应的区别：比如，《审判博斯哈默尔的声明》（1965）强调指出，当初在佛索利收容营工作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军士们，向德国纳粹分子持续提供过合作；不过，对于作者指名道姓地明确提到的三个官员，应该承认，"他们行为正派，对待我们挺人道"。

相关数据有着一种特别的重要性。首先是被迫登上去奥斯维辛列车

的被放逐囚犯的人数，以及被挤塞在各个车皮里的人数；然后，在押送的囚犯抵达的车站月台上［在奥斯维辛城的民用火车站而不是栅栏门前挂着写有“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格言的地方：无论是贝内代蒂还是莱维，都精确地指明了这个细节］被筛选去毒气室或是被押送去强制劳动的男女人数。数字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不仅能确定全然一样的无名氏受害者的数量，还能确定那些旅途同伴或被囚禁难友的人数，或者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亲朋好友的人数。何况，那还是莱维力图使他们能够并应该重新变成人的数字。故而，在可能的范围内，应该竭力还给每个人一个名字或一个故事。

由于托付给他们的任务特别棘手，证人首先生怕自己有误，在这一点上，不会让人觉得是一种谬误。在这方面，莱维对自己要求是一丝不苟的——这在下面可以看得更清楚——他总是仔细审查自己每一次认证的可信度，并系统地修正以往场合中可能出过的差错。在这个层面上，他的朋友莱昂纳多——就像这里所包含的文本中展示的那样——也不亚于他，莱昂纳多只允许自己提供亲身验证过的事实，尽管他理解审讯证据的方式在许多方面是有所不同的。首先是他作为医生，对问题持有独到的看法，这一点是相当突出的。不过，除了具体事实之外，得同时令人信服地提供事情发生的总的背景，有助于把事实置于当时的背景之中，并对其加以诠释，比如，对于推动创立集中营医疗机制的责任人的外貌特征，以及对于放逐犯中可能存在的自杀现象的缘由，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某种情况下，这同样也能让法庭对受审的被告做出一种格外严肃的审判提供证据支持，也许这还有利于再次凸显纳粹们所犯的恐怖行径之极端程度。

普里莫·莱维在认证和表达意见方面同样审慎的态度早有所表现，在一则短篇小说中我们找到了间接的见证。1947年夏天，莱维跟他的朋友阿尔贝托·萨尔莫尼（Alberto Salmoni）开设了一个私家化学分析实验室，但不久就倒闭了；在《元素周期表》（*Sistema periodico*）一书的《砷》（“Arsenico”）篇中，阿尔贝托在书中以“艾米利奥”的形象出

现。《砷》篇讲述的是一位上了岁数的老鞋匠，他在都灵的克罗切塔居民小区修鞋，他那小小的顾客群都是跟他一样已到暮年的老太太。有一个年轻的行业对手给他捎来一小纸包有毒的糖，想把老鞋匠从修鞋行业中除掉。由于老鞋匠对那包平淡无奇的馈赠起了疑心，就去莱维-萨尔莫尼的化学实验室求教，老人得知了化验结果后，却决定不起诉那个年轻鞋匠："明天，我会让我的一位老太太把东西给他送回去，并且附上一张小纸条。不，我要亲自把东西送还给他，这样，我可以看看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表情，而且我还得说道说道他几句。"

这样恰如其分而又温和淡定的结尾，源自莱维在刚结束战争的那些岁月里始终抱有的一种夙愿：精确地描述他自身作为受害者所遭受的非人经历，并且能够直面犯罪责任人，"说道说道他几句"。正如人们所知，就在其不久前刚写完的《这是不是个人》一书中，他正是这样做了；然而，我们今天才从两份最老的证词中知悉——那份1946年关于莫诺维茨的证词，以及随后于1947年3月3日为审判霍斯所写的证词——他想具体地分析齐克隆B的成分：在第一篇证词中确认是"我个人的研究"；然后，在第二篇证词中毫不含糊地加以详细说明，"在奥斯维辛毒气室里使用过的毒药，经由我查验"（引自1946年的证词），是"用氢氰酸制成，并加上富有刺激性的催泪物质，目的是在毒气包装袋破裂或漏气时，更易让人察觉"。

在1945年至1946年期间，对一位从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化学师来说，弄到那样一包（这次引用《医疗报告》中的话）"装在铁皮盒子内的蓝灰色呈粉末状的化学药剂"，不应该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如今在这里，对我们来说，估量好足够的精神力量对毒药进行分析，并对此保持沉默，这是更为困难的，除非我们把如今才浮现出来的检查报告呈交给法庭。

具公开特色的演讲

1959年12月3日，在回答刊登在《新闻报》上的一个“想了解德国集中营真相的”的姑娘的一封来信时，莱维一开始就感慨地说：“正是我们所一直期待的。”并且他急忙就有关集中营的展览所展示的一切做了不容置疑的确认——就是在都灵展出期间的那几天——使许多当时曾困惑地徘徊在卡利涅亚诺宫的展厅里参观者（尤其是年轻人）的头脑豁然开朗。尤其打动人的是，在展览期间，尽管莱维是向一位中学二年级的女学生（报纸上没有登载她的名字）说话，却声明自己是以“被放逐囚犯全国协会”的名义发声的。他的言语应该被人理解为一席正式的发言，而不仅仅是作为发表在一份日报上书信来往栏目中的一个短小的回答。对于莱维来说，姑娘的来信确实标志着一种关键性的转折。人们终于以潜在的新对话者的姿态提出了一个真知灼见的问题：这就足以赋予他发表在市民生活专栏《时代之镜》上那短短几行的回答，一次重要的公开演讲的味道。这是一个标志，一种极为微小却又明确的标志，表明时代正在变化。

除了法院的审判庭，在20世纪50年代转折时期，人们进一步推荐一些公共场所，在那里，有关集中营的讲话以其在听众中赢得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得以合法化，此外，这也促进非文学性的文本发行数量的倍增，它们也被算在像莱维这样一个曾经作为证人的作家的重要作品之内。比如，与姑娘交换意见几个星期之后，莱维所写的文章就于1960年初交于由阿达·马尔盖西尼·戈贝蒂（Ada Marchesini Gobetti）创立的新教育月刊《家长报》，在这里，针对被放逐者的故事，莱维终于可以强调指出：“真理的声音非但没有消逝，而且赢得了一种新的音色，一种更加清晰的反响。”莱维并不满足于这种成果，他马上又着手以最好的方式向更年轻的读者介绍过去的经历，并且借助一句特别精彩的话、一种绝非开玩笑的文字游戏，提出了对语言的一种反思：“我们为遗忘（omissione），也为肩负的重任（commissione）[注]而感到歉疚。”接着，他还是玩一种文字游戏，这一回他用的是两个副动词的碰撞：“我们为自己的怠惰，为自己对思维能力丧失信心而感到愧疚；当我们说出当时的真相，我们感到歉疚的是，我们经常采用（adottando）和接受

(accettando)[注]一种并非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说话。”

要用一种新的语言来介绍新的论题，这就是此后莱维发言时所要采用的风格。1961年，莱维就在弗拉拉组织的一次有关灭绝犹太人的简短的报告会上——在“意大利反法西斯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一次报告会——做了有关这个主题的唯一的发言。而于1966年由“被放逐囚犯全国协会”在都灵举办的代表大会，则为莱维开拓了公开地思考的空间，使他能就对犹太人的放逐与出于政治因素的放逐的特点加以对比——这触及一个当时大多被忽略的问题。

与此同时，《这是不是个人》一书被翻译成其他的语言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被译成了德文版《这是个人吗？》。德译本于1961年秋出现在德国。跟在欧洲一样，在意大利出现了面向新对话者的可能性，那些对话者趋向于愿意倾听，但他们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而且他们是不属于朋友圈内的：他们是年轻人，是“一张白纸”（莱维喜欢用的一个形容词）般的，他们希望独立自主地为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构建一种可靠的形象。每次在莱维需要就放逐犹太人的经历发声时，他们已经为自己设置好了条件，似乎为了从《这是不是个人》的作者身上辨认出一种政治角色——也由于他过去当过游击队的经历，即便是短暂又不幸的经历。只要想一想，1973年为位于卡尔比的博物馆（纳粹死亡集中营里被放逐的政治囚犯和种族囚犯博物馆）揭幕而发布的解说小册子：解说词中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莱维是如何摆脱极其困惑的心态来接受当时是那么时兴的一对倒霉的形容词：政治的和种族的。

一直到最后三篇无法否定其公众性的重要文本：已出版的评论《这就是奥斯维辛》（《新闻报》，1975年2月9日），揭发了在当时意大利和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下再度出现的法西斯偏向的危险；于1978年为展览“奥斯维辛关押意大利人的囚室”写就的解说词，当时正值围绕建那份“备忘录”而展开复杂的政治谈判之际；最后，就是一个发言——在本书中，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为题名发表——其篇幅很短，却有

着突出的含义，不仅因为它是于1986年11月22日发表于莱维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之际，还因为此文是被莱维清醒地重新称为“尚未中断的一席对话”，是长达40年以来跟各种对话者所进行的对话。

从1945年至1986年，40多年的岁月，涵盖了普利莫·莱维与公众接触的全过程：从前面带有莱昂纳多签字的作为新的证据的《医疗报告》，之后通过跟一位中学二年级女学生的书信交流，直到由莱维更认真地写就的最后的反思作品的问世，就是1986那年出现在意大利诸多书店里的《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到了那个程度，似乎周期该画上句号了。

这一切之中，我们不应该忘记莱维作品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不无直接地明确为法庭审判提供的证词，它们或许更为众人所知；尽管这次所发表的文本似乎主要是发自其内心的迫切的信念。证词所反映的中心内容也是有关集中营的，然而作者的目光并不是环顾四周，以寻求能满足一位期待中的对话者的答案，而是每次都出于不同的理由，仿佛是专注在客观对象上。这里得提及万达的形象，就是那位一直留在他身边的年轻的女朋友，直到在奥斯维辛火车站月台上的最后诀别：一种清晰而又动人的情节描写、一种脆弱而又勇敢的人格，与一种太过短暂的生命的转折之间的交结。这里要提及他于1979年献给奥斯维辛秘密的防卫组织（委员会）的文章，无数次挑起伦理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处境——对此无法保持沉默，否则就是犯罪；还得提及他对自己被放逐的经历的简短回忆（《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仍然是在1979年），此文勾起了我们将之与罗萨娜·本齐（Rosanna Benzi，因行动不能自理而长期沉默无言的非凡的女人）所代表的不同境遇的对比。最后，作者怀着一种亲切和激动的心情描绘了另一幅肖像，那就是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形象，那是莱维1983年在莱昂纳多去世的时刻追忆的。正如同30年之前他对万达的追忆，文本始终未提莱昂纳多的名字，也许莱维是想突出其作为人、作为朋友的品格，想把他独一无二的几乎是楷模般的人格置于一切事物之上，得用语言把他铭刻在读者的脑海里。

批判自己的记忆

集中营的证人被一再传唤做证。不管是否公开声明，这就是社会对他的期待，呼吁他站出来讲述或写文章的发起者中有机关团体、学校和传媒；至于法庭，则含蓄地要求他每次的复述务必一致。如今的莱维已能做到不再重复自己，他不止一次地未能完全符合公众的期待；反之，他不止一次地令公众感到意外，让人们直面复杂多变的、令人不甚愉快的真相，而永远不能使他人的注意力放松下来。的确也是如此，公众在要求他复述真相的同时，还要求知道更多的细节和未曾发表过的内容：对后者的要求，莱维从来予以满足。不过，他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做：在每次发言中，他总能说出些新的东西，却避免追求煽情的效果。莱维特别喜欢启示智慧的、深入的思考，使人在事实框架中看得清模糊不清的地带，这就是他的风格。

搜集在这本集子中的文本，也再次向我们提出了重复和变更之间的辩证关系：主要的情节依然跟以往一样，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对此，我们在后面会有更好的领悟。当下有必要指出，莱维所写的文本提供了另一种益处：它们帮助我们学习到许多东西，知悉他为接近真相曾采取了哪些途径。另外，文本也告诉我们，他在追求真相方面从来没有沉默过，他在这方面几乎也总是开诚布公的。

就他采取的那些途径，首先是以能够与自己的亲身经历保持一定的距离为前提。“普里莫·莱维挨过饿，受过冻，挨过揍，也害怕过，”露恰纳·尼幸姆·莫米利亚诺（Luciana Nissim Momigliano）注在一次访谈中说道，“他跟大家一样，不带个人色彩，并充满了仇恨。只是在回国后，当着手写作时，他能够使自己与所遭受过的经历保持距离，既没有把自己写成一个怨天尤人的受害者，也没有把自己写成一个好报复的判官。”他对自己的那种要求，足以使他能对自己的记忆、行为方式和遗产，做出一种无情的批判：复活的记忆——正像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所说——既是美妙的，又是虚假的：不过，一经严格的查

核，可以变成了解过去的重要源泉，而且不仅是了解自己的过去。

但如何处理记忆？首先是，记忆能奉献给我们多少东西？就这个方面，莱维于1971年留下的《审讯博斯哈默尔之证词》一文中，对于他做证的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说明。

文本很具分析性，因为那是莱维与西柏林检察署的德特里希·霍尔茨内一次长时间谈话的成果，乍一看来，似乎采用了两种主要的语气：首先是确定无疑的语气，以一种高度的自信予以认证，有助于构建一个有机的并建立在确切线索之上的故事，尤其是牵涉在佛索利收容营的逗留，直至前往奥斯维辛的旅程。另一种语气，我们可以把其定义为不确定的语气，目的在于确定单个故事的段落接近真相的程度，而用多种多样的词语表达加以调节，这里我们引用文本最能说明问题的套语，许多不同的情况通过这些套语就能解决，他大幅度地采用一些具细微变化的词语来应对各种情况：诸如“据我所知”“根据我的回忆”“大约在20日那天”“我无法确切地说清楚”“确切的数字我记不得了”“我记不得（押送队是在车厢的车头还是在车尾）”“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从德国人方面（不说清楚是谁）”“我似乎记得”“我记不得”，还有别的诸如此类的套语。当然，不确定的语气也是为真相服务，亦即是为提供一种尽可能更真实的证据服务。

仔细观察一下，事实上的情况比我们能够用这些例子表明的还更复杂。每一种认定，不管是否有把握，都是在回忆的基础上进行核实的结果，然而，那从根本上就不是出自本能的核实，抑或结果也并非一致。我们看一看这样一些核实过程，是如何始终用同一个证词来说明多种特别的情况。文本中谈到了获悉某些信息的方法，比如被发配去从事强制劳动的妇女的人数，莱维记得当时只是做过“估计”；准确的数字是29名，这仅仅是回到祖国之后，在随后核实的基础上所重新建立的资料。文本谈到历史事实，不过也谈到在随后被放逐时段里所体验到的感受。文本也表明多种信息的来源：“根据我的一些囚友们所说”“有人告诉我

说”“到达奥斯维辛之前……有关灭绝犹太人的行动的具体消息，我是通过以下的来源获悉的”。这里有必要提示的是，随着其不时对亲身经历的不同消息来源的纠正，莱维对于资料的精确性高度谨慎的态度也不断递增。

对于为什么当时没有把许多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文本由果溯因地给予了解释：比如，在学会了一些德语后，他才明白，他们在抵达奥斯维辛时，被筛选的男男女女立刻就从站台被押送去毒气室了。“当时我们在旅途中的心理状态，不容许我们对他们加以区别”，因而难以弄清楚我们乘坐的列车是不是由党卫军押送。总而言之，有两项必要而又困难的工作要做。首先，纠正先前作为证人的回忆中犯过的差错：“有人告诉我说，整个旅程中至少有一个人死了，我记不得是男是女。这个细节是我的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告诉我的，他也是被那趟列车遣送走的。我很愿意按照这个意思校正一下自己在1970年9月2日所做的证词。”其次，是为了弥补不断丢失的信息所做的耐心工作：“在这份证词后面，我附上一份我的笔记，就是75名囚犯的名单，这是我回到意大利之后重新回想起来的。它牵涉当初在95名或96名有劳动力的囚犯中，跟我一起进入莫诺维茨集中营的75个人。”这里关键的词是“回想起来”，这个动词，把我们带回25年前，普利莫·莱维博士为都灵犹太人团体所写的报告：都是在他出生的城市拟写的两份名单——读者在这部文集的开始和结尾可以找到——它们相互一致，这更加重了它们的意义。

与他人对比：莱昂纳多

取得关于集中营真相的另一个途径，就是下决心有条理地对比自己与他人的观点。举个简单却富有启迪性的例子，依然引用1971年审讯博斯哈默尔德的证词：“根据我的一些囚友们所说，这些党卫军士官已在营地驻守好几天了，可我在近2月20日才第一次看到他们。我说不出他们是什么军衔，但我能肯定，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个是军官，因为我听到他在命令其他人。”从其他渠道搜集来的消息，经过适当的过滤和核实

后，丰富了情景，扩展了视野，有助于采取一种与个人的经历保持更远距离的态度。不过，得学会培植一张尽可能宽阔的关系网；就莱维来讲，他对其他人抱有的那种明显的好奇心，可能激励他扩展自己对人和事物以及对那些离他甚远所发生的事件的认知。

不过，其他人并不全都是一样的。比如——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他的那位当"'医生'的朋友，是属于跟他一起被放逐的人"，从他那里，莱维得知旅途上死了一个人的消息：那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无疑给被放逐者的命运投下了一道不祥之光。"我与他是在意大利佛索利收容营里认识的。"莱维在那篇《追忆一个好人》的文章中讲述到，而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名字在整篇文章中没有出现——"我们一起被放逐到奥斯维辛，而从那以后，我们就没再分开过，直到1945年10月返回意大利。"再往下读："我们一起获得了解放；我们一起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奔波了几千公里。"

似乎是"一起"这个词印证了他们之间的友谊，用来证实一种牢固的关系，这种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注定要发生变化。集中营里年龄的差别不可漠视，当时医生已是成熟的男子，化学师比他年轻得多，这种差别无疑具有重要性，他们一起为苏联人写就了《医疗报告》。在《这是不是个人》一书中，以及在莫诺维茨整个放逐期间，莱维对其当医生的朋友莱昂纳多从未像他对阿尔贝托和夏尔等朋友那样使用过表示平等和亲切的"二元的"形式——"阿尔贝托和我""夏尔和我"。[注]仅仅在《休战》一书中，他才采用这种形式，也许是为了表示一个比他年长的"好人"与他从一种深厚的信任的关系过渡到了一种更为平等的关系。

一回到都灵，莱维和莱昂纳多继续在一起做了许多事情：修订并传播《医疗报告》，为审判纳粹战犯提供证词，1965年一起共享首次回奥斯维辛之旅。且不说他们两人曾被某些人定义为"情同手足的两兄弟"[注]，这很正常，他们的居所相距仅仅几十米，且与共同相知相识的朋友交往。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在政治方向方面，或者就以色列侵

犯黎巴嫩事件方面，当时（那是在1982年夏天）普里莫对以色列政府持严厉批判的立场[注]，对此，莱昂纳多表示不能苟同。

而在证据方面，他们的意见则完全一致。尽管莱昂纳多留给其朋友莱维一种在文学上发挥的余地，但回忆在奥斯维辛所经历过的事件方面，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跟莱维的合作。故而本书一开头就带有他们两个人的联合签名，附录的第一篇《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同样是一篇两人合作写就的文章，其中可具体见到他们的手笔和书法；读者在附录中可以读到前面提及的名单的两份副本（呈交给在都灵审讯博斯哈默尔的德国检察署的霍尔茨内），即1944年2月26日晚，抵达奥斯维辛后立即被筛选去从事强制劳动的男性囚犯名单。95人中，莱维回想起76人（而不是75人），他们没有被立即押送至毒气室。在随后拟定的那个名单的一份抄本上，莱昂纳多亲自加上了审阅说明：他把出发去集中营的日期往后推了一天，这在别的场合也同样出现过。

我们可以提及的是，在莱昂纳多去世几天后，莱维在描绘其朋友形象的篇章中，没有提及朋友的名字，题目中没有，行文中也没有。选择这样做也许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难以接受同一个长期与自己相知相识的人的分离，这至少有一点像是跟自身的一部分分离似的。

集中营最阴暗的地方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莱维清醒而又勇敢地从事的第三个调查方向，这种从未停止过的调查，也体现在这部集子的文本中：挖掘集中营最阴暗的地方，发现令人憎恶的现实。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与现实进行较量，很快就成熟地意识到其面临的问题之麻烦和复杂，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后——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才决定止步，不再从事实的角度及其道德层面上予以深入探讨。[注]

在一篇早先的文本中，出现了以“周年纪念”为题的文章（因为是发表在1955年，集中营被解放后的第10个年头），不过，也许是因为这被人忽略的过去，莱维伤感地注意到，沉默正在过久地窒息着对集中营的记忆：“有关死亡营这个远未成为历史的论题，已经趋于被完全忘却的局面，至少在意大利是这样。”另外，历史的伤痛虽然刚刚被提及，但很快就演变成公开的辩论，反对当时已十分突出的倾向：把抵抗运动中阵亡将士们的牺牲与被放逐至集中营的人无名的结局混淆起来，“把集中营无数受害者的死亡称作一种荣耀”，我们在那两页被长期忽略的书页中读到，“那是毫无价值的。那并不是荣耀，那是手无寸铁、软弱无奈、赤裸裸的死亡，是不光彩的、可耻的、污秽的死亡”。而话题并非到此为止，有更多复杂的内涵得深入探讨：“受奴役并不体面，有人曾心甘情愿地忍受奴役，这应该被视作例外，令人诧异；但那种奴役制度本质上是使人处于一种卑贱的生活状态，几乎是诱惑人堕落和道德毁灭的根源。”

这种独具一格的惊人的观点，是公开对抗战后相当普遍的善与恶之间一种正面对立的思想，意识到这一点的作者，立刻告诫说：“不过，得弄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把受害者和刽子手混为一谈。”接着，他与当时的思想倾向分庭抗礼，还重申：“这并不减轻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的罪孽，恰恰是百倍地加重了他们的罪孽。”最后，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无限地拓宽视野，深入地探讨和思索：“把这些事情说出来是有益的，因为它们是真实的。”那么，不仅仅数字是真实的，最残忍的种族灭绝方式也是真实的。这里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真相，尽管很不明显；除了要探究施虐者的卑劣行为，首先更应探究受害者本身的思想。

从1955年至1961年，在漫长的六年期间，产生了诸如审讯艾希曼这类的消息，这是第一起具有强烈国际反响的事件，还出现类似发表在《新闻报》上的12岁女中学生的那封信件，这都是些令人欣慰的征兆，但有关种族灭绝的课题，大气候却难以改变。尽管莱维几乎在孤寂中苦苦地思索着，但他的讲话变得愈加明确清晰，作为对外界这些反应的回

报。这次，我们要读一篇发表在杂志《桥》上的文章，那是一份具全民特色的颇有权威的刊物，由皮耶罗·卡拉曼德雷（Piero Calamandrei）在佛罗伦萨创立；至于文章的题目“为审判艾希曼提供的证词”，则与当时的局势有关联，较之其他文章其内容所涉及的面更宽，更有分量——几乎堪称一篇杂文——它重拾在《周年纪念》一文中断了的话题：“在真理面前，我们不应该停滞不前。”故而，有必要承认：“集中营不仅是折磨人致死的场所，也是使人沉沦的地方。人的良知从未像在集中营里那样受到强暴、伤害和扭曲。”

莱维的论据很快就得到证实。首先，“集中营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有许多令人震惊的别样的细节是颇具特殊意义的。凌辱人性、贬低人格、使人沉沦”，这对于纳粹分子实质上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目的在于嘲笑来自以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威胁：凌辱应该能迫使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德国人民——喊出类似这样的话来：“这些人不是人，他们是玩偶，是畜生。”

另外，还有更甚者。对于那种把集中营定义为“使人沉沦的地方”，或者根据六年前在《周年纪念》一文中提出的说法，把其定义为是“道德毁灭”的地方，应予以解释。莱维的回答是这样的，进一步的真相是如此令人震惊、目瞪口呆：

> 通过另一条途径，同样可以达到侮辱人格、使人丧失尊严的目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即使是最高层，都是从囚犯中选拔出来，许多人还是犹太人。不应该认为这样会改善营地囚犯们的生活条件，事实完全相反。这是一种逆向的“筛选”，被选中的往往是最卑劣的、最有暴力倾向的、最凶恶的人，只要他们能好好合作，就赋予他们一切权力，发给额外的食物和衣服，可免去繁重的劳动，可免除去毒气室送死。他们也确实是好好合作着。

于是，在奥斯维辛善恶颠倒的世界里，出现了道德上进退维谷的窘

境，对此，莱维仅仅在更晚些时候，在其《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以一种更为宽阔的视野重新进行了反思，不过，在他的那些偶尔发表——我们可以这么说——的文章中，他进一步地指出那种邪恶现实的另一面问题。比如，我们想到前面的1979年写的那篇文章，其中讲到在奥斯维辛有的人属于“秘密的防卫组织”，他们可以操控被筛选去毒气室的囚犯的名单，那么动笔划一下就能决定——虽然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其他人的身家性命。

沉默的理由

集中营里所遭受的磨难与现今世界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反思的第四根轴线，这在《这就是奥斯维辛》一文中可以追寻到。从这个角度出发，莱维不得不经常“较量”的就是这样一种令人震惊的事实：在一个不顾一切地想把那痛苦而又不体面的过去都存放起来的世界里，对于种族灭绝的历史普遍持保持沉默。作者正是用“沉默”这个词，来描绘那种应有的“关注”之缺欠。这首先应该被理解为指当初经历过的一代人对世人的亏欠，那么至少是不可能不知道一部分真相的人。沉默也应该被看作一种几近有意识的行为表现，不过，那得包含有确切的、可以寻找得到的理由。最后，沉默的反面就是发声：如果沉默是无言的缺席，那么，言语可以把要传达的东西表达出来，但那仅仅是以最清晰的形式把真相呈现出来。

最痛苦的沉默——让我们再次引用1955年发表的《周年纪念》一文：

> 对于文明世界的沉默，对于文化的沉默，对于我们本身的沉默……不应该把这种沉默归诸身心的疲惫和年华的耗竭，或归诸对“生存的第一需要”的正常心态。不应该把沉默归诸懦弱。我们身上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更正当的诉求，在许多场合下，它劝说我们对集中营的往事缄默不语，或者淡化或非难这些事件留在我

们记忆中依然栩栩如生的形象。

这是耻辱。我们是人，跟杀害我们的刽子手一样，同属于人类大家庭。面对他们异乎寻常的滔天罪孽，我们感到自己同样是索多玛和蛾摩拉的子民……

我们是当初奥斯维辛所在的那个欧洲的子弟：在我们生活过的那个世纪里，科学被扭曲了，孕育出种族迫害的法令和毒气室。

反思必然会引出这样的问题："谁能说自己一定会免受腐蚀毒害？"这是一个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的问题，同时通过这个问题，把人们对那种腐蚀毒害的性质的中肯的探讨与对每个人应负的道义责任的思考也连接起来了。

说到这里，在莱维的视野里，"沉默"最后也担当着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成了"一种错误，简直是一种犯罪"，因为"无辜者的羞耻感和沉默能够掩饰责任人有罪的沉默，从而能够延期并使其逃避历史对其做出的判决"。最后的这些言辞是些非同寻常的真知灼见，但这些话是在1959年致"想知道真相"

的一个小女孩的一封信中读到的，这并非偶然。

为何要说

如果缄默不语在道德层面上是一种该受到责备的行为，那么站出来说话、敢于做证，反倒是提供了一次救赎的机会。这也是作为作家和证人的莱维在日常活动中比在他的文章中更经常提及的一个课题。就这个方面，令人想起露恰纳·尼幸姆·莫米利亚诺的一句话，他也是与莱维一起被捕、一起被放逐去奥斯维辛的人，那句话似乎概括了两个人的思想："当初我就深深地意识到，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事实，带给我的义务永远会比权利更多。"[注]

首先是把以往的经历讲述出来的义务。可是为什么要说呢？或者更准确地说，该说些什么呢？怎样在战后的世界里展现集中营呢？可以有很多回答，不过，所有的回答都牵涉那个颠倒了的世界的基本面貌，那是个如此难以理解又如此难以描述的世界。我们看看第一个回答，是莱维在《周年纪念》一文中向我们提出的从未被太多引用过的，也是说得过早些的话："沉默是不容许的。如果我们都沉默了，那谁站出来说话？当然不是那些罪人们和他们的同伙。倘若没有我们的证据，当初纳粹分子的残暴兽行，由于它们本身的异乎寻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被弃置在传说之中了。因此，需要站出来说话。"只有说话，首先是亲身体验过集中营境遇的人站出来说话，才能够证实他们所遭受过的经历，那是进行任何进一步调查的首要的条件。

在其他场合，当有人几乎是以一种谴责的形式表示异议"为什么不断地谈论恐怖"时，问题再度被提了出来。在1961年所做的《审判艾希曼的证词》中竟然出现这种谴责，这是意味深长的，人们期待的谴责者似乎应该出现在莱维的书页中。鉴于这些表面上的自相矛盾，话题趋向于开拓一种多重性的解释，从另一方面说，这些自相矛盾的悖论有助于把集中营定格在一个更加宽阔的背景之中。出于更多的理由，沉默应该被打破。其中就有如下种种理由："为了唤醒所有人的道德良知，我们应该把我们看到的一切都讲述出来"；或者因为"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弥补"。然而，似乎还有别的真正的理由："历史不能被篡改"，历史在总体上是属于我们的；而我们也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它是我们作为人的本性的一部分，那是我们万万不能失去的。连接着我们的现在与孕育出我们的过去之间，有一种我们无法摆脱的牢固深厚的纽带。有一种情结，它为莱维后来就为什么要讲述集中营往事而做出的回答加重了分量，并赋予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些发生过的事件太意味深长了，令人隐约看到一种太过严重的疾病的征兆，对此缄默不语是不允许的。"一种曾经侵袭过昨日的人类的疾病，被人们以付出巨大的牺牲击败了，但这绝对不等于说，这种疾病会放过明天的人类。

前面所有的引文摘自1961年有关艾希曼的短文。在最后一段引语中我们遇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形容词“意味深长的”，因为是用来表示文字的含义，所以是非同寻常的：20年以后，我们又发现它被用来起同样的作用，在小说集《莉莉斯和其他的故事》（*Lilít e altri racconti*）中的题为“直陈式现在时”（Presente indicativo）的片段中。普里莫·莱维昔日所经历过的时代，蕴含着这种亘古不变的思虑、这种惊恐不安。

“意味深长”的奥斯维辛事件，莱维向我们奉献这个定义后，在《为审判艾希曼提供的证词》一文中，立刻就展现出纳粹主义那种罪恶所产生的具体后果：劳动营、把犹太人沦为“动物种类”、毒气瓦斯和焚尸炉。

> 然而，还有更恶劣、更糟糕的事情，它表明无耻的罪恶是多么容易得逞……这不仅仅在德国，德国人凡在他们所到之处都搞这套伎俩。这是一种小孩子玩的游戏，物色到叛徒后，让他们当总管，腐蚀人的良知，营造或恢复那种貌似一致苟同的氛围或公开的恐怖气氛，这是实施他们的帝国蓝图所必需的。

虽然这好像是对一个特定的人说的，但莱维1961年所公布的文本并非是想列举进一步的罪状：它确实是一份为艾希曼而写的证据，但并非是控告他的证据，这并不意味着莱维打算减轻艾希曼的罪责，完全不是。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奥斯维辛的一个幸存的证人，即使是在一个集中营业已消失的世界里，即使是在一个假想已完全实现和平的未来的世界里，仍孜孜不倦地继续从事着他“把真相告诉世人”的工作之理由：为了不让新的艾希曼再度出现而宣传“罪恶的传染”，以寻求有人聆听。莱维“为了”艾希曼所做的证词仅仅是这个意思：他这是为“历史”（这里用的是大写字母）做证，“历史”应该被铭记和传承，这是反对整个民族在道德上成为同谋的一种证据，它提前向我们描述了纳粹主义是怎么能以胁迫囚犯们与之合作、令囚犯们表面上就范，而终被定义为“不必要

的暴力”的。

15年之后——现在我们是在1975年；发表在《新闻报》上的文章的题目，就是这本书的题目“这就是奥斯维辛”——论题实质上没有变化，但语气和结论部分有所不同：

> 现在我们已减少成几十个人。也许我们人数太少，以至于没有人聆听我们说话了；另外，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是令人厌烦的讲述者。有时甚至在眼前出现一种象征性的梦，好奇怪，那是在我们被囚禁期间夜里经常做的梦：对话者不再听我们在说什么，他听不懂，心不在焉的，然后就走掉了，留下我们自己孤零零的。不过，我们仍然得讲述出来：这是对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囚友们的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它赋予我们的幸存以某种意义。我们有了一种人生的基本经历（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懂得了某些关于“人”的含义，那是我们觉得有必要传播的含义。

就正像“历史”一词那样，这一次“人”这个字也用了大写字母：莱维不怕咬文嚼字，在不多的关键时刻，他觉得有必要讲究修辞。从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人——他想竭力强调这一点——似乎掌握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几近隐秘的真相。因此，就得由他们来把集中营当作揭露的对象。的确如此，唯有他们才能够对衡量人的本性的一种重要尺度体验到极致。秘密就在于：“我们意识到了‘人’是征服者：尽管有几千年的法典和法庭，‘人’始终是这样的征服者。”

一段始终不变的历程

奥斯维辛解放30年周年纪念日过后没几天，《这就是奥斯维辛》一文在《新闻报》上发表了（正是从那时起，莱维开始与这份都灵最重要的日报进行不懈的合作），文章是以社论的形式发表的，这在他发表的文章中很少见。文章的内容可以说是特意安排的，自确定刚过去不久的

集中营历史事件与当今的现实之间产生强烈的激荡的时刻起，莱维就采取了强烈的立场，其渊源就在此：法西斯有死灰复燃的可能，这是莱维一种公开的颇具政治分量的忧虑。“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繁殖得很快的毒瘤，我们正面临着其卷土重来的危险——呼吁人们在其一开始抬头就起来反对它，这难道过分吗？”

就在那几个月里，莱维的那种担忧显得尤为明显，他被选为阿泽利奥文科高中(注)的学院理事会主席；他在那里任职一年半，尤其在那个时候——有关学校的民主自治机构的法令刚生效不久(注)——是有明显的政治分量的。

我们继续拜读莱维的文本，以免错过他的思路。在阐明揭露昔日的集中营事件的意义之后（“人”是征服者，如今的“人”仍然是这样的征服者），不顾是否会与读者产生某些即使仅是时间上的距离，文章紧接着说：

> 许多社会制度提出要抑制这种滋长不平等和滥用权力的趋势，可另一些社会制度却赞美这种趋势，并使其合法化，把它指定为最终的政治目的。人们可以把这些制度定义为法西斯的，无须用任何牵强附会的措辞：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的其他一些定义，但我们觉得更符合我们经受过特殊事件的定义就是，那些在理论和实践中否定所有人之间平等的基本权利的一切制度，全都是法西斯主义。

莱维意识到，几年来出版的许多作品（在同样的道德力量激励下，其所写的作品各有不同）巩固了自己在公众中的权威，这也得益于他的一贯表现，以及作品中所彰显的他本身的形象。凭借那种权威，他觉得如今自己得努力对抗一种业已迫近的危险。他不认为自己负有精准地复原历史的重任，尽管他的文章已勾勒出当初的历史轮廓。莱维认为突出人与人之间必须平等的基本价值更有益于人类，这是他通过对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的回忆所广泛证实的，即便付出了将问题简单化的代价。因

此，莱维认为，有必要追讨奥斯维辛的教训——跟集中营一样，法西斯主义应该被看作对全人类的一种伤害——所传达出的普遍性的意义。当然，他并不曾想在那个时刻，以某些理由埋没犹太人在种族灭绝历史事件中的中心地位，而是出于他在探讨人性方面始终表现出的一种特有的敏感性，《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题目中的最后一个字“人”，正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这些就是1975年2月为《新闻报》所写的论文的特点，文章的架构与他在两年前为卡尔比的博物馆这一历史性建筑准备的解说词有所雷同，那时候他对法西斯主义沉渣浮起的担忧并没有像稍后表现的那样突出。在那篇解说词中，他也把集中营事件从道德上给予世人活生生的切实的教训放在了首位：“产生集中营的理论根据很简单，因此也很危险：每个外国人都是敌人，而每个敌人都得被杀死；凡是从语言、宗教、外貌、习俗和思想等方面感觉到对方与自己不同的人，就都是外国人。”接着就是一段简短的回顾，旨在把集中营事件归入纳粹主义发展最全面的框架之中，并且指出哪些是希特勒逐个实施暴力的优先目标，也指出了全面诠释集中营的历史的主要症结。请看其中的一个重要段落：

> 随着波兰被占领，德国拥有了（用艾希曼的话来说）“犹太主义的生物源泉”：除了在“特别行动”中被抓捕的人数不确定的平民、游击队员和军人以外，还有250万犹太人。这是一支庞大的命运不济的受害者和奴隶的队伍——“集中营”的最后目的被一分为二了。它们不仅仅是镇压的工具，而且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施行有组织的大屠杀的恐怖的机器以及强制劳动的中心，他们指望集中营能助德国所做的好战的努力一臂之力。

在这种框架内每种元素都有其一种意义，不向时代的精神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虽然在某种特殊情况下，那是一篇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文章，就像已经提及的那样。比如，文章里没有提到公民的权利，这在那

些年代的反法西斯文化中还相当普遍，即应该承认放逐政治犯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一点甚至几乎掩盖了谈论“放逐犹太人”的重要性。莱维在根本的问题上是不妥协的，除了在用词和讲话的结构上略显谨慎外（至少不冲撞其相应的对话者的敏感性），正如他前面的《医疗报告》所做的那样。另外，对于在每个时期里犹太人的处境与其他被放逐的军人和政治犯的处境之间的差别，莱维心里很清楚，并且从来不乏极大的关注，他自己就曾经属于“那些不能做选择的人”，他在另一篇题为“犹太人的遣送”的文章（1966）中，曾这样讲述：“就是为所有意大利和外国的犹太公民做证。这些人当初不能做任何选择：他们之中有妇女和老人，他们是多年来与外部世界割断任何联系的人。自1939年起，他们就生活在不公开的秘密状态，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做出某种选择的。我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管怎样，尽管有巨大的困难，尽管没有一个组织，但当初是有过一种抵抗的。”

颇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刚刚分析过的1973年和1975年的文本，与1978年拟写的特别有分量的一个文件之间，能够发现它们结构布局上的一致性。这就是《奥斯维辛关押意大利人的囚室内部展厅解说词草稿》，它是建立在一种回忆的基础上，把许多相关的主题更紧凑地聚合在一起的成果。这里就不再复述在书后《文本的信息》中以分析的方式表述的内容，只需提及一些主要的元素。即便是在极其短小的文章中，作者还特意向公众提示海因里希·海涅的一句格言：“焚书的人，最终必然会焚烧人。”[注]——一则智慧的定律，让历史从文学的角度给予精辟有力的回顾，虽然只浓缩成短短的一句话（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才显得更有力度）。话题牵涉1920—1945年间发生在意大利的重大事件，避开一种地域性的视点，而承载着整个欧洲的幅度，从中突出了（亚平宁）半岛在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战线上双重的首要地位。然而更重要的是，如此勾勒出的总体背景就把截然不同的被放逐的受害者的名册置于一种相对平衡的历史回顾中，没有忽略任何人，也没有排除历史注定要让犹太人承担的显要角色。

对时代的氛围的描述，以及困难的润色修饰工作，无疑能让人感觉到解说词是出自多人之手，不过并没有到篡改作者思想的程度。也许正因为如此，最后展出在奥斯维辛的意大利备忘录中，仅仅只用如此简洁的一个文本中的最后几行，但那段跟前面的几段文字割断了联系的墓碑铭文成了提醒参观者的一种不含确切意义的警示。

如何叙述真相

我们多次引用过那封信，但从来没有刊登过那个想把信发表在《时代之镜》（《新闻报》上反映皮埃蒙特大区生活的专栏）上的那个年轻写信者的全名。现在是填补空白的时候了。这是我们在她所写的信的页底读到的文字："要求知道真相的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女儿"。莱维在几天之后的回信中，表示了他尤其为女学生信中最后的言语所打动，他这样评论道："无论如何，人们都渴求知道真相，因此，真相不该被隐藏起来。"

毋庸置疑，首先，集中营变成了一个"真相问题"，既然如此，就得要面对。就他的对话者所指的展览会上那些有关毁灭营的图片，莱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姑娘啊，那些图像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他急于亮出具体的证据，以证实他对展览的肯定意见：首先是"那些令人悲怆之地留下的痕迹"；然后，在像都灵这样的一个城市里也有几十位"目击证人"——这样的一种定论，如今听起来是那么简约，好像唯有眼睛在说话！而最后还有："混杂地葬身在那些白骨堆里"的几千人"留下的空白"。总之，是一种缺席的存在，而相比其余的一切，它并非是抽象的存在。直到得出的结论是，在卡利涅亚诺宫那里举办的展览是为了"表明"——就像为了解释一个定理或每个复杂的问题那样——问题的真正核心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里我们看到了集中营呈现出的无数种面貌中的另一种面貌——"在人的心灵深处，究竟保存着多少残忍的本性，并告诫人们有哪些危险过去和如今一样地在威胁着我们的文明"。

因此，在被放逐者-作家的回答中，一边是以小姑娘为代表的所有那些“渴求真相”的人，另一边是那些在道德责任的驱使下，迫切地想讲述不仅是“自己”的历史，而是“那段”历史的人，他们之间似乎终于可以碰撞出火花来了。这就出现了另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怎么讲述“那段”历史呢？

莱维当然没有等到1959年——举办展览和写回信那年——才予以回答。正如我们所知，他在10年多之前早就已经睿智地想到了；不过，这本书上所发表的文本，也许能有助于再次进一步发掘出有关他的构思和写作的渊源。

我们从《放逐和灭绝犹太人》一文开始，那是在1961年。那年莱维借关于意大利反法西斯历史做一系列的讲座之际，跟其他人一起带着自己的证词应邀去了博洛尼亚。那是3月13日，莱维来到博洛尼亚市政府剧场，在作为晚会的主持人、报告会的主要演讲者恩佐·亨里克斯·阿涅奥利蒂做了关于《纳粹主义和种族法令在意大利》的报告之后，莱维做了发言。[注]既然是牵涉一种证据，人们当然期望他讲述其遭受过的种种经历，当事人莱维自然没有辜负听众的期望：“种族歧视的法令颁布时，我19岁。当时我在都灵大学就读化学专业一年级。”不过，在这以后，莱维就选择了一种全然不同于以往那种平庸的方式来进行讲述。（应该还记得，后来的自传体短篇小说《元素周期表》中的故事就是从那里产生的。）

在《放逐和灭绝犹太人》一文中，莱维适当回顾了从种族歧视法令的颁布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的历程，不过，他不断地用拓宽和缩小叙事视角的方式进行扫描，采用精确简短的词语和一种掌控自如的紧凑的节奏。作者很少用副词，从不离题（唯一插入的语段是有关集中营里语言交流困难的，“希腊人、法国人以及意大利人有那么居高的死亡率，就在于他们对德语和波兰语的一无所知这一点”），形容词减到最少：读到的就只是信息、数字、描述、名字，还有经常结合在表示行为

的动词和具体确切的名词之中的一些断然的看法，还有对集中营不同囚犯的心理状态一些扼要的概述：受害者和狱吏们。植根于对具体事实的思考，是为了帮助聆听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把主人公个人的遭遇置于所提示的不同的背景之中：插入一些对比，对详细的提问做出回答。最后写出这么几页的文本——乃是《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简明的概括，开场白是后来《元素周期表》中如前所阐述的几则故事——却具有向博洛尼亚的公众传达集中营全貌的能力，并且就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表达了印象、判断意见以及个人的感受，还有其他很多东西。《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作者，当时期许与公众有一种类似的成功的交流。不过，最打动读者的——也包括对莱维作品了解至深的读者——就是那种读到其作品的最后一行时，有一种发现了某种新东西的感觉。

1966年莱维写的另一篇短文，虽然篇幅较小，但也会给人以同样一种体验，就是已经提过的《犹太人的遣送》一文。题目会令人想到是一种无数次的重复，其实不然。至于情节上，文本又一次立足于一系列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亲身经历过的事件，但其所选的事件数量减少到总共只有三个：1943年9月8日，中断其游击队生涯的被捕事件，在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囚禁。故事的叙事性下降到最小，因为真正的论题是另一个——被放逐的犹太人生存的“零条件”（他如此闪电般的概括）与其他军人和政治犯等的生存条件之间的差别。

最后的例子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于1979年写就的《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用不到两页的篇幅重新经历依然相同的路线，包括被迫害的1938年和被囚禁的那年。但是文章的背景赋予它一种别样的独特性，而且有些段落浸透着不一般的意义。文本是写给罗萨娜·本齐的，她自小就患上了脊髓灰质炎，在被排斥在外的社会阶层中很活跃。正是被放逐者的经历和丧失劳动能力者（举例说明）的经历之间的含蓄对比，加倍说明了蕴含在他人——外人——敌人的序列中的意义，这里不光是指集中营里的人。这样就把莱维说的在反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法令颁布后他所感受到的那种“少数人的自豪”，置于一种不同的背景之中。不过，莱维

与本齐的隔空对话最有意思的时刻，得在结论中去寻找。作者写道：放逐的经历“刺刻在我身上，但它没有泯灭我活下去的意愿，相反，它更增加了我的这种意愿，因为它赋予我的生命一种目标，就是得带着证据出去，为了使类似的事情永远不再发生。这就是我写这些书所祈求的目的”。这些我们已经听到过的词语，在这里产生一种新的反响，它不再只是暗示了一种责任，隐涉了一种生活的目的和理由，那是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尺度——那种被铁石心肠的人强迫他人流放的尺度——衡量过的目的和理由。

语言的得体

睿智地运用一种自传体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在语言表达上有很多的可能性。不过，在同一个故事情节上总是进行不同的调整和变换，那是小心选择的结果，而且重复地采用“那个”故事情节，也不能不慎重。莱维作为发声的楷模，会让我们忘却他那样一种选择并非是预料之中的。按照莱维的情况，他喜欢用第一人称来讲述无疑是有充分理由的，这跟他观察世界的方式以及把自己与对话者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看一下其中的一些理由：直接反映自己的经历，肯定能使读者处于更容易理解的地位，并且能够以信任的态度接受对谁来说都难以接受的现实；作者把自己置于一张个人关系网的中心，这有助于他逐个描述当时的人，他介绍的并不是颇为抽象的思想，而是那些思想体现在个人身上的行为方式，以及由其所导致的行为。这就把叙述者莱维和故事中的莱维之间的距离缩减到最小，也有助于缩短他跟读者的距离，为此，读者都特别愿意跟作者进行密集的对话，而这正是他特别看重的。

说到这里，既然莱维有关集中营的大部分文本具有如此普遍的共同点，那么，能说它们仅仅只是“回忆的故事”吗？这可就是一种偏离正道的平庸化的看法。这种标签式的质疑引导人们提出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倘若过分轻易地用“证人”的身份来形容集中营的叙述者莱维的话，是否会导致我们低估复杂的问题——他所面对过的、结果却不断令我们惊诧

的问题——它们是与两个不同且须细致加以区别的途径连接在一起的。

第一个途径就是竭力获得真相，或者至少是发现真相的片断。就莱维来说，涉及历史上最难以琢磨、最令人费解之处。第二个途径就是得为经常悉心聆听这些真相的公众找到一种可以理解的形式；而要取得这样的成功，只有通过一种更细腻的文字表述形式，才能赢得人们更多的关切——正如马克·布洛赫[注]所说——要采用像竖琴家的“耳朵和手指那样敏感”的细腻方式。

“人们会否认说，那是否得有一种‘得体的’语言，就像是手的一种触摸？”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在他的《历史的辩解书》[注]——一篇关于如何研究和讲述人类重大事件的最有启示性的文本——中的同一页中自问道；而他是通过一种意想不到的联想这么说的，这无疑是莱维最珍惜的。就像在都灵作家的表现手法中——这我们在阅读《这就是奥斯维辛》的文本中看到了，并且在这些书页中试图表现出来——带着布洛克所主张的同样严谨的态度，在写作之前的调查工作中，让每篇证词都经过筛选，使所提供的证据都达到其真实的分量。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那两种途径，除了注意叙述的细腻之外，就是证据的中心地位。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用言辞作为“证人”和“证据”来证实集中营的真相，会冒着站不住脚的风险，由于太软弱无力，结果就会用词不当。莱维就语言的表达上向我们表明了一点，比如像饥渴、寒冷、劳累之类的词语，都是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不适合用来表述奥斯维辛极端的生活环境的程度。

那么，如果我们要自问，究竟哪种语言最适合普里莫·莱维呢？那就得追溯到这本集子里最早搜集的文本：为苏联人拟写的《医疗报告》、为都灵犹太人社团拟写的《报告》，以及临近审判霍斯时所提供的证词。在那些文本中，我们重又发现了一个人所从事的活动，他不局限于记录他所看到的一切——尽管以极大的关注和有效的风格——而是

在对自己的回忆加以评论的同时，一刻都不中断其对奥斯维辛的研究：他对人物、事实和事物（对齐克隆B的分析）的审视，采用的是一种含蓄而又不失优雅的方式。所以，可以这样说，《这就是奥斯维辛》文集中所搜集的这些篇章，是成功地以新的内容，从侧面勾勒出了作为一个证人和一个作家、同时也“善于”作为历史家的普里莫·莱维的形象。

---

1. 莱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主持完成“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的万塞会议。后来他在布拉格乘坐敞篷车外出时，被英国人空降的捷克爱国者用手雷炸死。
2. 卡尔滕布伦宁（Ernst Kaltenbrunner），接替海德里希的党卫军头目。
3. 当代犹太人资料中心（Cdec.），位于米兰。
4. 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内务部。——原书注
5. 由弗里德里希·博斯哈默尔指挥。——原书注
6. 奥斯维辛，波兰语为Oświęcim（德语为Auschwitz），是波兰一个小城镇的名字，纳粹在其边缘地区建立了灭绝营。——原书注
7. 《400万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Quattro milioni di morti al campo di Oswiecim”），载于《月份》（Il Mese）杂志，第III期，1945年5月17日，第539页。——原书注
8. 对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采访，1982年9月30日，安娜·塞格雷（Anna Segre）的《一种无言的勇气——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医生，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Un coraggio silenzioso. Leonardo De Benedetti, medico, sopravvissuto ad Auschwitz），都灵：扎莫拉尼（Zamorani）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原书注
9. 实际上，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不是三次而是四次从筛选中得救，除了得到他那些医生同事们的帮助（或许在之前），还得到门格勒大夫的帮助。另外，有关这几次获救，在贝内代蒂的揭发（发表在本书）中也有所提及——1959年前后所写的对门格勒的审判。在揭发材料提出的假设中，说其并非是出于仁慈之举，而仅仅是执行官方的一份纳粹主义的指令，旨在保证当医生的被放逐人员存活下去。关于门格勒，在露恰娜·尼幸姆·莫米利亚诺的《回忆死人之屋》（Ricordi della casa dei morti，1946）中也讲述到，她也是职业医生，但与贝内代蒂不同的是她能在比尔克瑙发挥其行医的资质。就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参阅亚历山德罗·基亚帕诺（Alessandro Chiappano）编辑的《回忆死人之屋》，2008年，佛罗伦萨：朱蒂诺（Giuntina）出版社，第54页。——原书注
10. 见《休战》（La tregua，1963），又名《再度觉醒》（Opere），由马科·贝尔波利蒂（Marco Bepoliti）编选的作品集，都灵：艾依纳乌迪（Einaudi）出版社，1997年，第一卷，第252页。——原书注

11. 引自安娜·塞格雷所著的《一种无言的勇气》，第84页。——原书注

12. 所引证的资料是一页用打字机打出的稿子，没有日期，也没有签字，《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奥斯维辛-斯雷西亚北部）》则是由外科医生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医生和化学师普里莫·莱维签的名。材料保存在皮埃蒙特抵抗运动和当代社会研究学院的乔治·阿戈斯蒂档案馆中。有关这份资料，以及在这儿或在下面要引证的其他文件资料的分析说明，请参阅后面《文本的信息》中有关《报告》的图标。——原书注

13. 就这一方面，请参阅安内特·维奥尔卡（Annette Wieviorka）的《记忆与遗忘》（Les status des déportés），《放逐和种族灭绝》一章中的《放逐者的宪章》一节，第141—158页，巴黎：普隆（Plon）出版社，1992年。——原书注

14. 《这是不是个人》，在《普利莫·莱维作品全集》中的第一卷，第1375页的注释中，标出同样的日期。——原书注

15. 见普里莫·莱维所著的《这是不是个人》，都灵：德西尔瓦（De Silva）出版社，1947年10月11日。——原书注

16. 见安娜·塞格雷的《一种无言的勇气》，引自第129页。——原书注

17. 重新发现《医疗报告》以及随后的事件，见本书后的《文本的信息》。——原书注

18. 卡罗尔·安吉尔（Carole Angier）的《双重关系》（The Double Bond）和《普里莫·莱维的生平》（Primo Levi: A Biography），都灵：瓦伊金（Viking）出版社，2002年（由瓦兰蒂娜·里奇翻译成意大利文，米兰：蒙达多里出版社，2004年），以及伊恩·汤姆森的《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伦敦：哈钦森（Hutchinson）出版社，2002年。——原书注

19. 各语种的译本，于2005至2008年分别在纽约、巴黎、巴塞罗那、柏林、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地出版发行。——原书注

20. 引自安娜·塞格雷的《一种无言的勇气》，第129页。——原书注

21. 普里莫·莱维的《追忆一位好人》，发表在1983年10月21日都灵的《新闻报》。——原书注

22. 意大利语的“遗忘”（omissione）一词和“重任”（commissione）一词之间只有一个字母之差。

23. 作者在这里用的是“采用”和“接受”两个动词的副动词形式。

24. 《普里莫·莱维并非如此》，西尔维娅·加科米尼采访露恰纳·尼幸姆·莫米利亚诺的访谈录，于1997年2月16日刊登在《共和国报》，第34页；此段话也刊登在亚历山德罗·基亚帕诺的《露恰纳·尼幸姆·莫米利亚诺：一种生命》一书中，由加尼·佩罗纳写的前言，佛罗伦萨：朱蒂诺出版社，2010年，第251页。——原书注

25. 关于“二元的”形式，请看阿尔贝托·卡瓦利翁做评注的《这是不是个人》一书，都

灵：艾依纳乌迪出版社，2012年，注释5。——原书注

26. 埃利奥·维塔莱于1995年5月15日交于伊恩·汤姆森的证据：副本在伦敦威纳书店，伊恩·汤姆森藏书中《普利莫·莱维传》中，见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卷宗。——原书注

27. 见安娜·塞格雷的《一种无言的勇气》，第51—52页。——原书注

28. 1979年，莱维在一些访谈中，宣布开始打算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汇集在七年以后问世的《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请参阅西尔维娅·加科米尼的《巫师梅尔利诺和铁匠》，载于《共和国报》，罗马，1979年1月24日。现在，在普里莫·莱维的《谈话和访谈录，1963—1987》，马科·贝尔波利蒂编，都灵：艾依纳乌迪出版社，1997年，第118—122页（尤其在121页）；《普里莫·莱维的反英雄气概》（L'antieroe di Primo Levi），乔尔基纳·阿里安·莱维（Giorgina Arian Levi）发表在《哈凯拉》（Ha Keillah），1979年2月3日，第6页；朱塞佩·格拉萨诺，《与普里莫·莱维的谈话》，1979年9月17日，载于《普里莫·莱维》，佛罗伦萨：新意大利出版社，1981年，第3—17页，现在也发表在《谈话与采访》，引自第167—184页。——原书注

29. 露恰纳·尼幸姆·莫米利亚诺的《两次大战期间的一个犹太人家庭》（Una famiglia ebraice tra le due guerre）［马克思·海曼的《在意大利的燔祭》，第36届IPA大会，罗马，1989年］，见《洗耳恭听》（L'ascolto rispettoso），载于《心理分析文章》（Scrilti psicoanalitici），安德雷依娜·罗布蒂编著，米兰：柯尔蒂纳（Cortina）出版社，2001年，第3—9页（文中引用的是座谈会的结束语）。——原书注

30. 阿泽利奥·马西莫·塔帕雷利（Azeglio Massimo Taparelli，1798—1866），政治家，温和的自由派。阿泽利奥高中以其命名。

31. 1975年4月2日，普里莫·莱维当选为阿泽利奥文科高中的学校行政理事会主席（19张选票中16票赞成），当时他的儿子雷佐在那里就读。那是该校的第一次理事会，由于所谓的“授权的法令”（共六条）于1973至1974年颁布，另外还设立了新的集体领导机构以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学校80%的有选举权的人（学生家长、学生、教师、非教学人员）投了票。莱维以“单一的名单”参选，获得758票，相当于总票数的41.74%。他在校任职两年，他的委任于1976年9月30日结束。在阿泽利奥文科高中的学校档案室可以查到学校理事会的会议纪要，莱维以19张选票中16票赞成被选为理事会主席。——原书注

32. 引自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青年时期的《悲剧——抒情插曲》（Almansor，1821），第243—244行诗句。

33. 1961年3月13日意大利作家吉奥乔·巴萨尼（Giorgio Bassani，1916—2000）和朱利奥·苏皮诺（Giulio Supino）也分别带去他们以“法西斯袭击弗拉拉的犹太教堂”和“面对纳粹主义的意大利人”为题的证词。——原书注

34.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法国历史学家，代表作《封建社会》（1939—1940）。抵抗运动的斗士，后被德国人枪决。

35. 《历史的辩解书》或《历史学家的技艺》（1941—1943），布洛赫去世后首次出

版，1949年，艾蒂安·布洛赫编写的评注版（1993），朱塞佩·古蒂埃尔翻译的意译本中第23页，都灵：艾依纳乌迪出版社，1998年。——原书注

文本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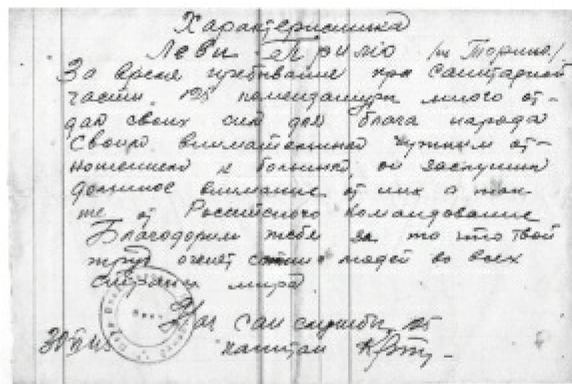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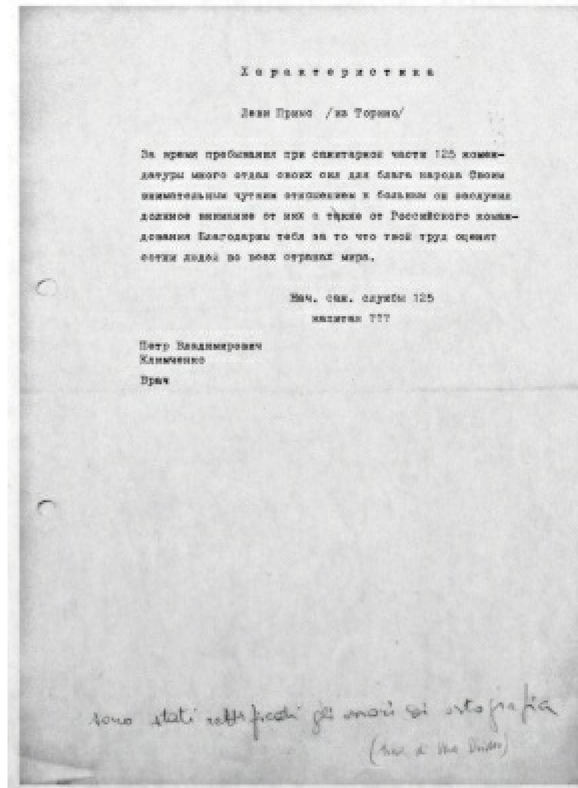


图1

这是1945年6月30日在卡托维兹由125号医务所主任签发给普里莫·莱维的证书。莱维对文本稍做润色，在《休战》一书中是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的：“丹森科[注]掏出两张证书，是用漂亮的书写体写在两张横格纸上的。显然是从学生的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在我的证书上，他从容大度地声明：‘来自都灵的医学博士普里莫·莱维连续四个月为本指挥部的医务所提供了服务，他能干灵巧，工作悉心勤奋，因此值得接受世界劳动大众对他的感激。”（引自《普里莫·莱维作品集》，马科·贝尔波利蒂编撰，艾依纳乌迪出版社，1997年，第1卷，第299页）

给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也开具了一份同样的证明，登载在安娜·塞格雷的作品《一种无言的勇气——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医生，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第38页，扎莫拉尼出版社，2008年。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Леви Примо /из Торино/

За время пребывания при санитарной части 125 комендатуры много отдал своих сил для блага народа Своим внимательным чутким отношением к больным он заслужил долж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от них а также о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омандования Благодарим тебя за то что твой труд оценят сотни людей во всех странах мир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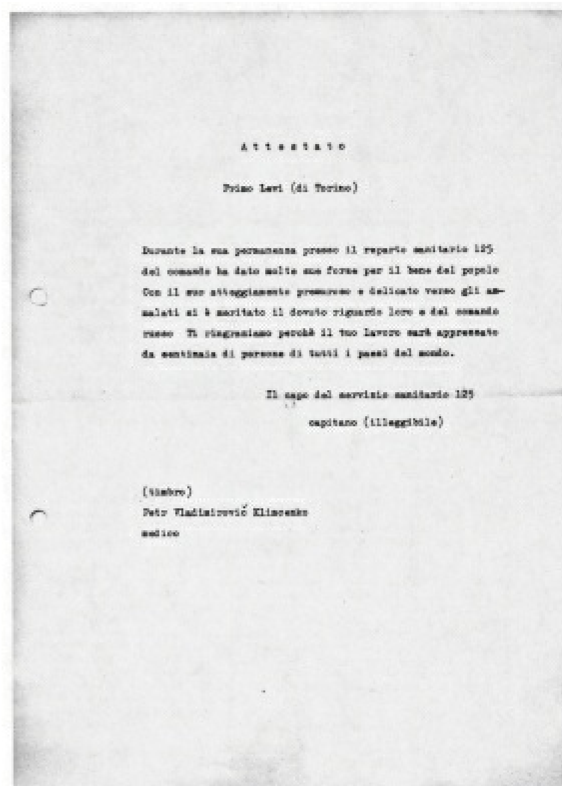
Нач. сан. службы 125
капитан ???

Пет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лимченко

Врач

sono stati rettificati gli errori di ortografia

图2 证书的抄件



Attestato

Primo Levi (di Torino)

Durante la sua permanenza presso il reparto sanitario 125 del comando ha dato molte sue forze per il bene del popolo Con il suo atteggiamento premuroso e delicato verso gli ammalati si è meritato il dovuto riguardo loro e del comando russo Ti ringraziamo perché il tuo lavoro sarà apprezzato da centinaia di persone di tutti i paesi del mondo.

Il capo del servizio sanitario 125
capitano (illeggibile)

(timbro)
Petr Vladimirovič Klimcenko
medico

图3 由艾依纳乌迪出版社俄籍工作人员维拉·德里佐翻译的证书译文

图3中的文字：

证书

都灵的普里莫·莱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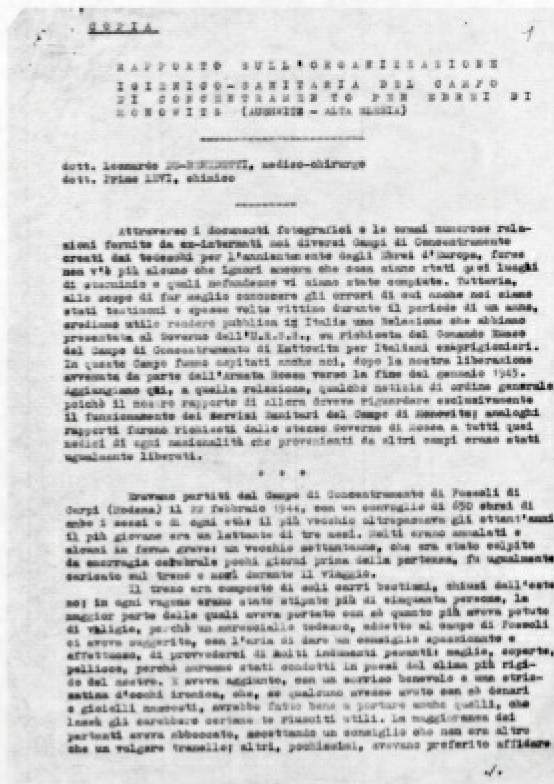
在指挥部下属的125号医务所服务期间，为民众的利益尽心尽力。鉴于其对患者的关切和悉心的工作态度，应该得到病人和指挥部的敬重。我们对你深表感激，因为你的工作将得到世界各国成百上千人的尊重。

125号医务所所长

上尉（无法读出）

医生 彼得·弗拉基米罗维茨（盖章）

克林钦科



COPIA.

RAPPORTO SULL'ORGANIZZAZIONE IGIENICO-SANITARIA DEL CAMPO DI CONCENTRAMENTO PER EBREI DI MONOWITZ (AUSCHWITZ – ALTA SLESIA)

dott. Leonardo DE-BENEDETTI, medico-chirurgo
dott. Primo LEVI, chimico

Attraverso i documenti fotografici e le ormai numerose relazioni fornite da ex-internati nei diversi Campi di Concentramento creati dai tedeschi per l'annientamento degli Ebrei d'Europa, forse non v'è più alcuno che ignori ancora che cosa siano stati quei luoghi di sterminio e quali nefandezze vi siano state compiute. Tuttavia, allo scopo di far meglio conoscere gli orrori di cui anche noi siamo stati testimoni e spesso volte vittime durante il periodo di un anno, crediamo utile rendere pubblica in Italia una Relazione che abbiamo presentata al Governo dell'U.R.S.S., su richiesta del Comando Russo del Campo di Concentramento di Kattowitz per Italiani ex-prigionieri. In questo Campo fummo ospitati anche noi, dopo la nostra liberazione avvenuta da parte dell'Armata Rossa verso la fine del gennaio 1945. Aggiungiamo qui, a quella relazione, qualche notizia di ordine generale; poichè il nostro rapporto di allora doveva riguardare esclusivamente il funzionamento dei Servizi Sanitari del Campo di Monowitz; analoghi rapporti furono richiesti dallo stesso Governo di Mosca a tutti quei medici di ogni nazionalità che provenienti da altri campi erano stati ugualmente libera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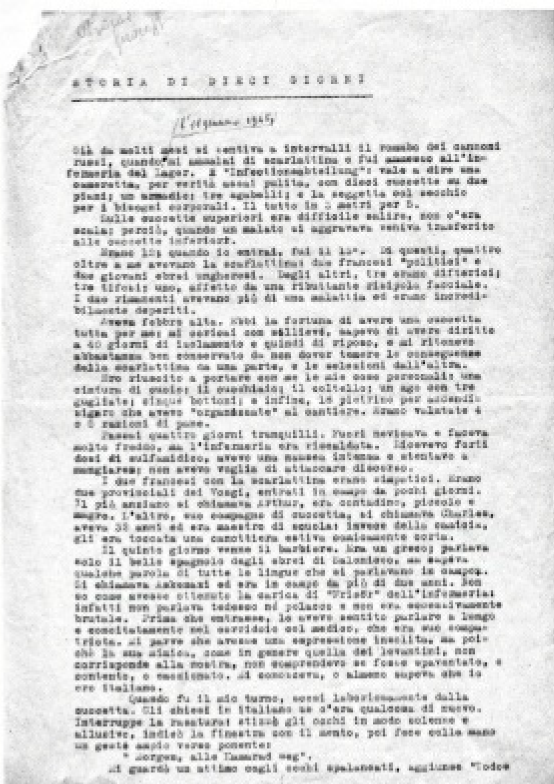
* * *

Eravamo partiti dal Campo di Concentramento di Fossoli di Carpi (Modena) il 22 febbraio 1944, con un convoglio di 650 ebrei di ambo i sessi e di ogni età: il più vecchio oltrepassava gli ottant'anni, il più giovane era un lattante di tre mesi. Molti erano ammalati e alcuni in forma grave: un vecchio settantenne, che era stato colpito da emorragia cerebrale pochi giorni prima della partenza, fu ugualmente caricato sul treno e morì durante il viaggio.

Il treno era composto di soli carri bestiame, chiusi dall'esterno; in ogni vagone erano state stipate più di cinquanta persone, la maggior parte delle quali aveva portato con sè quanto più aveva potuto di valigie, perchè un maresciallo tedesco, addetto al campo di Fossoli ci aveva suggerito, con l'aria di dare un consiglio spassionato e affettuoso, di provvederci di molti indumenti pesanti: maglie, coperte, pellicce, perchè saremmo stati condotti in paesi dal clima più rigido del nostro. E aveva aggiunto, con un sorriso benevolo e una strizzatina d'occhi ironica, che, se qualcuno avesse avuto con sè denari e gioielli nascosti, avrebbe fatto bene a portare anche quelli, che lassù gli sarebbero certamente riusciti utili. La maggioranza dei partenti aveva abboccato, accettando un consiglio che non era altro che un volgare tranello; altri, pochissimi, avevano preferito affidare

./.

图4 《医疗报告》（都灵，伊斯托雷托档案馆）的第1页



STORIA DI DIECI GIORNI

11 gennaio 1945

Già da molti mesi si sentiva a intervalli il rombo dei cannoni russi, quando mi ammalai di scarlattina e fui ammesso all'infermeria del Lager. E "Infektionsabteilung": vale a dire una cameretta, per verità assai pulita, con dieci cuccette su due piani; un armadio; tre sgabelli; e la seggetta col secchio per i bisogni corporali. Il tutto in 3 metri per 5.

Sulle cuccette superiori era difficile salire, non c'era scala; perciò, quando un malato si aggravava veniva trasferito alle cuccette inferiori.

Erano 10; quando io entrai, fui il 10°. Di questi, quattro oltre a me avevano la scarlattina: due francesi "politici" e due giovani ebrei ungheresi. Degli altri, tre erano difterici; tre tifosi; uno, affetto da una ributtante risipola facciale. I due rimanenti avevano più di una malattia ed erano incredibilmente deperiti.

Avevo febbre alta. Ebbi la fortuna di avere una cuccetta tutta per me; mi coricai con sollievo, sapevo di avere diritto a 40 giorni di isolamento e quindi di riposo, e mi ritenevo abbastanza ben conservato da non dover temere le conseguenze della scarlattina da una parte, e le selezioni dall'altra.

Ero riuscito a portare con me le mie cose personali: una cintura di cuoio; il cucchiaio; il coltello; un ago con tre gugliate; cinque bottoni; e infine, 18 pietrine per accendisigari che avevo "organizzato" al cantiere. Erano valutate 4 o 5 razioni di pane.

Passai quattro giorni tranquilli. Fuori nevicava e faceva molto freddo, ma l'infermeria era riscaldata. Ricevevo forti dosi di sulfamidico, avevo una nausea intensa e stentavo a mangiare; non avevo voglia di attaccare discorso.

I due francesi con la scarlattina erano simpatici. Erano due provinciali dei Vosgi, entrati in campo da pochi giorni. Il più anziano si chiamava Arthur, era contadino, piccolo e magro. L'altro, suo compagno di cuccetta, si chiamava Charles, aveva 32 anni ed era maestro di scuola; invece della camicia, gli era toccata una canottiera estiva comicamente corta.

Il quinto giorno venne il barbiere. Era un greco; parlava solo il bello spagnolo degli ebrei di Salonicco, ma sapeva qualche parola di tutte le lingue che si parlavano in campo. Si chiamava Askenazi ed era in campo da più di due anni. Non so come avesse ottenuto la carica di "Frisör" dell'infermeria: infatti non parlava tedesco nè polacco e non era eccessivamente brutale. Prima che entrasse, lo avevo sentito parlare a lungo e concitatamente nel corridoio col medico, che era suo compatriota. Mi parve che avesse una espressione insolita, ma poichè la sua mimica, come in genere quella dei levantini, non corrisponde alla nostra, non comprendevo se fosse spaventato, o contento, o emozionato. Mi conosceva, o almeno sapeva che io ero Italiano.

Quando fu il mio turno, scesi laboriosamente dalla cuccetta. Gli chiesi in italiano se c'era qualcosa di nuovo. Interruppe la rasatura: strizzò gli occhi in modo solenne e allusivo, indicò la finestra con il mento, poi fece colla mano un gesto ampio verso ponente:

" Morgen, alle Kamarad weg".

Mi guardò un attimo cogli occhi spalancati, aggiunse "Todos

图5 《十天的遭遇》的第1页，上面有普里莫•莱维手写的一些字，用铅笔批注的“法西斯的残暴”。鉴于这个批注，资料被分类列入CLN（民族解放阵线）的历史局（伊斯托雷托档案馆）



Min. Med.

MINERVA MEDICA

TORINO - VIA MARTIRI DELLA LIBERTÀ, 15 (CASELLA POSTALE 491) - TELEF.

LA RIVISTA È POSTA SOTTO LA TUTELA DELLE LEGGI INTERNAZIONALI SULLA PROPRIETA' LETTERARIA

SOMMARIO

GUAJAKIRSCH

compresse - sciroppo

ESPETTORANTE - ANTITERMICO

a base di potassio solfoguajacolato,

antipirina, caffeina, teobromina, etilmorfina

Laboratorio del SACCAROL - MILANO - Via B. Marcello, 36

OXIURINA VIOLA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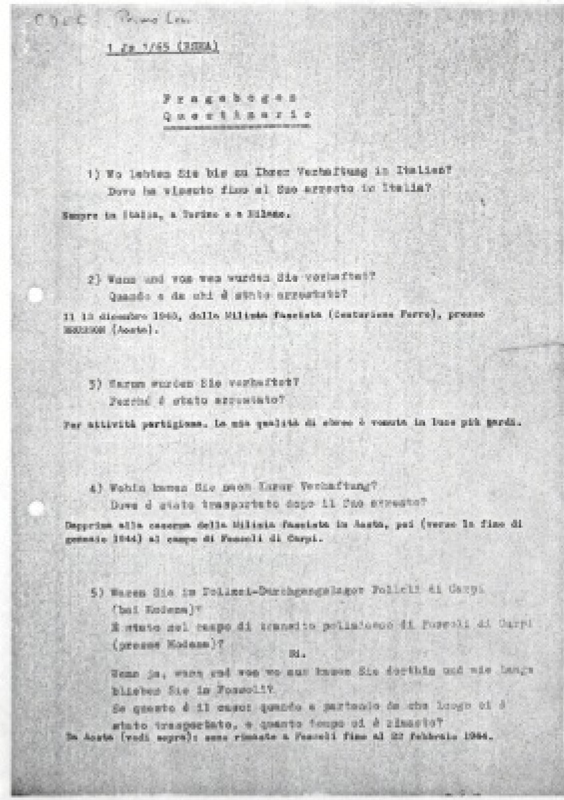
PREPARATO CONTRO GLI OSSIURI

图6 《医药智慧女神》的扉页

Rapporto sulla organizzazione igienico-sanitaria del campo di concentramento per Ebrei di Monowitz (Auschwitz - Alta Slesia)

图7 《医药智慧女神》的第1页

图8 《审判霍斯的声明》，普里莫·莱维（CLN民族解放阵线档案馆，米兰）



1 Js 1/65 (RSHA)

Fragebogen
Questionario

1) Wo lebten Sie bis zu Ihrer Verhaftung in Italien?
Dove ha vissuto fino al Suo arresto in Italia?

Sempre in Italia, a Torino e a Milano.

2) Wann und von wem wurden Sie verhaftet?
Quando e da chi è stato arrestato?

Il 13 dicembre 1943, dalla Milizia fascista (Centurione Ferro), presso BRUSSON (Aosta).

3) Warum wurden Sie verhaftet?
Perché è stato arrestato?

Per attività partigiana. La mia qualità di ebreo è venuta in luce più tardi.

4) Wohin kamen Sie nach Ihrer Verhaftung?
Dove è stato trasportato dopo il Suo arresto?

Dapprima alla caserma della Milizia fascista in Aosta, poi (verso la fine di gennaio 1944) al campo di Fossoli di Carpi.

5) Waren Sie im Polizei-Durchgangslager Fossoli di Carpi (bei Modena)?
È stato nel campo di transito poliziesco di Fossoli di Carpi (presso Modena)?

Sì.

Wenn ja, wann und von wo aus kamen Sie dorthin und wie lange blieben Sie in Fossoli?
Se questo è il caso: quando e partendo da che luogo vi è stato trasportato, e quanto tempo vi è rimasto?

Da Aosta (vedi sopra); sono rimasto a Fossoli fino al 22 febbraio 1944.

图9 《审讯博斯哈默尔之证词》，1970年9月2日，第1页（CLN民族解放阵线档案馆，米兰）



LA STAMPA

TRENT'ANNI DOPO, PER NON DIMENTICARE

Così fu Auschwitz

Passo ufficiale dell'ambasciatore Pompei alla Santa Sede

L'Italia chiede al Vaticano la riforma del Concordato

Un vecchio patto un mondo diverso

Via dall'Eritrea tutti gli italiani

Oggi si vota nelle elementari

Saranno aboliti gli esami di riparazione e i voti

Partiti: i giorni dell'autocritica

图10 《新闻报》，1975年2月9日，第1页（感谢都灵《新闻报》提供）。左面文章标题：《30年之后，为了不忘却》《这就是奥斯维辛》

---

1. 丹森科（Dancenko），卡托维兹集中营医务所的波兰籍医生。